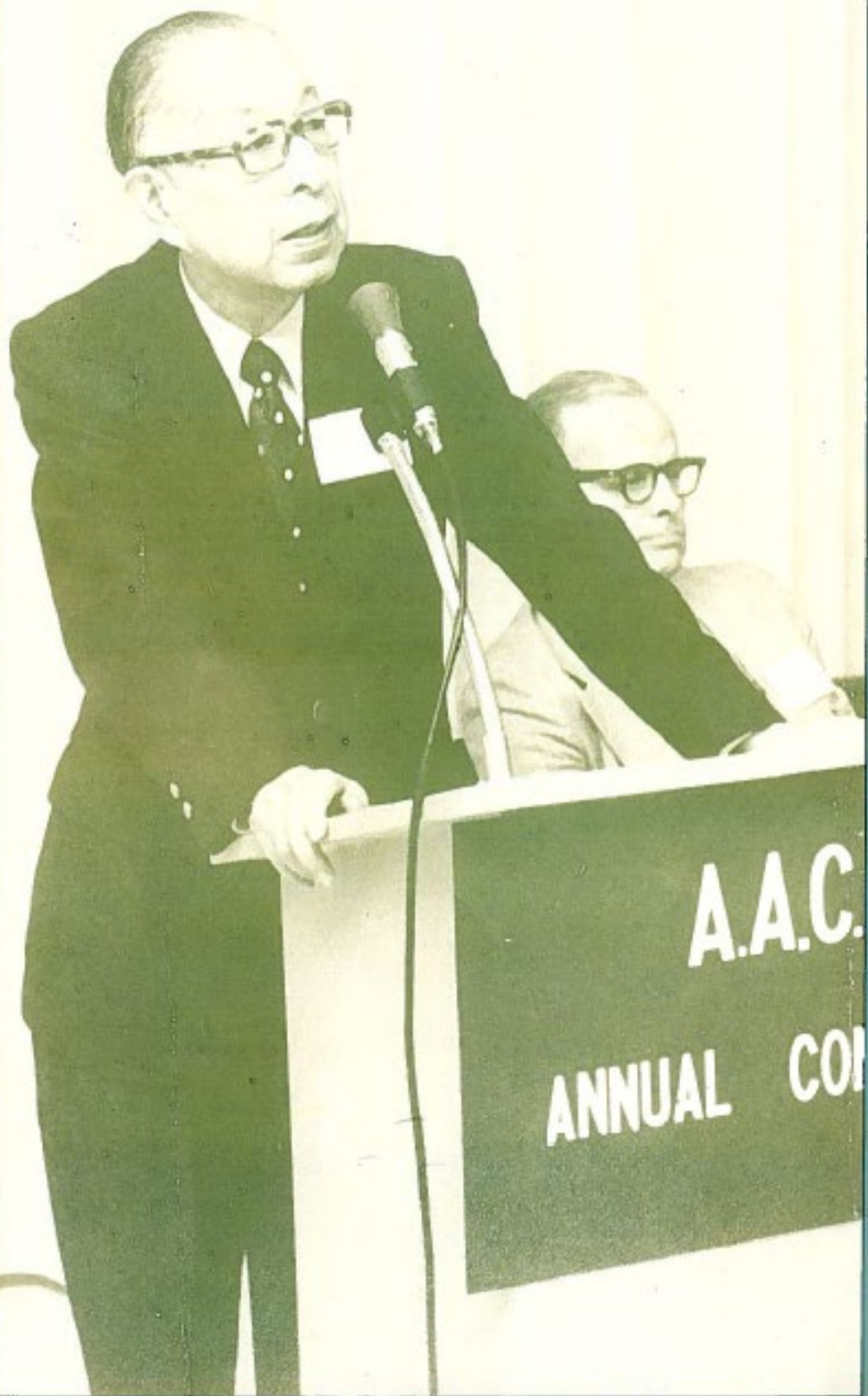


陳錫恩傳

陳鍾文惠 著



107 歲，多麼非凡的一生！



陳鐘文惠

1903 年 6 月 6 日-- 2010 年 9 月 15 日

自序

陳錫恩傳不是文學作品，因為我不是個文學家。我也不計劃做文章；我根本不會做文章。我和錫恩八十年的相識，五十九年之婚姻生活，一些經歷、思想及情緒，老在我腦子裡轉，有時使我悲，有時使我喜。我想用簡單的文字，把它寫在紙上，盼望以後就不再去想他，也許可以少掉些眼淚。

這份傳記從開始到寫完不及兩個月，因為我不計劃寫太長，寫太多，人們也沒空去看。我之所以要趕快地寫就是要爭取時間。這傳記完全是按我的記憶寫的，在我這個年齡，不知哪一天記憶消失，就無可寫的了。這傳記的讀者，都是錫恩的親屬、朋友及學生，我的記憶若有差錯處，幸祈指正。我也不會去修改或再版。只是及時希望能更正我的思想。

我與錫恩結婚後就決心用全副精力照顧他，雖然讀了博士，也只是副業。當初也曾盼望日後可以回國工作，若是我早知道此生要永居美國，當然應向職業路走。這個也不懊悔，因為我在 U.S.C. 每學期都教一門功課，相當滿意。這樣子我和錫恩可以朝夕相處。我為他而生活。一旦他走了，我當然感覺寂寞、空虛。寫這傳記可以略減寂寞，也給我一些事情做。同時也要多替錫恩做一件事，以慰他在天之靈。一個人的生命終結時，好像他一生的工作也一起終結了。錫恩有些著作，可以說立言不朽。然而他寫的都是英文，讀他著作的多是亞洲專家，或對教育有興趣的人。一些親友和學生，尤其是住在大陸的人，不會讀英文。所以我用中文寫傳記，好叫親友們重溫對他的記憶。用中文寫作在我還是初次，以前寫的東西都是英文的。寫英文時當然靠錫恩幫忙，中文文字有不貼切的地方，幸祈原諒。

錫恩不是一位平凡的人，他有超人的天資，對無謂的禮儀有革新的抱負。雖然受了身體的限制，還是有驚人的成就。我為他而驕傲，也分享了他的光榮。他的生活，不求奢侈，只求舒服，更不要與別人比較，競尚時髦。他不效法一些重物質生活的人，生活清白，自奉極儉，肯幫助年輕人求學上進，這也表示他與別人不同。

我此生餘年只有繼續他未竟之志。四年前設陳氏獎學基金，每年四萬元，我照原議付。此外一九九一年起，每年還幫助一個福州的學生來 U.S.C. 讀研究院，雖有困難，但我還是繼續他四年前的計劃。這傳記不是商品，我也不計劃請名人寫序，盼望此書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卅日我們結婚六十週年紀念日可以出版。

陳鍾文惠

目 次

第一章	童年及青年時代的生活	1
第二章	赴美留學	3
第三章	我的家庭	5
第四章	我的青年時代	8
第五章	戀愛	17
第六章	結婚	21
第七章	我們的孩子	24
第八章	孝父母、友弟妹	27
第九章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七協大生活	31
第十章	一九三七 -- 一九三九南加大讀書生活	34
第十一章	一九三九 -- 一九四六教授生活	38
第十二章	一九四六 -- 一九四七校長生活	41
第十三章	一九四七 -- 重返南加州	50
第十四章	南加州大學校內生活	53
第十五章	國外辦學	57
第十六章	登峰造極	64
第十七章	最後一章	69
附錄		
陳錫恩出版史:	書目	80
	書中的章節	81
	百科全書中的章節	83
陳錫恩巡迴演講(1961年2月-3月)		84
陳錫恩 / 陳鍾文惠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生或博士生獎學金		86
寫在傳後		88

第一章 童年及青年時代的生活

陳錫恩於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四日出生在福州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父親是福州市公理會格致中學英文教師，母親畢業於公理會文山中學，婚後曾在福州市近郊永泰縣小學任教，後來孩子多了，便專任家庭主婦。

陳錫恩出生時，他母親的一位美國朋友為他取英文名 Teddy，故多數親朋都叫他 Teddy，他自己亦喜此名，高興人稱他 Teddy。

陳家共有兄妹九人，錫恩居長。次弟幼時夭亡，大妹與四妹同時死於鼠疫。其時大妹十歲，四妹僅四歲。Teddy 幸未染疾，被親朋戚友們視為陳家不幸中之大幸。因為 Teddy 是父母及親友中最受寵愛的孩子。

那時候，重男輕女仍是整個社會的風氣，陳家自不例外。長子 Teddy 之後，連得四個千金，遂使父母對 Teddy 更是溺愛有加。每逢他的生日，家中必為他宰雞做壽麵，並勉強他多喫。我曾看見他哭著不肯再喫。他十多歲的時候，曾感慨的說：“若是沒有人勉強他喫東西，便是他最快樂的一天。”

父親對 Teddy 的教育用心良苦，執教極嚴。除親自教他英文外，暑期還請老學究教他中文，背古文。Teddy 插班在格致中學讀書時，學校有列榜的制度。他第一學期榜上無名，父親很不高興。從此以後他每學期都名列前茅。那時在福州公理會社會，Teddy Chen 是個神童。我記得有一個幼稚師範訓練班，在幼稚園詩歌封面上就有 Teddy 的半身像。

Teddy 在大學讀書時很喜歡出風頭。公理會劉公紀念堂星期天常聚會，他時常手執小竹竿在臺上指揮會眾唱歌。不知是否是有人請他這樣做的。協和大學開音樂會時（我們文山中學的學生有時被邀參加），他也大出風頭，領導管絃樂隊，指揮合唱隊；搬桌弄椅，忙得不亦樂乎。文山中學的音樂會或體育表演會，他都坐在前排熱烈捧場。教員 Scott 夫人既是協和大學的也是文山中學的音樂教員，輔導文山中學的合唱隊練唱。有時 Teddy 會獨自坐在臺下叫好。Scott 夫人也常常徵求他的意見。婚後我曾問他何以這樣愛出風頭，他說都是 Scott 夫人請他來的。

因為他挺出風頭的，所以成了我們文山中學女生談論的對象。有人說他英文好並不稀奇，因為父親是英文老師；有人說他每天背一頁英文字典，不一而足。談及他將來的婚姻，卻眾口一詞，說他必定娶個有錢有學問的美女。

Teddy 在英文和音樂方面才能出眾，人人敬佩。他父親的學生認為他改的作業比他父親還要好，因此都希望他週末回家時，代父親改作業。他沒有上過特別的音樂課，但吹、拉、彈、唱，樣樣都會。只要是他會唱的調子，坐在風琴或鋼琴前都能彈得出來。

他不僅會吹、會彈，還會譜曲。協和大學校歌就是他寫的。據說他在協大第四年時，一天在閩江邊散步，突然得了靈感，回去就寫了那首曲子，沒想到數十年來協大師生都在唱這首校歌。一九四六年我們重回協大時，每逢重要場合，師生們總是興高彩烈地高唱校歌。記得有一次學生進城旅遊，回校時在校船上唱校歌，聲極雄壯。一位美國的英文教授對我們說：“Teddy, 你是個神人。”一九五四年我們去臺灣辦東海大學，協大校友為我們開盛大的歡迎會，當然以唱校歌開始。協大校友在任何地方成立了校友會，仍然唱著陳錫恩寫的校歌。

第二章 赴美留學

一九二四年秋，陳錫恩乘船到西雅圖，再轉乘火車去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學習。教育學院是當時美國名校。教授中有 Dewey, Kilpatrich 和 Gidding 等人。Dewey 可是舉世聞名的學者，選他課的人特別多。他講課內容深奧難懂，因此一些學生便合起來雇了一位書記員，將他講的速記下來，然後用打字機打好。學生們有此一冊在手，便可以反覆閱讀，領會其中含義。那時錄音機還未發明。

陳錫恩在教育學院讀完第一學期，由於不習慣雪花飛揚的寒冷天氣，患了傷風咳嗽，原來是肺癆，不得不住入紐約郊外處的 LOOMIS 療養院。不料這一住便是三年。三年中，病危時，他曾被抬到太平間隔壁的小房間內，孤苦伶仃地體驗著死亡逼近的危險。他曾對生活感到絕望，只盼望能夠恢復好些，束裝回國，與家人團聚，將來以教英文糊口度日，庶不累及父母。身體好些時，他則在病房裡讀英文小說、雜誌，並學會打一手很精明的橋牌。

LOOMIS 療養院是紐約上等的養病所。病房上有屋瓦，下鋪地板，三面通風，冬天時雪花直飄至床上。這種環境對肺病人大有益處。陳錫恩總算走出陰暗的幽谷，生死的邊緣。一九二八年夏，他又回到教育學院，讀完碩士學位。出院時他只有一只肺，另一只肺硬化了。這一時期所經歷過的治療痛苦，和心靈的破碎，他不願再去回想，更不希望別人知道。

大病一場也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第一，他不喜歡雪花飛揚的天氣。其次，那時肺病無藥可喫，只靠休息及營養。多喫會發胖。生活要安逸，不要勞累，所以他能夠不出門就在家中過生活。工作地點不能離家太遠，午時回家喫飯並休息。工作選擇也受到限制。每天工作八小時再加交通，他是辦不到的。後來他辭掉大學校長之職也是怕身體喫不消。為旅行而旅行他是不幹的，每次到外地或外國都是因公而去，辦完公事立刻就回來。總而言之，做個教授過著住家生活，他覺得最理想。

一九二九年，他讀完碩士學位之後，回到福州，在母校協和大學任教育學院教授。

這裡須對福州當時基督教教會的學制略加介紹。福州有三個教會——公理會、美以美會和安日會。各教會都有自己的學校和醫院。公理會的男校是格致，女校是文山。美以美會的男校是英華，女校乃華南。這兩個教會的母會都在美國，而安日間教會的母會則是在英國，它的男校是三一，女校是陶淑。初期各家都有小學、初中及高中制。學生早期全部讀中文，以後要讀英文的需

多交學費。學費包括膳宿費四個月。早期各校都辦高中，六年制中學畢業。以後各公會都在高中之上添了兩年，叫八年制，可以說等於初級大學程度。以後三個公會決定辦四年制的大學，各校都把七年及八年級的學生送去協和大學，這就是福建協和大學的產生。錫恩是格致六年制畢業，直接入協和大學。他一九二二年畢業，是協大第一屆畢業生。協大成立後各公會便都取消了八年制的學制。

第三章 我的家庭

我出生於一個守舊的傳統中國家庭，父親是個金融經紀人，母親纏足而且大約目不識丁，十七或十八歲與父親結婚，三十九歲便去逝了。我們兄弟姐妹共九人，前三個幼時夭亡，我肩下的兩個弟弟也很小就死了。一個死於疹子，一個亡於天花，活著的兄妹四人，都出過疹子及天花，按天然定律生存下來。我記憶中母親多是躺在床上，然而兩個弟弟死時，她卻坐在大廳的椅子上哭泣。母親去逝時我只五歲，五姐七歲，四姐九歲，哥比我大十二歲，其時他已經住在學校讀書。父親是個守舊派，不知他何以肯把哥哥送到教會學校讀英文班。當時格致中學與文山中學的英文班要比中文班多收三倍的學費。我姑母及伯父的孩子多是在家庭裡跟著塾師讀孔孟諸子。後來他們在維新的社會中都無法適應且難以謀生，弄得家破人亡。

我在活著的女孩中排行第三，當時很有錢的人家都把第三個女兒送人，父親卻沒有把我送人。

我五叔早逝，大約與我母親去世時間相近，身後留下寡孀和一男一女，男孩只比我大一個月，女孩才三歲。父親便把他們接來與我們同住。五孀覺得一家三口累人太多，就把三歲的女兒送給人做童養媳。父親得知後對五孀大為生氣，親自去那人家裡把妹妹抱了回來。父親為人如此一片好心，所以他的子孫後來還都挺不錯的。

父親也曾把四姐和五姐送到陶淑女校讀書，然而她們去了不久就自己逃回來了。陶淑於是派了兩個人帶著餅乾來勸姐姐們回學校去，但她們執意不肯，那兩個女士只好帶著餅乾回去了。我為不能分享那些餅乾覺得好可惜。我們四個女孩子：四姐、五姐、我及阿妹都在家中玩，無所事事。

五孀的兒子肇和六歲就送去跟鄰家請的老學究幫讀。課本是「三字經」及「四字經」。肇和每天放學回來都大聲背誦。我和五叔母雖目不識丁，卻都會跟著背。

父親是最愛哥哥的。常常買些他喜歡喫的喫食親自送去格致給哥喫。有一陣子社會上好像有大事將發生。有人說洋人又造反了，大家怕大難將臨，但是誰都不知道是什麼事。忽然哥哥回來了，他的頭髮辮子已剪掉，穿了白色衣服看起來十分英俊。哥說，他和他的同學用炸彈燒了總督衙門。一下子許多鄰居都圍著哥哥聽新聞，包括父親在內，哥哥很興奮的說：“滿清政府已讓位，

革命已成功，此後漢人治華，世界太平。”哥也告訴大家髮辮子必須剪掉。那天哥像個英雄，父親對他感到驕傲，就是他知道國家大事，那是辛亥革命。

鄰居們都回去了，父親才感到輕鬆些去睡，面向內側。哥哥拿一把剪刀把父親的辮子從根剪掉。父親醒來，大發雷霆，拿起根棍子要打哥哥，哥當然此父親跑得快，一下子跑出了大門。父親無奈，只好去理髮店，把後面的頭髮剪齊。那辮子父親一直留着，以備復辟之用。

大約在一九一二年，我哥哥娶了一位西化的嫂嫂，雷毓芳。嫂嫂的母親年輕時跟美國來的傳教士 Dr. Woodhull 學醫，在學醫期間不幸去世。Dr. Woodhull 和她的姐姐 Hannah Woodhull 見 Agnes 年少失母，有意要撫養她。而她的父親也因為撫養著兩個男孩，負擔很重，情願把女兒送給了 Woodhull 組妹。於是嫂嫂便與二老同住，說了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們也讓 Agnes 學彈琴，十幾歲送她去讀書，不是去文山女校，而是去格致男校。正巧那時有個洋化的林先生，原是格致畢業，後來去美國留學，他把自己的三個女兒也送到格致男校唸書。所以 Agnes 就與林家姐妹一起，在男校享受著特殊的待遇。

Woodhull 姐妹退休時，決定回美國，以為必須安排好 Agnes 的婚事。不知是誰把我哥哥介紹給她們。我知道哥哥常去 Woodhull 家的客廳與 Agnes 會面。

嫂嫂比哥哥年長四歲，她進了鍾家後，我們皆大歡喜。嫂嫂說：“這些女孩子在家中無事，何以不去讀書？文山小學每學期連喫帶住，只需四元五角，即使不工作，每學期也只需六元，比在家喫飯還便宜。”於是我們姐妹三人，都被嫂嫂送去文山讀小學一年級。負責的師姑，收了四姐和五姐住讀，嫌我太小，不肯收我。嫂嫂又把我和肇和送去公理會辦的小學讀書，是男女分校。

哥哥從格致八年制畢業後，被聘為福州青年會幹事。嫂嫂擅長英文，又懂得音樂，容易找工作，婚後即在城裡的一所中學教英文。當時我們家住在南臺。嫂嫂雇了兩個轎夫，買了一項轎子，做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過了一些日子，嫂嫂覺得這樣交通既費錢又費時，便決定搬到城裡住，步行上下班。我和肇和就在附近的公理會小學上學。當時黃包車還沒有問世，若不坐轎子就只能靠兩條腿走路。

福州城裡公理會的中心是禮拜堂。Teddy 的父母是公理會的中堅份子，嫂嫂也是公理會活動的積極份子，每個星期天，我們都去教堂做禮拜。這是陳家與鍾家交往和友誼的開端。我們孩子們也多在禮拜堂見面，這便是我和 Teddy 認識的開始。

我們三個沒有母親的姐妹，相依為命，極其相愛，小時都是同床而寐。我小學畢業後入文山初中，我們姐妹三個同班。然而文山小學的程度，要此外面小學高，我剛進文山初中時有點跟不

上，兩個姐姐費了很大的心力，督促我讀，教導我讀。同學們見我們姐妹三人同班，而兩個姐姐又那樣不自私地教導一個愛玩的小妹妹，一時傳為美談。我們姐妹大約在初中二年級，都改讀英文班，四姐初中畢業後跟嫂嫂讀幼稚園師範訓練班，然後出嫁。五姐和我繼續在文山讀高中。我還是愛玩。五姐和她的女友鄧碧玉每天辛辛苦苦把英文課本的新字查出來，寫在一個小本子上，又把幾何及代數的習題都做好，也寫在本子上，然後她們把我找來，督導我做。我當然只好乖乖地把一天的功課預備好。五姐平均分數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我也可以平均九十分以上。五姐結婚了，我失了靠山，才知道自己要努力勤學。總而言之，我們姐妹三人，在校會唸書，在家會幫家事，照顧及愛護姪輩，與五叔母的孩子，亦極為友好，親友就認為我們是好孩子，踴躍為兩個姐姐做媒。我比她們更幸福，有許多男士直接追求我。

起初，哥哥任青年會幹事，後入鹽務局，最後任美商辦的友邦人壽保險公司，遼東的總經理，在中國一些大城市設分公司，也去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設分公司。

公理會的太太們都是勤儉持家，積下錢來置房產、地產、田產。嫂嫂與她們不同，大約是洋人撫養成人之故。嫂嫂自己會賺錢，哥哥也曾經賺過大錢。嫂嫂為人慷慨大方，有錢就花，喫得好穿得好。家中除五叔母幫理家事外，還僱有佣人，此外還有私用的華貴家車，僱有車夫。她工作時當然必須車夫接送，不工作時就讓車夫接送去打麻將。我當然也曾分享了家車之利。姪女敏昭全家十餘年前從菲律賓移民來美，前星期來舍間談，還提及那車夫說最喜歡接送九小姐，她前面的頭髮，隨風飄揚，頂好看的。那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的車夫。一九三一年，我從北京回閩，家中還有車夫，專為接送嫂嫂去打麻將，嫂嫂有時也叫他接送我去文山。一九三二年我快要結婚時，文山看門的女人有一天對我說：“鍾先生，你趕快把那車夫辭掉，因為他說了你太多壞話。”文山看門的一對夫婦，在文山大約有幾十年了，對我十分好感。那車夫就是看不慣我的男友常來我們家中，一待就是一整天，所以認為我是個壞女人。我把這事告訴嫂嫂，她說車夫不應對文山看門的人說我的壞話，就把他給辭了。

嫂嫂對鍾家有再造之功，不幸染上麻將癮，夜以繼日的打，中年發胖，因中風死於上海，享壽五十歲，那是中日戰爭的初期。

第四章 我的青年時代

我和錫恩認識約在八十年前，在公理會的禮拜堂裡。禮拜堂座落在太平街，兩家都住在附近。太平街一帶，教會的會友彼此都很熟悉。主婦們在菜場也常見面交談，哪一家喫什麼菜，大家都知道，誰家的孩子乖，誰家的孩子笨，都會成為話題。

大約在我十一、二歲時，陳家在城裡鰲峰坊，買了一所大房子。房子分前後兩進：入門後，有天井、走廊及客廳。廳的右邊有前後房及前後廂，加廚房。左邊與右邊一樣還多了個門房。陳家住右邊，鍾家住左邊。後廳是兩家共用的膳堂。後進也有前後天井、前後房，加廚房。那時嫂嫂受公理會之託，組織了一個幼稚園師範訓練班，收了六、七個學生，都是初中或高中畢業生，也有從鄉下來的。後面的四房便租給這些學生住，房租大約是公理會出的，學生每月由公理會貼三元生活費，自己煮飯喫。

這種情形，用福州話說，我們兩家是「同居」。錫恩愛開玩笑，婚後告訴人說，我們是先同居後結婚。那時我們二人還是天真的小孩子，一起玩得很好。幾年前，陳家孩子出過疹子，陳父在孤兒院買了「彈子」玩具，錫恩當然是老手，便細心教我玩兒。我們喫了柿子，積下柿核兒，在前廊臺階上打柿子核，看誰打得遠。這時黃包車開始問世，因從日本買來，故也叫「東洋車」。水部門附近的路，也因而拓寬了。我們常抱著敏璋去逛馬路。陳母有一次埋怨錫恩說，你何以不抱自己的弟妹去，老喜歡和鍾家的孩子玩兒？

錫恩雖是個好玩伴，但也有不老實處。一次我掉了一個紅色的髮夾，被他撿了夾在自己頭上，硬是不肯還我。我去搶，他就跑，從大門跑出去，半天不回來。回來後還埋怨我說，把夾子別在頭髮上忘了摘，到學校裡被同學取笑了一陣。我說：“活該！”

晚飯後，我們兩家常聚在大廳裡一起唱詩、讀經。嫂嫂陪嫁帶來的大風琴，就放在大廳裡。當年福州好像還沒有鋼琴。陳家父母和我嫂嫂都擅於彈琴，每晚唱一、二首詩歌後，以年齡為序讀詩篇一章。我雖然認得的字還不多，卻不甘示弱，早早地算好哪一晚要輪到我，就事先預備好。錫恩比我大十一個月，所以總是在我前一晚唸聖經。一次，我算好我唸的詩篇是第一一七章，是最短的一章，沒想到輪到他時，他把我的第一一七篇唸了。我立刻抗議，要他唸一一六篇，結果是我勝利了。

錫恩無事時，常獨自撫弄客廳的風琴，誰也沒有教過他，他居然自己就會彈了。錫恩在音樂方面頗具天才，後來編樂譜曲，也都是無師自通。

嫂嫂的訓練班兩年後結束，我們一家就從鰲峰坊搬出。在觀巷找了所比較寬敞的房子。我很喜歡觀巷的房子，客廳旁小門進去有個花廳，前有假山，花廳後有個樓房，從樓上可以看見假山。觀巷與鰲峰坊比鄰，大家都在津門樓買菜。當時福州有一家劉氏兄弟發了財，捐錢給公理會在觀巷蓋了一座很大的禮拜堂，名為劉公紀念堂。當時福州社會還是挺守舊的，而且大約我們也都漸漸懂事了，所以我和錫恩雖仍然常常碰面，且同在一個唱詩班，相見時卻不打招呼。後來錫恩還常憶起當時的一件小故事，說有一次我們在津門樓碰見了，大約都是去雇洋車回學校，我手上提著個紅包袱，看見他來趕快拔腳而走，連頭也不回。他當然沒有勇氣追來。文山開會，他總是坐在前排捧場，但從不講話。

錫恩的外祖母章家遷來我們鄰屋。兩家各有前後大門，然而屋子可相遇。彼此若要相訪，可以不必走去街上。我四姐嫁與章家二哥，他們雖長住天津，兩家姻親常來往。

錫恩的四舅章仁德是學醫的，常過來與兄嫂及父親閱談。我們於醫藥上有問題，也常請教他。仁德只比錫恩大四歲，甥舅間甚是友善。兩人常一起出去玩或在家中開談。

一日仁德獨自來我家，當時我已快高中畢業了。他與我閱談起來，談到學醫，我發表意見說：“我怕做醫生，也不愛做護士，成天跟病人死人打交道，斷腳爛皮膚的人，你都要去治他。”仁德聽了，像兄長一般解釋說：“做醫生的人，生活上有很大的滿足。斷腳人的你治好他，他自己會走路，爛皮的人你治好他，皮膚清潔如常人。許多無助的人，都渴望醫生給他一些希望。”我聽後很敬仰他，也承認自己從未想到治病救人是樁樂事。

一九二二年春我高中畢業，計劃秋季北上燕京讀大學。二月至六月我受聘於南門附近、安日閉會設立的華英初級中學教書，月薪九元。那是我第一次賺錢。

華英是「小姐齊」，學生比普通中學生大些，家庭多富有。我和學生年歲相仿，大家相處十分友善。開學兩個多月後，更覺親密。她們得知我將北上燕京，便紛紛邀我去她們家度周末。有的家中有美麗的花園，有的有別墅和溫泉，住得好、喫得好。若天氣炎熱，睡覺時還有丫頭打扇子。暑假時，我要上鼓嶺避暑，她們又在一個館子裡開了個盛大歡送會。後來我還常常憶及這幾個月的生活，我做了幾個月的「孩子頭」，與幾十個同年齡的人，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陣。

去燕京求學不在兄嫂的計劃中，是文山中學送我去的。嫂嫂雖主張女孩子都要去讀書，但只限高中畢業。四姐初中畢業即成婚，五姐高中畢業尚差一年即嫁人。那時女孩子生活的目標就是嫁人。但對我，嫂嫂說過，九妹總要讀完高中。

在燕京讀書，每年費用約三百元，路費在外。兄嫂每年資助一百元，餘二百元由文山借款，以後回校教書，每年就算還清二百元了。校方及家庭只計劃讓我去兩年，然後回文山。當時福州有協和大學，專收男生，美以美會有華南大學，專收女生，我是公理會的文山女中畢業，當然不愛去華南大學，所以決定燕京之行。因為要去燕京，我身價倍增，託媒上門求婚者頗不乏人。嫂嫂的嫁妝中，還有個山間小屋，是 Woodhull 姐妹為她租的，租期廿五年。為的是怕嫂嫂不慣福州夏天的炎暑，每年可以上鼓嶺避暑。那屋子外面是石砌的，一間客廳，三間臥室，一間廚房。我們常在客廳放一張雙人床，一張飯桌，一張寫字臺。

我家人輪流去那裡避暑。一九二二年夏，我和五叔母及兩個姪輩先去。那時去鼓嶺是坐轎上去的，日常應用品，則雇人肩挑上去，定例每擔不得超過一百磅。因此，上鼓嶺避暑，是挺花錢的。

一天下午，五叔母大概在後面洗衣，孩子們睡午覺，我一個人正在書桌上練字，Teddy 突然出人意外地從大門外進了來。他說他本來也計劃去燕京讀研究院，今早上鼓嶺時，遇見高智會督。高智請他秋季去英華中學教英文，因此，燕京之行暫緩。高智是美以美會督，也是協和大學校長，對錫恩很器重。錫恩帶來一本燕京大學一九二二——一九二三的課程本子，那天下午我們一同研究燕京課程。他跟燕京通過信，對燕京的情況比我知道得多。那天我們談了一個鐘頭。他說吳朝仁夏季要來鼓嶺管理洋人公益社，他有個很好的房間。錫恩準備夏天上山與吳朝仁同住，還會來看我。

吳朝仁是錫恩的好友，在協大時兩人同房。原來吳朝仁未上鼓嶺時，錫恩託他告訴自己的父母，說對我有好感，擬住鼓嶺一段時日，盼望與我多認識。陳家父母聽了吳朝仁的話，十分踴躍，陳母立刻去找我嫂嫂，表達他兒子的心意。嫂嫂說：“真巧，今天早上章仁德也託鄰居林則惠師母來求婚。”陳母未料有此巧事，只好對嫂嫂說：“既然我弟弟仁德和我兒子錫恩都喜歡你們家中的九妹（我的乳名），那就請你問她喜歡哪一個好了。”嫂嫂說：“我要告訴則惠嫂，九妹不日北上，婚事暫且延置，兩年後回來再說。至於 Teddy，讓他們見面，然後通信，兩年後再作定局。”陳母很滿意。嫂嫂又把此事告訴了父親。父親原本不打算去鼓嶺，聽到此事便打算與嫂嫂同上鼓嶺，大約是要管教我。嫂嫂上山後，先對五叔母說知此事，並謂：“託則惠嫂做媒的人多得很，則

惠嫂全辭謝了，因為公理會最好的兩個男士，都在追鍾家的小姐，別人絕對插不進去。”五叔母大笑說：“這簡直是門庭若市了，我們等著看熱鬧吧！”

我前面說過，福州公理會社會視錫恩為神童，他又是風頭人物，他盡可以挑任何他喜歡的女孩子。我以前常聽陳家父母對嫂嫂說，許多在北京或上海的好友寫信給陳父，說錫恩若肯跟自己的女兒訂婚，他們可以送他去美國留學。那時婚姻是由父母安排的，不少年輕人都是靠女方的錢出國留學。錫恩若願意，當不難娶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他何以看上我，我也不懂。陳家父母也肯放棄大錢，讓兒子與一個沒有錢的女孩子做朋友，這大約便是天作之合。

嫂嫂到鼓嶺的第二天很神秘地叫我去臥室，將詳情告訴我，並說了她代我做的選擇和進行的步驟。她對錫恩的印象好，且十分喜歡他。我完全同意嫂嫂的抉擇。

父親也叫我到臥室中，說：“如果 Teddy 來鼓嶺，你千萬要迴避。他既有求婚之意，你二人便不可見面。”我說 Teddy 已來過，我們當面談過話。他還盼望彼此多見面。我對父親說，男女見面不一定就是要結婚，要緊的是彼此多認識，合則來，不合則去。這樣小的房子，他若來，我也沒地方逃。大家在客廳談談，家裡的人這樣多，我們二人也不至有越軌的行為，你可以放心。

以後錫恩果真每天下午都來。嫂嫂常預備些零食，喫完大家都去環山，或去看洋人網球比賽。回來後又一起玩紙牌。嫂嫂是健談的，錫恩也是談笑風生，姪子姪女跑來跑去，一家人熱鬧得很。錫恩多是在我們家中喫過晚飯才回去。

一天下午，章仁德也光臨了。好在外錫和四舅素來是好友，家中多一個人一起環山、玩紙牌，人還是那樣多，也用不著我來招待。仁德兩天後便下山了。

錫恩跟我雖天天見面，但兩人單獨相處的時間卻極少。有一天我們二人在屋外乘涼，他問我：“你何以名為鍾文慧？”我說：“上學時嫂嫂給我取的。”他又說：“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智慧？”我說：“沒有怎樣想過。”他問：“你可不可以改為鍾文惠？”我說：“我想想看。”過了一會，他大笑道：“你知道麼？恩、惠相同而相合。”後來我去燕京時就改名為鍾文惠。他要我做的事我都願意做，而且覺得有神祕感。

有一次我們全家乘著兩三項轎子遊鼓山。鼓山佛寺是風景區，我們到處觀光。在一個房間裡，不知怎麼，只剩下我和錫恩兩人。我們二人不知所措，相顧而笑，立刻快步趕上大家。在眾人中我們才覺得比較自然。

夏天將盡，秋季上學在即，我和父親決定下山。清早，兩頂轎子來到門外，我和父親上了轎。錫恩很早便來送行，他帶著姪女敏璋步行跟來。我幾次勸他回去，他仍繼續跟著。走了很遠，我只得下轎誠意地告訴他不要再送了，怕敏璋累了。他這才跟我握手而別。

我到福州後，嫂嫂過兩天也來了。她要幫我買船票，預備應用的錢。臨走前一天，陳家父母來舍，陳父幫我收拾行李。他說Teddy寫信叫他來幫忙。動身當天，嫂嫂送我去馬尾上大船駛往上海，這時章仁德來了，說沒有一個男人幫忙如何可以？我們要坐洋車去臺江汎，坐小船去馬尾。嫂嫂覺得有個男人幫助當然好，就接受了章仁德的好意。小船至馬尾，停在大船旁。大船上主管人說，海上有颶風，要等兩天再開。嫂嫂腦筋快，就叫船夫載我們去白岸潭，那是公理會一個聚會或休息的地方。背山面水，風景極佳。裡面有十幾個房間，也有聚會所。主管的人是鄭能楷夫婦，與孩子同住此處。他們以前也在觀巷住過。他們夫婦極歡迎我在那裡住。嫂嫂很放心，欲與仁德回福州。仁德卻自告奮勇，要陪我到上船。嫂嫂領情，申謝過便自己回去了。

仁德和我一起待了四天。每天都雇個小船去大船問何時起錠。剩下的時間陪我遊山玩水，無事時我們坐在前廊上靠著欄杆看水上風光，當然也談話。仁德很愛他的二哥，所以我四姐和他二哥的家庭便成了我們談話的資料。公理會傳教士中，有對年輕的夫妻，恩愛過人，未婚時，女的工作，供男友讀完了大學。仁德表示自己經濟已自立，願意栽培我讀大學。這實在出乎我意料，我說，這兩年的費用，家裡及學校都已安排好，謝謝他的好意。

開船的那天，仁德雇個小船，載我們和行李至大船，又幫我把行李安放到船艙內。艙內上下層各有一個鋪位，我抽上層；一個老太婆在下層。一切安頓後，仁德送我一枝銀筆，然後握手作別。他走後，我爬上鋪位，玩那枝鉛筆，把它拆開，取出多餘的鉛條。正玩得出神，仁德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點不好意思，問他何以又回來？他說船還不會就開，所以他又轉來。一時我不知怎麼把鉛芯放回去，他替我裝好。我只好爬下床，跟他一起在外面走走。那船夫還等著，我勸他上船，重新握別。

仁德比錫恩還細心，身體結實而強壯，然而我的心已屬於錫恩。

船駛出海不知多少時候，深夜中忽然風浪大作，震動得厲害。大浪一來，船身隨浪上昇，不知下來時，是翻倒還是豎立。下鋪的老太婆嘔吐不止，高呼“媽祖娘娘救命”。我則雙手抓緊床邊以防跌下來，暗中默禱求神賜全船的人平安。水手們在甲板上用桶把水往海裡倒。艙內也有水進來，水手們高喊“不得了”，叫大家都不許動。我想到我快樂的家庭，上有父親，下有兄嫂、姐姐那樣愛我，我的學生及姪輩都那樣可愛，現在我要北上燕京，前途似錦。又添上錫恩和仁德兩個，我的生活如此富足，萬不能葬身魚腹。天亮了，浪靜下來，船已錠在幾個無人的小島中。

有位格致的英文教員也同船去上海，嫂嫂曾託她照顧我。但上船後，在甲板上遇到一位格致畢業生賴仁藩，也是去燕京讀書，對我照顧有加，因此便沒有去找 Miss Armstrong。她在洋艙，我在官艙，仁藩坐統艙。船綻後，我梳洗過，買一碗稀飯喫。剛喫完 Miss Armstrong 來找我，她見我房內又濕又髒，便叫我拿一些必須用品搬到洋艙裡住，睡在沙發椅上，喫她的烤麵包、熱茶、餅乾、水果，十分享受。

船到上海，我在文山的一位同學陳英玉家住了一時，把箱裡的東西晒乾或洗淨。然後轉乘火車北上燕京。在火車上，與我同坐的一位女生也是福州人，去北京師大讓書。我們交換姓名後，她大為驚訝的說：“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鍾文惠。聽說我表哥對你頗有好感，曾經請媒上門求婚。他們是做珍珠生意的，頗富有。”我說不知道。其實嫂嫂對我說過這個人，然而錫恩走進了我的生活，嫂嫂便謝絕任何人。

到達北京，前文山同學陳慎昭和李賜姜在車站接我。陳慎昭之妹陳淑昭是我初中時的好友。他們是地主階級，家住長樂，房子大，家中長工、丫頭多得很。我常去她家，一住就是兩三個禮拜。長樂風景好，白天去。遊山玩水。淑昭住房很寬大，最好玩的是天未亮就有丫頭端著兩碗點心到我們房中，我們起來喫了，又回去睡。此時淑昭在新加坡。慎昭、賜姜對我無微不至。頭一年我們三人同房。我到北京不久就接到賜姜弟弟李賜仁從山東齊魯大學的來信。

我一到北京就給福州家中寫信。錫恩從嫂嫂處得到我的地址，就寫信給我，我當然也回信給他，不是談情說愛，而是報告生活情況，這樣通了兩年信。那時錫恩在英華教書。他曾寄給我一張半身戴方帽子的照片，有一天慎昭和賜姜見了，好奇地問我是否與 Teddy 陳有往來？我說是的。賜仁也常來信給我，我沒有回。

有一次錫恩寫信勸我學彈鋼琴。他覺得一個家庭必須有個鋼琴，才是快樂的家庭。我聽了這話，就真的在音樂學院註冊學鋼琴，這封信不知怎麼也給陳、李兩人看到了。她們認為我乃“名花有主”，待我便沒有那樣好了，賜仁也不寫信給我了。

在一次福州同鄉會後，陳慎昭說：“我看賴仁藩對你很有感情。”我說我們是同船來的。

我在燕京兩年主修數學，回到文山自然是數學教師。

再說自我家從鰲峰坊遷出後，陳家把後進的房子改為兩層樓。樓上有六個房間，一個客廳，客廳內有壁爐，還有個天臺，天臺旁有小書房。陳家父母及弟妹都住樓上，樓下和前進的房子都租了出去。一九二三年冬的一天夜裡，前屋突然起火，陳家人醒來時，火勢已大，全家人從後面太平門逃出，幸無人受傷，在後面高家直坐到天亮。錫恩當時住在英華中學，清早聽說在於山下有一個

大房子失火，趕忙與幾個學生趕回來，房子已燒得只剩四面高牆。父母正在火堆中察看，父親看見兒子，只嘆口氣說：“寸草俱無”。陳家人只得暫住劉公紀念堂。錫恩的學生們把可用的東西如棉被等都送給陳家暫用。嫂嫂不但送給陳家不少衣物，連家裡不立刻用的家俱都給了他們。陳母極為感激。

一九二四年夏，我自燕京回到福州。那時陳家仍住在劉公紀念堂。我到家一，二天後，正在天井中收拾晒好的書籍，錫恩便來看我。我本打算收完後來招待他，想不到待我出來時，他已走了。此後我天天盼他來，卻始終沒有等到。一天下午嫂嫂帶我及姪子去劉公紀念堂看望陳家，錫恩也在。我們二人沒有特別談話，咫尺天涯，一別六年。

那年秋季錫恩去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動身時我們正在鼓嶺，聽說他曾到觀巷與父親道別。到美後他寫一封明信片至鍾家，外面寫“給鍾家”，後面幾個字報平安。嫂嫂看完拿給我，我扔掉了。一九二二年夏，天天見面，在燕京時兩年的通信，在我看來皆成泡影。我決定兩年後重回燕京，然後也設法去美國留學，使悲憤為力量，此後努力上進。

在文山教書的兩年，我教的是數學，頗有成就。有一年全城初中三年幾何會考，文山學生得冠軍，我大受表揚，學生同事對我都很有好感。

此期間遇文山籌備七十週年校慶大會，我幾乎全權負責。接見文山老校友，編校史話劇，指導學生表演等等。盛會當天，廣場上搭了個臺，來賓數百人，多數是站著。學生在臺上表演，我拿個紙製的話筒在臺上解釋，觀眾時常鼓掌。我看見陳父站在很前面，他人高大，很顯眼，我看得出他對一切都很興奮。他曾把那天的一切報告他的兒子，父子通信中，稱我為“九”。錫恩雖不與我通信，但對“九”的行蹤都知道。

錫恩在美數月後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為他禱告，盼望天不滅英才。一天陳父來舍，說要跟我私人談話，他問我知不知道Teddy早已是病了？我說知道。他說：“你可不可以跟他再通信？”我說：“是他不給我寫信，去美國也是不辭而別。”陳父說：“他從來未垂青過另一個女人，現在只有你的信可以使他快樂，給他希望。”在陳父的懇求下，我答應了，寫慰問的信，鼓勵他與病魔奮鬥，以他的才華，將來可做的事多得很。此後，我們每年大約通信兩三封。

我在文山教書時，四姐夫一家從天津回來，大舅也從黑龍江回來了，在倉前買了一座三層的洋樓，樓上住家，樓下做萬國儲蓄會的辦公處。陳母乃章家大組，當然也回娘家湊熱鬧。那時外祖母還在，大家團聚時，外祖母和大哥嫂為四弟的婚事操心。大嫂口快，對四姐說：“你做姐姐的，怎麼不能勸你九妹接納仁德的一片誠意？”大家都給四姐壓力，她不得已就答應了。陳母聽

了有點驚慌，清早就來文山把昨晚在章家的議案告訴我，她也同陳父一樣，相信她兒子心目中沒有其他女人，對我疏遠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盼望四姐來時我自己有把握。

四姐來了，晚上與我同床而寢，誠意地告訴我，Teddy 恐怕不能生還，我不可因他誤了青春。她提醒我說，有一次她和我去看鍾家的墳墓，仁德也跟來，他是那樣細心照顧我，並第一次叫我妹妹。四姐有點羨慕，說：“都是姐妹，何以你就那樣福氣，人家對你獻殷勤。”

四姐的婚姻是家庭安排的。聽說章、鍾及做媒的陳家，三家人去遊西湖公園，四姐和四姐夫只在西湖見了一面就定婚了。四姐未嚐過戀愛的滋味。生子女後，姐夫與丫頭有染，四姐生活是很痛苦的。晚年更苦，兄妹四人中只她一家住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受了不少苦。因我住在「敵國」，共產政府不允許她和我通信。

仁德對醫生職業有崇高的理想抱負，我敬仰他，也十二分感激他對一片真情。錫恩有對不住我的地方，而且現在生死不明。我應棄錫恩而就仁德。陳家父母認為我若移情別戀，會給錫恩很大的打擊。我一時雖有猶豫，細想一下，知道我的心是屬於錫恩的。因此不得已要說仁德的壞話，說他與某姨太有染。那時一些中國男人認為與丫頭或姨太太發生曖昧關係是不要緊的，因為她們是男人的玩具，不是平常的人。四姐說，世界上哪有沒有外遇的男人？但我相信一夫一妻制，男女都要專一，我也相信從一而終。

四姐的使命失敗了。聽說不久後仁德娶了個挺好的妻子，生男育女。我為他高興。但此後我和他沒再見過面。比如陳父去世，我和錫恩結婚，他都沒有來。仁德比錫恩大四歲，身體比錫恩好百倍，然而他比錫恩先死約廿年。

一九二六年我決定重回燕京。學期結束前學生為我開了歡送會。暑假回到家，父親及嫂嫂部極為反對我再去讀書，他們認為我不應當白等錫恩，應另找對象。嫂嫂要去廈門十三中學教書，要我同去，大約是要我到廈門找對象，我想十三中也許可以用個數學教員，所以答應同去。

陳母知道我要去廈門，立刻來看我，勸我不要去，說還是去燕京好，如果需要錢她會負責。陳母生活極省儉，她的誠意令我大受感動，不免流下傷心之淚。我雖前途渺茫，但絕不肯受陳家之惠。

有一天我去看五姐一家，她們從新加坡回來度假，姐夫在格致工作，他們一家住在格致宿舍避暑。去的路上，我聽見一個大聲音從遠處傳來。”鍾文惠啊！你知道錫恩快死了，你還等他做什麼？”我停下腳四處觀望，卻看不見有人。

我知道社會上的人及我家裡的人都認為我是個傻子、癡子。錫恩對我毫無溫暖，而陳家父母又把我抓得緊緊的，怕傷害他們愛子的重病之軀。但我沒有多大矛盾，因為我心中只有 Teddy。

文山校長知道我不能去燕京，立刻寫信請我再回文山教書。於是我跟嫂嫂去廈門玩了幾天，就回到福州。

我計劃一九二七年重回燕京。因為我與兩個姐姐商量，她們願意每年各貼我五十元，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國內情形紛亂，反基運動及收回教育權運動，不讓洋人做校長。學校實行三人委員制治校，我乃三人之一，所以走不開。我在文山四年，每月薪金只二十元。

一九二八年我回燕京大學。因為四年來只教淺的數學，深的數學都忘了，勢難主修數學。本想主修化學，又沒基礎，結果主修家政重營養學，以化學及社會學為副修科，換來換去直到一九三一年夏才畢業。

我第一次去燕京，女校校址在北京城裡同府夾道，那是個王府，古色古香，也許有點像紅樓夢裡的大觀園。

第二次去燕京，校址在西郊海甸，建築比較西化，不過還有點中國的色彩，比如姐妹樓女生會客所，就是中國建築，從樓門口坐校車去城裡大約要一個鐘頭。

第五章 戀愛

一九三〇年陰曆五月廿日是父親七十大壽。兄嫂在菲律賓為父親祝壽，父親在福州，所以他們又回福州設宴慶祝。我本來計劃回福州湊熱鬧，後來兄嫂寫信來說，不必回來了。這時忽接錫恩來信，說盼望我回去，路費若有問題，他可負責。數年來這是錫恩第一次表示想和我見面。我一貫主張不受陳家之惠，所以謝絕了。

一九三〇年冬，四姐來信說錫恩要帶他父親及三妹來北京協和醫院治病。陳父患血癌，當然治不好的。三妹從小滴尿，照X光，知道腎旁多一個管子，開刀後把管子扎上就不滴尿了。那可以說哥哥給了三妹一個新生命。

我想，陳家父母一直對我好感，如今人家病了理應去看他。於是就給協和醫院吳朝仁醫生打電話。吳朝仁那時已是協和醫院的醫生，還娶了一個同學沈醫生。接電話的是位男士，問：“你是哪一位？”我說：“燕京大學姓鍾的。”對方大笑，原來就是錫恩。我也笑說：“原來是你”。他說：“這是吳朝仁在醫院值班的房子，我明天就遷住青年會。”他把父親及三妹的情況詳告我，說他會安排我去看父親。那以後，他的電話可就多了，天天都有，而且談得很久。那時我住女生宿舍二院，那是U形建築，大門進來，左進有個小桌，有男女工友坐在桌旁，看門接電話。電話掛在對面牆上，他們接了電話就大聲叫“鍾文惠先生，電話”，嗓門極大，全宿舍的人都知道誰的電話多。同學們好奇地問：“鍾文惠你何似有這麼多電話？”

一天晚上，錫恩的英華學生請他在校長司徒雷登家喫飯，也請了我。錫恩約我在女生會客廳姐妹樓見面同去。那是我們分別六年後，初次見面。六年前他是一位帥瘦而高、英俊的白面書生。如今他變得比較胖，比較黑，因為養病喫營養所以體重增多，在露天的地方睡了三年，當然晒黑了。我一時也不知如何想法，以談看慣了，還是六年前的他。

司徒校長沒有太太，讓教員和學生用他的大房子請客。我們十幾個人一起喫飯、談話。飯後我還主領一些遊戲。事後錫恩說那晚對我的印象太好了，這樣子的一個太太，在大學內招待學生，太理想了。那晚他在男生宿舍過夜，他在英華教書時，項喜歡與學生同睡同住。

錫恩在北京的時候，我進城三次。頭一次應吳朝仁太太之請，去吳家喫晚飯並過夜。我白天進城，同錫恩去醫院看望他的父親，然後一起去朝仁家中喫飯。錫恩是橋牌健將，我在宿舍內也

曾打過兩次橋牌。當錫恩問我會不會打橋牌時，我說打過，打得不精。那晚都是吳太太在後面教我。

另一次進城，是同錫恩看電影「愛的炫耀」，在青年會放映。燕京的許多人都看了說好，所以我們也去看，音樂十分好。看完，我說那電影不好，因為男主角太占上風。錫恩說，好，下一次找個女主角占上風的。錫恩要求我在他和他父親離開北京前一天去城裡並在城裡過夜。這在我卻十分為難。我說我必須要上課。我讀書和教書從未缺過課。結果我還是請了兩天假，自己安排在文山級友何碧輝處過夜。何碧輝那時在協和醫院學醫。因為「愛的炫耀」在青年會放映，吵鬧不堪，錫恩搬至歐美同學會。這一日我們整天都在歐美同學會客廳談話，那客廳很安靜，就是每隔一些時候工人來火燒裡添煤。他很認真地問我，他身體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友誼有無前途？他告訴我在協和醫院照了X光，醫生得知他現在已是全時間工作很喫驚，並勸告他應去北京香山療養院休養。

我說：“你離開紐約療養院已兩年半，那時專家說你已經痊癒。讀完學位，在協大全時間工作了一年半，你覺得勝任嗎？”他說：他的生活很小心，中午都休息，對營養很專研，也不敢過勞，在這樣的情況下，覺得一切還好。我說我還要半年才畢業，回到福州至少要在文山教書一年，一年半的時間我們彼此多觀察、多認識、多了解。我們看著辦吧！

他也解譯說過去對我的疏遠，都是因為體弱怕誤了我的青春。一九二四年夏，他身體就有不支之感。肛門上長了個「管」，背上長了個癩，常看醫生，天天換藥，生活很痛苦。無精打采，更沒精神談戀愛。動身去美時還帶著藥。據紐約的醫生說，那個「管」的病菌，與肺癆是一樣的，大概那時已有了肺病了。一天細談，我們有了更深的諒解。晚上臨別之際，他給了我一個吻，祝我晚安。這是我們的初吻。第二天清早他在電話裡說，因為太興奮，一夜未睡，所以一定要跟我談談。他說花了一點鐘，才找到我的電話。我只告訴他我在何碧輝處過夜，何碧輝送我去協和醫院客房內睡。他問我怎樣，我說我好像騰雲駕霧一般。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中，初吻確有如閃電一樣。第二天他雇了一輛汽車，把父親從醫院裡接出來，去街上買些東西一起去火車站。吳朝仁也來車站送行。上車前錫恩又給我一個吻別。

三妹的病治好後，不回福州，留在協和醫院任護士，因她本來就是護士。這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數年。那時福州醫藥落後，沒有X光，使三妹受了二十多年的病苦。病除後，三妹說真像一個新生的人，沒想到人生還有這樣的享受。

錫恩回福州後，我們書信頻傳。三一年夏，我回福州，他原想到馬江來接我，但我不願麻煩他，所以到家後，才給他去信，他立刻來看我。那一年，我們周末都見面，相聚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他的家，和文山學校美國教員住宅的客廳。我們在一起看書、談話，有時也打紙牌。

我的父親看不慣男女相聚。有一天，他說我這樣的行為有傷家風。他說：“你們這樣好，何不立刻結婚？”我說我們要彼此多認識，而後決定是否要結婚。父親說：“笑話，你們不是從小就認識嗎？”我說：“小的時候在一起玩，並不計劃結婚，現在有結婚的可能，當然要看性情是否相合，彼此是否相愛。Teddy是協大教務主任兼訓導，我是文山教員，我們乃中國青年的模範，及領導，我們保護自己的名譽和社會地位，比保護家風還要緊。現在是維新的時代，你們不可以封建的尺度來衡量現在青年的行為，此後男女都是先友而後婚，你看著吧！”父親啞口無言。

我結婚不久，姪女敏璋（我哥嫂有四女二男）男友之一從菲律賓來電報，說要來看敏璋。嫂嫂及姪輩都很興奮。父親卻傷心地躺在床上說：“好容易前一代的婚姻已解決，現在第二代又要有同樣的行為和做法，難道我要活著眼看你們孩子，都過男女雜亂的生活嗎？”

我回福州後，計劃一九三二年暑假結婚。寒假期有一天錫恩來舍，嫂嫂與父親都在，他提出說他父親要在死前看我們結婚，要用他父親的名義發帖、定婚宴的菜單。陳父已把帖稿和菜單寫好。嫂嫂和父親對一個垂危的人的要求頗為同情，於是決定兩星期後辦喜事。錫恩立即備印請帖，把菜單交廚子。我則上街選購布料做新衣。四天後錫恩叫人送信來說：“父故即來”。我看了真感覺如蒙特赦。結婚本是很美的大事，如何可以匆匆忙忙了事？我立刻去陳家慰問，也給錫恩以心理上的支持。

陳家喪事辦得很熱鬧。陳母及三個男孩都披麻戴孝。孝男戴麻帽子，手執紙杖，待棺材板搬來，司儀者唱一聲，他們便一齊下跪。做棺材的人來，做壽衣的人來，貴客們來，他們全要去跪，坐在那裡像木偶，行動如傀儡。我問錫恩這樣不是太辛苦嗎？他說：“在這樣的日子，我不要使母親不快樂，只好隨她。親戚們看著我在旁陪著錫恩，大舅母便發令說，未婚妻也要披麻戴孝。我說：“對不起，就立刻要回去了。”大家有點僵。尚幸有個鄰居老太婆說，未婚的媳婦在未穿「紅」前不能穿麻，我才被特赦了。

以後大家又議論紛紛，說孝男應在喪事百日之內結婚，不然就要等三年。我告訴錫恩，父親未死，我們答應討老人家歡心，如今父親已死，我們要討自己的方便。我不管中國禮教如何指定，結婚的日子要我們自己抽，誰都管不著。

喪事的禮節多得很。上山的轎子中，有一項貼了「大少奶奶」，我沒坐，而坐洋車。孝男要步行，回來時錫恩太累了，就坐「大少奶奶」的轎子回家。事後他寫了一個遺囑，說自己死後，絕對不許子孫受禮教之罪。他還聯絡了別的一些教授簽名，大家一起打倒舊禮教。

第六章 結婚

我們決定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結婚。學期結束，學生的考卷都判完評分之後，才有暇操辦婚事。人們對我們的婚姻意見不同。陳母對我說：“你是個挺有福氣的女人，Teddy 像他父親。父親待妻兒十分好。”Teddy 也常說，在他認識的人中，沒有哪對夫妻的感情，像他父母那麼好，從不吵嘴爭執。若有齟齬，也只為買了好的東西，父親要母親多喫，母親要父親多喫。母親做月子的時候，父親總是親自上街，去買來既營養而又是母親愛喫的東西，親自下廚做好端至房中，照顧母親喫。

我的家人說 Teddy 什麼都好：長得好，聰明能幹，家庭清白，置有田產和房屋，而他又是長子。只怕不壽。四姐說 Teddy 只有一個肺，活不過十年。我文山的同學、燕京的同學、同事以及以前他教英華的學生都說：“文惠為錫恩犧牲了。”我有個學生問我：“像你這樣有才幹的人，為什麼要結婚？”大家議論紛紛，都視我為準寡婦。但我並沒有太大的顧慮。自一九三〇年冬以來二年半的熱戀，我只有快樂，沒有懼怕。他若是死在美國，我大概再也不會愛任何人了。在這樣的心理下，我毅然和他結婚，沒有絲毫的顧慮。

我在文山教書一年中，已陸續為結婚作了準備。按美國的圖樣訂製了一套臥室紅木家俱：床鋪、衣櫃、帶鏡子的梳妝檯，還有一張大搖椅。飯廳有十二人座位的胡桃木圓桌，十二把椅子，椅座和椅背是藤編的。客廳裡有沙發、安樂椅，安樂椅及沙發的座位和靠背，也都是藤編的。

一天，錫恩來文山，帶來一個做冰淇淋的桶，是新從洋行裡買來。他說我們要常招待學生，而他們都喜歡喫冰淇淋。鍾家的喜帖當然由我父親具名，陳家請帖卻發生了問題。因為當時女人不可以具發帖的。陳母說，父親死了，現在四叔（在香港）乃家長，應由四叔具名。錫恩對母親說：“你是一家之長，你若肯具名，我十分喜歡，你若實在不肯，我只好自己具名。”

在錫恩堅持下，母親才肯破除舊禮教，具名發帖。

陳家那時還在居喪，門上貼有白紙對聯，所以喜事不能在陳家進行。我們決定在文山禮堂舉行婚禮，在雨蓋操場擺設婚宴。

下午三點鐘，新郎來鍾家，對長輩親屬行鞠躬禮，同輩則互相鞠躬為禮，然後大家都乘汽車去文山參加婚禮。鍾家的婚宴設在倉前山家中，陳家就設在文山。我原主張兩家合宴，無奈陳母

堅持，而錫恩又不敢反對。許多客人都是識兩家的，這些客人便都在文山參加婚宴，鍾家親屬都回鍾家，所以鍾家相對顯得冷清了些。

婚禮十分簡單。大約四點半開始，五點前就結束了。新娘新郎外，有男女償相，還有兩個花童，他們是我的小姪女，協大的一個美國太太 Mrs. Beach 司琴，我們音樂教員 Mrs. Scott 獨唱，繼之司琴奏婚禮進行曲。結婚誓辭，是我們自己寫的，大約是根據美國基督教婚禮誓辭略加更改。我們不喜歡做妻子要順服丈夫、至死方可分離等句，相親相愛同甘共苦當然留著，詳情現在已記不大清了。牧師念誓辭，新婚夫婦交換戒指，牧師祝禱禮畢。大家都去屋外照相。一位美國朋友說，婚禮剛開始，一下子就完了。

教育廳長及一些政府的貴賓晚十幾分鐘來，就沒有參加婚禮，只參加婚宴。我和錫恩照完相之後，就在一位美國教員臥室內稍事休息。

婚宴開始後，我們去各桌致謝並敬酒。婚宴快完時，開始下小雨，大家吃完都急著回去。我們下來送別，一下子大家都跑光了，我們也如蒙特赦，因為中國老規矩要鬧洞房，像美國打碟子叫新婚夫婦接吻，中國以前鬧新娘鬧得比這還厲害些。

也是順陳母之願望，我們洞房設在陳家，老人家要我們在家裡住幾天，然後回協大。我們把紅木家俱搬至鰲峰坊，設洞房於樓上客廳，客廳有壁爐，爐上有架子，花燭可以放架子上。一到家，我們先至陳父靈位前行鞠躬之禮。所謂靈位，就是一張照片放在桌上，照片前供一瓶鮮花，點一對白燭。禮畢，我們上樓寬衣，女傭為我們各煮了一碗壽麵充飢。

福州是比較落後的城市，在福州買不到鑽石戒指，以及新娘的結婚禮服、婚紗。錫恩叫我去上海買，我認為這都是西方習俗。去一趟上海既花錢又花時間，而且我在文山全時教書，若是為購置結婚禮服而告假，簡直是笑話。而舊中國禮服我也不要，所以只好穿便服，四處張羅，買了個婚紗，像紙那樣薄，也只好將就。

數日後我們遷住協大。定居後，錫恩給我一包東西，原來是我八年來寫給他的信。我也把他寫給我的信取出，兩包包在一起，用鍛帶結妥，外寫”陳錫恩、鍾文惠私人來往信件，幸勿拆閱。”我很得意地把這一包寶物收存起來，說等我們老了重溫舊情及舊事。

一九三七年我們全家來美，原定兩年就回去，因此，我把寶貝的東西都鎖在一個抽屜內，放在我們住宅的屋頂室，這一包信也在其中。另外還有錫恩未婚前的相冊，我未婚前的相冊，以及幾十塊袁世凱頭的銀圓和一些文件。沒想到中日戰爭爆發，協大遷至閩北邵武，魁歧校舍乏人照顧。同時附近鄉民無以為生，靠搶劫以維持生活。校內的門窗、電線、馬桶都拆得精光，連螺絲、釘子

都不留。一九四六至四七年，我們回協大住了一年，盼望有仁人君子，能將信件及照片歸還，結果卻杳無音信。

結婚後的生活對錫恩大有裨益。他對身體有了自信，生活也有了安全感，從病人變成了健康人。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早睡早起，中午都休息一個鐘頭。錫恩就喜歡住在家裡，在家喫三頓飯。去上海或南京赴會，都是傷風咳嗽地回來。遷美後，就喜歡住在洛杉磯，去台灣、中國或其他地方旅行，常常鬧肚子、傷風。有事出差，他當然都去。孩子大了以後，長途旅行，我都跟著他，以便照顧，我們結婚五十九年，最長的分離，只是六個星期即一九三八年冬，錫恩為他的博士論文，周遊美國各省，參觀一些重要的大學。

他的弟弟錫謀醫學畢業後得肺病，哥哥寫信告訴他”娶個好太太，問題就可以解決”。這是錫恩的經驗之談。

第七章 我們的孩子

因為錫恩身體不好，我們只計劃生兩個孩子。晶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五日生，瑩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生。這也在我們的計劃中，兩個孩子相差十八個月，他們可以在一起玩，彼此互相為伴。錫恩天性愛孩子，對自己的孩子更是寵愛有加。我們為兩個孩子，寫了五年日記，而且每月都有照片。兩個孩子在美國的小學請書時，一位南加大的教授，也是我們好友，而且是南加大附小的指導者，因好奇故，給兩個孩子做智力測驗，兩個孩子的智力，都在一四五以上。我主修家政，精新法育兒。兩孩子都吃母乳十個月。同時孩子什麼時候該吃穀類、素菜、水果，都照美國辦法，不同的就是不能在舖子內買現成的嬰兒食品，要家裡預備。穀類要蒸爛，菜葉及水果煮爛弄碎，橘子汁及西紅柿也是家庭自備，當然孩子也喝牛奶。

晶一九五〇年畢業於洛杉磯高中，各科皆A，得了國家獎學金，可以去任何一所的七所女大讀書。那時美東的七所女大與男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並駕齊驅。錫恩是哥倫比亞畢業，所以為晶選了BARNARD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女校。享有國家獎學金，供食宿及免學費。她每年寒假暑假都回家。暑假時多在南加大工作。一九五四年畢業，專修數理。那年，錫恩駐台灣，晶畢業後也去台灣，秋季我們一起回來。五四至五五年，晶在洛城PROPULSION RESEARCH公司工作，五五年秋與鄭載世結婚，婚後夫妻住紐約。晶在紐約的SPERRY RAND工作，那時電腦剛開始，晶可以說是電腦工作的先鋒。鄭載世乃前上海暨南大學校長鄭鴻年之孫，專修經濟及統計，以後在中央政府工作。晶全家遷往華府，那時長男ROBERT已誕生，繼之有DAVID及MICHAEL，晶停止工作十六年，季男十歲後，她又回去工作，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任電腦工作。今年是一九九二年，晶長男ROBERT（瑞柏）三十二歲，CORNELL大學畢業後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十年，兩年一個南達科他州的GATEWAY 2000公司把他搶去，年薪加倍。現在除老板外，他是第一行政負責人。DAVID（瑞德）畢業於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在RICHMOND弗吉尼亞州的AT&T公司工作，現年卅歲，已婚。MICHAEL（瑞敏）從弗吉尼亞大學畢業後在華府的一個AT&T工作，現年廿七歲。他們在大學時都是讀工科，ROBERT在德州工作時，抽出時間讀MBA。我們很為三個孫子感到驕傲。他們對我們頂有好感，假期時常常路過洛城來看我們。

瑩兒十八歲夭亡，是我們生活中最悲慘的遭遇。她生後好像一切正常。一九四五年夏，南加各大學的中國學生在大熊湖有夏令營會，錫恩被請去演講並作指導。一天早餐前，晶、瑩去打乒乓球，瑩忽然昏倒數秒鐘。錫恩把她抱到上床休息，護士來看，也沒有事。為小心起見，

下山後我們還帶她去看醫生，驗心臟也認為沒事。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錫恩回福州任協大校長，我們送晶、瑩去文山住宿並請書。她們漢文跟小學，數學跟初中。協和大學一帶，有帶瘧疾病菌蚊子，瑩不幸得了瘧疾。我和錫恩以前都患過此病，我們回中國時帶了很多 QUINA 藥，不但預備自用，校內學生、工人及鄉村里的人來取藥者，頗不乏人。一九四七年瑩回美後又昏倒數次。一九五二年未入 MILL 大學前，我們帶瑩去見南加大醫學院教授，也是有名心臟專家 DR. WHITE。他詳細檢查後，認為瑩可以去大學，等聖誕回洛城後，作 CATHETERIZATION 及 ANGIO 檢查。我們早定於十二月十一日檢驗，十二月十日我們送她去兒童醫院，作普通身體檢查。十一日晨動手術，十一日早晨我就去醫院等消息，好容易等到中午，護士來叫我，瑩兒在康復室，那時她麻藥還沒有全退，我握著她的手說：“瑩，小心肝，你的母親在這裡。”康復室中不許人在那裡太久，我就幾分鐘去一次，跟她說話，四點多鍾她回病房，我坐床邊照顧她，不久錫恩也來了。瑩說：“我不覺得好，不覺得不好。”我們說那窗上有鐵窗，她說：“她們也許怕我跳出去。”我們請醫院代為雇了特別護士，晚上照顧她。我們計劃第二天清早來接她回去。特別護士來後，我們回家。瑩說：“我想你吻我。”我們二人都吻她。這是我們家中的慣例，兩個孩子睡前都要跑來吻我們道晚安。我記得晶在禮拜堂結婚，客散後她換好衣服去旅館時，也說：“我要吻我的父母說晚安。”

晚上十點鐘，錫恩打電話到醫院，特別護士說心臟、脈率、血壓都正常，我們放心就去睡覺。凌晨一點鐘，DR. WHITE 打電話來說：“這是我沉痛的工作職責來報告你的女兒已經過世。”錫恩接電話，我不知是什麼，只聽見他大聲說：“不！”好幾次。我趕快穿衣起床，問他什麼事，他說我們的瑩走了。他太震驚了，不能開車，所以打電話請我們好友翁紹耳，他立刻開車來送我們去醫院。我抱著瑩兒，她的身體還是溫熱的。我們打電話給 DR. WHITE，問他能否用心肺復甦術救活她。DR. WHITE 說一個人的頭腦，數分鐘沒有氧氣就算死了。我們叫護士請值班的醫生來，她好像還沒睡醒，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護士給我打電話，病人已經死亡。”我們只好含淚回家。瑩兒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一點與世長辭。

第二日，錫恩把銀行支票簽字後，交翁紹耳，請他幫助聯繫殯葬承辦者，買棺木，買墓地，預備追悼會。紹耳一切照辦，我也把瑩兒該穿的衣服都交給他。瑩善詩詞，追思會時還念幾首她寫的詩。

事後我們打電話給特別護士，因為我們還要付她錢。據她說我們走後，瑩兒腫得好好的，半夜忽然像發狂似的，要把鼻孔上掛的氧氣拔掉，要把 IV 打倒，護士當然阻止她，她一下子安靜下來，就斷氣了。

瑩兒死了，我精神的一部分，也與她同死。在這事發生以前，我偶而因故少睡，第二天就能補上。受了這個打擊後，常常失眠、憂鬱，靠服安寧劑鎮定情緒。錫恩當然也挺愛他的孩子，傷心之餘，常自慰說：“瑩知道我們頂愛她。”我們兩人盡量彼此安慰。晶那時正在季考中，我們沒有把惡耗告訴她。聖誕節回家時我們三人彼此安慰。事後有些友人說，兒童醫院對瑩見的事有疏忽，應當去告他們。那時有一位著名女律師，乃我們的好友，她願意代表我們，如果敗訴就不收費，勝則給她一半。她已作了初步的調查。她調查到瑩在測試的過程中，心臟有過一次休克，他們用心肺復甦術把她救活。在女律師家中，她與我們細細分析了訟事的利弊：(1) 要證明這病不是絕症；(2) 訴訟的目的，為了獲得經濟上賠償。但一個十八歲孩子，尚無生產力，家中沒有因她的死亡有經濟損失，因此即使勝訟，亦不能得到太多的賠償。孩子已經死了，我們又全時間工作，沒有時間上法庭。且我們一生中，從未對簿公庭，我們也怕把悲事重提，對我們二人都添精神上打擊，只好作罷。

第八章 孝父母、友弟妹

身為長子，錫恩一直都有長子之負擔。大學畢業後，在英華教書兩年，錫恩月薪五十元。每月把支票交給父親，父親給他五元膳費，五元零用。若有另外的用途，如請學生喫飯等，再回家向父親要錢。他出生到大學畢業，一切費用都由父母供給。但陳家父母公認，男孩子受大學教育，乃理所當然，至於留學國外，他們卻沒有這樣的力量來資助。女孩子生活的目標，就是找個好對，嫁人。恐怕那時不但陳家父母這樣想，所有福州的父母，也都是這樣想法。

錫恩在英華教書兩年，成績輝煌。高智會督對他更加器重，於是計劃送他來美深造。有個大慈善家 WARNER 夫婦，乃高智夫婦之好友，由高智安排，他答應幫助錫恩來美升學。高智乃協大校長，為協大樹人。

錫恩那次在美五年，未曾花費父母的錢。他在療養院時，父親曾寄給他十塊美元硬幣，他寄還父親。錫恩兩次來美，都是高智為他作的安排，他常說：“我若沒有仁人善士的援助，就不能兩度來美求學了。”所以他一生，志願負起幫助青年學子求學的責任。他自春省儉，然而對於幫助青年人請書，卻很慷慨。

錫恩一九二九年夏哥倫比亞學成回國，任教育系教授兼教務長時，月薪是一百五十二元。回家時，父母當然特意為他預備佳餚，他問父親：“我盼望你們及弟妹天天都這樣吃，每月要多在多少錢？”父親說大約要多花五十元，錫恩立刻答應每月給父母五十元。那是他收入的三分之一。錫恩是學教育的，相信教育對人生之必要，這理想不但施行於協大學生而且施行於陳家弟妹。他很抱憾的一件事就是父母沒有送二妹錫璋入大學。二妹文山中學畢業時，乃全班第一名，聰明而漂亮，由父母的安排，嫁與洪綬為妻。洪綬畢業於燕京大學，那時在福州青年會中學教書。但二妹的婚姻生活不是十分理想。因為洪綬是個麻將癮者，在家的時間少，錢都輸在麻將桌上。二妹生兩女，筠及芳，是項聰明可愛孩子。錫恩對兩女十分寵愛。我們結婚不久，陳母自告奮勇，替二妹看孩子，讓二妹和洪綬來協大住幾天，希望我們夫妻恩愛的氣氛，可以薰陶感染他們。他們住在我們家中時，倒是頂好的，兩人出去遊山玩水，好像很快樂，我們也替他們慶幸。

誰知回到福州後，洪綬繼續打麻將，夏天在外面吃東西不慎，染上了霍亂，兩天身亡。身後還欠了不少麻將債。錫璋喪夫後，我們請她來我們家中小住，沒想到麻將債主到我們家中來討錢，我告訴錫璋這錢不必還。但後來錫璋有能力償還時，經不起債主的糾纏，還是都還了。

洪綬死時錫璋已有身孕，數月後生一男孩，取名“慰”。在男權社會中，一個男孩子，的確

可以安慰居孀的母親。

洪綬死後，錫恩認為陳家對二妹應有相當責任，陳母不以為然，她說錫璋嫁了，乃洪家人，一切應由洪家負責。錫恩很抱憾他不能幫助二妹，因為我們自己的孩子已出生，每月還給陳母五十元，無力再幫助錫璋。好在洪家三兄弟，都是美國留學生，各人每月給錫璋五十元以四年為限，並指定要錫璋去讀大學。錫璋的生活比洪綬在時還好，並且把洪綬的麻將債都還清。洪慰不及一歲，錫璋在華南大學附近租了個小房子，雇了個佣人，照顧孩子。自己註冊上課，主修化學，埋頭苦幹，四年後得了學士學位，在中學教書。三個孩子都她撫養成人，都是大學畢業，可以說錫璋是個偉大的女人。

有一天一個剛從哈佛大學拿了博士回來的男士，在家中侃侃而談，說錫璋這樣偉大的女人，應當有個好丈夫，共度餘年。我說：“博士先生，你肯不肯娶這個偉大的女人？”他倒老實，說不會的。聽說抗戰期間，學校遷至閩北，有男士對錫璋發生愛情，但錫璋沒有興趣，她自己有謀生能力，還有三個聰明愛她孩子，她的生活可以自豪及自足。她終身守寡。

陳母及弟妹們，暑假都來協大避暑。我們住的房子是 WARNER 夫婦送給協大，為我們的結婚禮物的。房子的建築，正合錫恩的需要，樓上的一個臥室，三面皆窗，有玻璃及紗窗，天氣熱的時候，三面玻璃窗全開，最冷的天氣，錫恩也開一部分玻璃窗，這是繼續他在療養院時的生活方式。我的臥室與他相連，此外樓上還有三個臥室。樓下除客廳、飯廳外，還有書房並一個三面皆窗的房間，與樓上相配。平常放著孩子們的玩具，暑假時成為兩個弟弟的臥室。協大的教授、職員、學生、工人都不出房租。每年夏天我們過大家庭的生活，大家相聚十分熱鬧。瑩兒誕生後，陳母主動叫錫恩減少津貼廿五元。秋天大家都回福州去時，我還覺得生活怪冷清的。

錫恩第一次來美時，父親已退休。父母勤儉起家，除鰲峰坊的大房子外，還有些小房子舖子出租。也買了些田產。父母靠收租生活。鰲峰坊房子，早已指定後面兩層樓屬長男，前面的三弟及四弟均分。父母產業，都是為三個男孩子預備，按那時風俗，女孩子嫁了人，就不再是陳家人了。錫恩常對母親說：“你要給我的財產，我要全部送給三個妹妹，她們更需要家產。”一九五六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陳家財產除後進房子陳母及弟妹們住著外，其餘全部被政府沒收，政府成了唯一的繼承者。

錫恩要弟妹們全部受高等教育，而且是人上人。他認為三弟錫謀天資高，不可以就做一個平平常常的大學畢業生，所以一進協大，讀的就是醫學預科，三年後考北京協和醫院 -- 全國第一流醫科學院。讀醫科功課比較忙，又怕宿舍的膳食營養不足，所以三弟每天下午都到我們家中喝一杯熱牛奶。

五妹錫瑛初中畢業時，錫恩還在美國。父母送她去省立師範專科讀幼稚師範，那不是正式的

高中。五妹有她天才，能歌善舞，能做精巧的手工，畢業後也有工作。母親對五妹最大希望，就是哥哥能夠替她介紹個如意郎。錫恩說：“我妹妹沒有讀大學，我覺得慚愧，沒有面子。”然而五妹又沒有中學畢業，他自己是教務長，不敢把五妹插班在協大，厚著臉皮，去華南大學與王世靜校長商量。世靜答應收錫瑛，可能要補些高中的課。一九三七年夏，我們全家計劃來美，每月給母親廿五元津貼，當然要停止。但五妹秋季要入華南，錫謀要入北京協和醫院。母親是個能幹女人，既勤且儉，又善理財，一時也怕錢不夠用。錫恩未離福州時，給母親二百元，一百貼錫瑛上華南，一百供錫謀去協和醫院。還答應此後每年都寄回家二百元。我們來美後不久，母親來信說，錫恩名下的萬國儲蓄會中彩，得了一千七百餘元。那會是錫恩大舅任經理，錫恩回國後，每月都付一些款，若平年後，可得二千元。每月都開彩一次，中彩者就不必再加錢。這也是我們的運氣。錫恩立刻寫信給母親，請她將一千元匯給我們，當時匯率乃三比一。餘七百餘元留母處，貼錫謀、錫瑛升學之用。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錫恩回協大任校長。那時諸弟妹都在福州，也都有工作。大家歡聚一年。母親也好幾次到協大來與我們歡聚，弟妹們也輪流著來看我們。一九四七年四月，為陳母祝壽，租了協大的校車去接親友。

一九四七年我們回美，錫恩已決心把所有弟妹都接來美國上進或工作。第一個來的是錫瑛，她未婚，華南大學畢業。錫恩在南加大為她申請免學費獎學金，又在一個教會，得了獎金六百元以供食宿。那時 MORELAND HALL 合作宿舍，每月食宿只有五十元，大家輪流著煮晚餐，並收拾房子。同時在 U. S. C. 圖書館給她找個每週十點鐘的工作，以充零用。五妹問題一解決後，他就為錫謀奔走，好萊塢 PRESBYTERIAN 醫院答應請他實習一年，食宿、洗衣由醫院供給，此外每月還有一百元零用。那時在中國上等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在美國正規醫院實習一年後，就可以在美國行醫。寫信給錫謀，錫謀卻猶豫不決。他熱心宗教，說神叫他不要來。錫恩於是立刻為四弟錫明計劃，在 U. S. C. 申請到了免學費的獎學金，在生物系，每週有十幾個小時的工作。那時許多在美留學的男生，都靠洗碗維持生活。錫明踴躍預備前來，共產政府佔據福州，他出不來。因共產黨佔中國太快，弟妹全部來美計劃未能成功。

共產中國初期，我們曾給陳母寄錢。她回信說，以後千萬不可再寄錢，因有外匯，她們房地產稅價一下子提高了，寄來的錢，不夠付稅，她們還賣掉了些一首飾、銀幣，才把稅付清。那是房產未沒收前。

在中國饑荒時代，我叫在新加坡的五姐，及香港朋友，給陳母寄食物，如奶粉、肉鬆、餅乾等。老人家吃得好開心，說：“這都是我 Teddy 寄來的。”當然孫輩也得了分享之利。

財產被沒收時，老人家當然十分難過。我們再三給她去信，說她以後的費用，我們完全供給

。 陳母一九六二年秋去世。 去世前一年多，她患了中風，半身不遂，並處於半昏迷狀態中。 我們每月寄四十元美金給三弟，廿元為老人費用，廿元雇個佣人，按那時生活標準，每月四十元足夠供給兩個人費用。 同時我們還托香港友人，製壽衣、壽被寄到福州，另寄美金四百元為治喪之用。 三弟那時期在福州還有些地位，出殯之日還借到汽車，送親友上墳，事後還請大家吃一頓。 至文革時，三弟受七年之苦，母親喪事的舖張也是罪狀之一。 中(共)美建交後，錫明的孩子陳平，陳敏、陳捷相繼來美，現學成都有職業。

第九章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七協大生活

錫恩一九二九年，回協大任教，我們一九三二年結婚。是年秋，協大初次招收女生。頭一屆的男女合校，女生一共卅多人，三分之二乃文山畢業生，也可以說都是我的學生。我的學生都是叫我鍾先生，這樣子多數女生及一些男生，都是叫我鍾先生；我們家中佣人也是我由文山帶來，生孩子後雇的保姆，也是文山以前的工人，所以也都是叫我鍾先生。錫恩有一次說，也許他要換名為鍾太太了。我在福州期間，慣用鍾先生之名，三七年來美後，才改稱陳太太。

錫恩為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兼教務長及訓導長。他常很自豪地說，協大搗亂的學生，最有問題的學生，因訓導與訓育的關係，多數都成了他的好朋友。不但在校時是他好友，畢業後還是他好友。

錫恩誠心誠意地為年輕人解決問題。他也常說：“我若是沒有仁人義士幫助，我也不能來美留學。”他自奉極儉，而對於幫助貧苦無財力讀書青年，卻極為慷慨。註冊期間，有個學生兩、三天中總在他辦公室前徘徊，老也不進去註冊。到最後的一刻，他出去把那學生拉進來，問他何以不註冊？他吞吞吐吐說差三十元。那時每學期註冊要五十元，這學生所短不止一半。錫恩立刻為他解決問題，那學生還差三年大學畢業，錫恩為他把三年學費問題都解決了。

協大學生，如林孔湘、翁紹耳、檀仁梅、鄭仲孚等，都得過美國的博士學位，他們一生常對友人及孩子說：“沒有陳先生，我也沒有今天。”錫恩去世已一年，至今檀仁梅的太太和孩子，不敢把這惡耗告訴他。檀仁梅乃福建師大教授，現身體和腦力都在衰退中，家人怕他受不了這個打擊。翁紹耳六十多歲死於癌，最後一次來看我們說：“陳先生，我在大學一年級時，就決定你年老時，我要住在你附近照顧你。想不到我要比你先走了。”

在協大時，有一個貧苦無父女生，在宿舍中掉了十元錢，那十元錢也許是她一學期的零用錢，那女生痛不欲生。有人告訴錫恩，他回家商量，我們決定送那女生十元錢。我們把錢放在信封內，送去女生宿舍。以後有人告訴我們，那女生大概知道錢來源了，不過大家都不願意說破。

在 U. S. C. 時，也有中國學生註冊時差四百元，來辦公處與錫恩商量。錫恩寫了四百元支票給他，沒有借據。那學生畢業賺錢後才還我們。自一九六九年至七三年，我們每年栽培一個台灣的學生來 U. S. C. 讀研究院。一九九一年起，我們每年栽培一個福州的學生來 U. S. C. 讀研究院。這都是錫恩一貫的主張，別人幫助他，他也幫助別人，盼望我們幫助的人，將來也幫助別人。

錫恩在協大，還曾組織了一個小樂隊。婚後他跑到儲藏室中，把他學生時代吹彈的樂器都找

了出來，共有十幾件，又徵求了一些一愛好音樂的學生，組織了小樂隊。個別學生還請來家中教。我天天要聽他和學生在客廳裡不斷的 DA. DA, DU. DU 的聲音。那樂隊演奏過好幾次。錫恩極活潑，關心地拿著小竹竿在臺上指揮，如魚得水。

我們在協大期間，常招待學生在家裡吃飯，飯後閉談、遊戲。那冰淇淋機也用過好多次。一九三六年我們花了四百多塊錢，從一個美國商人手中，買了一個 PHILICO 無線電收音機，還加電唱機。那美國人因要回國，而急欲脫手。雖然是二手貨，但擴音器的音色特別好。我們買時，他還送了我們幾十張著名的古典音樂唱片。錫恩每天早晨起來，未吃飯前，先聽一會兒唱片，以過他愛好音樂之癮。那時在福州，有這樣好的無線電及電唱機的家庭很少，學生在我們家時，這就夠招待他們了。

一九三六年冬，十幾個學生在我們家中吃飯，飯後大家一起聽無線電廣播，忽然聽見蔣介石已被釋放的消息。第一次報告時大家一下子安靜了下來；第二次又報告，大家興奮起來；第三次再報告時，十幾個人都往門外跑，一下子都跑光了。他們跑回宿舍告知同學，同學們好些人租了校車一起去福州城裡播此佳音。還買了炮仗，沿途放炮。那校車不過是輛小轎車，只能坐六個人，他們卻十幾個人都擠了進去。到城裡後，一些人就站在車旁放炮。好像我們家中的無線電，比誰都先收到這個消息。這就是所謂的「西安事變」。

三十年代時，國人都有抗日情緒，才有「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即召國人在南京聽訓，錫恩和協大學生會會長同去南京。據云蔣介石召見了兩次，在寒冷的大廳內站著，大家都是穿著帶去的所有的衣服，還穿上大衣，但還是冷。聽訓的結論就是：中國還沒有預備好，所以一時不能動手抵抗。他說我們現有軍火幾天內就會都用完。

協和大學背山面水風景極佳。我們住宅的後面窗子臨閩江，十分壯美。以我的感覺是走遍天下，也很難找到比這更美的世外桃源了。這樣幽美的地方，不僅使人心曠神怡，更是研究學術的理想環境。校內山路崎嶇，曲徑通幽，更有層層石級。在校園內散步爬山，對身體大有裨益。我們住在這樣環境內，非但工作效率高，且精神都相當愉快。

前北大校長周培源抗戰期間住在南加州。一天我們兩家晚飯後閒談，周太太說她想念戰前清華校園內的生活。那時國家昇平，生活穩定，做清華的教授，住在清華校園內真是別有天地。她很盼望戰後能再過那樣的生活。我說我深有同感，我也常常想到戰前住在閩江東的協和大學裡，那是個理想地方。那晚我們兩家都有思鄉之情，那鄉即是美麗的校園。

我們結婚四年後，生了兩個孩子。我們對協大工作、住處都十分滿意，然而年輕人不可以不為前途計劃。以錫恩的才華，又是做教授的人，沒有個博士學位，總是美中不足。一九三六年秋後，我們常作博士之夢。一天錫恩決定再去找高智會都，他老人家也覺得錫恩應有個博士的頭銜，

於是立刻寫信。高智像燕大的司徒雷登，他們在美國認識很多有錢的朋友。通信結果，有個 DR. DAVENPORT 肯負責栽培錫恩讀博士，那當然是錫恩一個人來美升學。我們當然不顧分離，但為錫恩的前途，必須分離兩年。消息一傳出，公理會的主領人，就到我們家中來了，請我任文山校長。文山是我的娘家，協大是我的夫家，丈夫若不在，我還是回娘家的好。照顧我們孩子的保姆，是靠得住，所以我就答應了。過了一陣我們兩人又計劃同去美國升學，把孩子留在福州。孩子與保姆都寄住陳母處，陳母也十分踴躍，因為我相信我們兩人共同生活，費用不會比他一個人高，兩年內我若無力讀碩士，也可以來美見識或「鍍金」。錫恩於是定了兩張船票。船票買好後，立刻又覺得捨不得孩子。錫恩又寫信到一些學校，結果 COLORADO 大學歡迎他去做助教。把所有的資源加起來，我們四人可以同去，然而在美的每月生活費只有七十元。他到處通信的結果，U. S. C. 讓他免學費來讀暑期學校，這樣子全家來美成為事實。協大學生會為我們開了盛大的歡送會，用閱覽室桌子設宴，教員學生全體參加，可謂空前盛舉。

自協大碼頭上小船去馬尾時，佣人把兩個孩子交到我們手中，那時晶四歲，瑩兩歲。

在上海我們住在姪女敏璋家中，那時敏璋已婚。三頓飯去兄嫂家中吃。他們兩家住得相近。有一天晚上，兩個孩子爭吵。嫂嫂說，帶了這樣小的孩子去美國請書，怎麼辦得到？她為我們擔心。我說美國與中國不同，那裡有自來水、抽水馬桶、煤氣。嫂嫂說：“上海不是一切也都有嗎？我們還雇傭人。”我聽了，也有點怕，不過錫恩必須讀博士，我要我們四個人一起過生活，無論生活怎樣艱苦，我也心甘情願。

第十章 一九三七 -- 一九三九南加大讀書生活

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九日，我們離開了上海，乘 HOOVER 總統號來美。我們買的是一等艙，艙內上下共四個床，另有一條通道，通至一個小窗戶，從那窗可以看見海。我們預備兩年回國，所以帶行李不多，一個大箱、一個小箱，都放在空道內，孩子們還可以跑來跑去地玩，因那空地比箱子還寬幾呎。房內有洗臉盆，洗澡則要去公共的澡房。

那次坐船最大抱憾，就是孩子不會說英文，不能跟別孩子玩。所以我們二人開始跟孩子說英語。在協大時，一直有人幫助我們照顧孩子，現在我們要自己照顧，當然需要新的適應。也可以說弄得我們二人有忙不過來之感。

船上早餐、午餐比較隨便，晚餐比較正式。早餐午餐，我們都是與孩子同吃。晚餐要讓孩子先吃，把她們安頓在一房間內，我們二人換上比較好的衣服去餐廳。飯廳內安排得很講究，一切都正式，有時還有樂隊演奏。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進餐，一切都很安靜。卻看見瑩穿著睡衣，一個人從樓梯慢慢走下來。她光著腳兩手高舉，每隻手裡各拿一只小拖鞋。錫恩一見趕快跑過去，把她抱回房間。我們從福州帶來一個白鈹小鐵盆，本來就是為孩子大小便用的。那晚瑩自己在小盆內大便。她姐姐叫她趕快去找母親來倒，所以她才去的。弄得我們啼笑皆非，還覺得孩子頂可愛。我們回飯廳時，對我們同桌人吃飯的人談及這情況，他們也覺得挺好玩，還說可惜沒有電影機，若把這鏡頭照下來，可以一生紀念。

在日本船停兩次，錫恩事先安排他的學生來船上接我們，去觀光，在中國館子吃飯，然後又上船住宿。

船離夏威夷後，有一天早上，船上印的小報紙從門孔裡塞進來，錫恩拾起來就看，我問他有什麼新聞？他說中日戰事已爆發。我說：“胡說八道！”錫恩愛說笑話，有的時候我真不知道他說的是否實話。那就是蘆溝橋事變發生了。船到舊金山，我們立刻去買報紙。蔣介石說：我們抵抗至最後的犧牲，現在只好全國同心，一體抗日。一九三六年，蔣介石親自說過，中國所有的軍火，若是真打起來，恐怕幾天就用完了。我們身在美國，心在中國。看見日本進攻勢如破竹，國民黨軍節節退守，心痛如割。有些長住在美的中國人還說，蔣介石根本不應打，割地講和當為上策。

我們由金山還是坐原船來洛城。到碼頭時，有以前住過福州的美國朋友來接，大家一起去中國街吃了午飯，然後送我們至 U. S. C. 附近，一個中國朋友早為我們租好一套兩個臥室的平房，家俱都有就是舊些。

到家後，那美國朋友帶我去 U. S. C. 附近一個高麗的小舖子，我買了油、鹽、醬油和米等，還買了一小塊豬肉及一些扁豆。行李安頓，床舖整理好之後，我當然要煮晚飯。我把豬肉炒熟，加上豆子，還加上福州帶來的粉絲，煮好後盛在一個大盤子裡，還盛了一小碟子福州帶來的肉鬆，當然大家各有一碗飯。坐在飯桌前時，錫恩問還有菜嗎？我說沒有了。錫恩不敢做聲，心裡想，若是這樣吃上兩年，大家豈不都餓壞了嗎？

我們剛到美時，每月預算只有七十元，錫恩每天必須要花五分錢買報。那時國內戰訊緊急，我們也非看報不可。尚幸不久就有教會及其他機構請錫恩演講。錫恩本著愛國之熱心，一心要喚醒美國朝野抗日援華。早先教會的機構只給他五元或十元的酬金，後來請他的人多了，每次就可以拿數十元。本著愛國熱誠，而變成名演說家，這對我們家庭的預算，有莫大的補益。

錫恩來 U. S. C.，本來計劃只讀暑期學校，選的功課是教育哲學。碰巧教授是教育學院院長 DEAN ROGERS。上課不久，DEAN ROGERS 就知道錫恩是個出類拔萃的人才。有一天他不在就叫錫恩代課。這門功課錫恩在協大教過，課本也講過。學生們說由錫恩講解後，他們才知道教育哲學是怎麼一回事。暑假快結束時，DEAN ROGERS 叫錫恩至他辦公室，問他將來有何計劃？錫恩說：“我要去 COLORADO 讀博士，他們會給我助教的工作。” Dean Rogers 說：“我要你在 U. S. C. 讀博士，COLORADO 大學給你多少錢，U. S. C. 還要多給。”錫恩回家告知我這消息，我好開心。因為洛城四季如春，我對它十分喜愛。在中國時我想像美國，是幾十層的高樓，而在洛城可以住在平房內。這是我們與 U. S. C. 關係之開端。

一天瑩在屋外玩，採了朵花送給我。房東就住在我們隔壁，看見了，好不高興。跟了孩子到我們家中。我再三說對不起，並對孩子說以後不許再採花。過了兩天房東又來說，下個月房租要添到卅五元，比原議多五元，還說“根據你的種族和孩子，你找不到一個更便宜的房子。”我們當然也氣了，就另找房子。不久附近找到了個樓上有兩個臥室房子，剛油漆過，十分乾淨，家俱比以前那家新而且講究，每月租金卅五元。我們在這房子住了十年。

經友人介紹，離 U. S. C. 約一里路有個托兒所，也不必花學費，收的學生也只二十人。我們去參觀後，十分滿意，決定每天坐公共汽車送孩子去，孩子五歲以下不必付車費。我們輪流著早上八點送孩子去，下午三點去接她們回來。孩子上學頭一天，我忽然感覺這樣子我白天都是空著，立刻也去 U. S. C. 商量。他們讓我每學期註冊兩門功課，六學分，不交學費。我決定主修社會學。上學不久，那托兒所的主任說，從她家至托兒所，幾乎路過我們家，她願意每天八點左右來接孩子。我們當然十分感激。早上我們把孩子預備好，喇叭一響，錫恩趕快同孩子跑出去。下午還是我們輪流坐公共汽車去接。在托兒所三個月後，兩個孩子唱美國歌，說美國話，中國話就不說了。有一天晶回家宣佈說：“我不要人叫我晶，我已改名叫 HELEN。”因為同學們叫她“Ching Ching China Man”含有辱中國人之意。Helen 本來是我的名字。

上課初期，錫恩雖註冊了十幾個學分，還有助教的工作，他卻好像很輕鬆。他英文好，在大學時教的是教育，有些書他都已念過。我雖然只選六學分，還覺得緊張，因為大學畢業已六年，雖看報看雜誌，卻沒有讀書研究學問。現在要抱著英漢字典，正式的讀書，略有困難。初時錫恩晚上幫我洗碗，我則為孩子洗澡換衣服，七點鐘要她們上床，七點至十點我們二人都在飯廳的桌上看書。我們居美五十多年，都是在廚房吃飯，一九四八年買了房子後才有書房，各有書桌。雖然有個大飯廳，卻依然在廚房用餐。

出乎意料之外，Dean Rogers 請錫恩在一九三八年暑期學校教一門功課——比較教育。那是比較世界各國的教育學制度，這是錫恩的專長。一個學生未得博士學位前就被請正式教書，這是很少見的。以後錫恩在教育學院任了正式教授，每星期六早上，都開這門功課，學生們慕名從老遠的地方開車趕來上他的課，有時學生多至七、八十人。

中國在抗日中，我們計劃戰後回國，學些美國的制度帶回去。錫恩博士論文是“Developing Patterns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三八年感恩節前六星期，他坐火車去參觀美國一些重要的大學，這當然都經事先安排，由教育學院寫信給各大學請他們接待。

有位校長為錫恩舉行了雞尾酒會。但錫恩不會喝酒，當時也不懂酒名。主人到他面前念了一串酒名，讓他挑選，他這方面卻像個傻子。主人最後說：西紅梳汁。他趕快說：“我要這個。”主人大笑說：“我是說笑話的，現在要去找，看家中有沒有罐頭的西紅柿汁。”結果錫恩很愉快地喝了一杯西紅柿汁。在美時間長了，我們經常被請去參加雞尾酒會。我勸他學喝一些淡酒，這樣子也可以手持一杯酒和人談話。他說他已試過，白酒、紅酒、香檳味道都不好，所以參加酒會時，他還是喝西紅柿汁或桔子汁。感恩節晚上他回到家，孩子們好高興，搬出許多東西給父親看，比如HALLOWEEN的面具啦，學校裡做手工啦，畫的圖畫啦，等等。

博士論文要四月間交卷，六月才能畢業。不巧那年冬天，兩個孩子都出疹子，我們四人都得了百日咳。晚上一個人咳嗽，大家都醒了。我們決定讓晶在客廳沙發上睡。買帆布床，放廚房內讓瑩兒睡，飯桌暫時放儲藏室。大家關著門，晚上才可以多睡些。錫恩的睡眠更要緊，因為他白天要去學校辦公，還要寫論文。

錫恩參觀大學回來後，曾對我說：“我現在對美國大學知道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了新的見解。”在患百日咳期間，他每天都還去學校，回家來就去床上休息。尚幸客廳內有張書桌，他把打字機放在書桌上，每次從床上起來，他就在打字機上打。休息時他在思想與組織，起來就把思想打在紙上。他博士論文的初稿，就是這樣直接在打機上打出來的。兩個多月內，便完成了初稿，以後再雇人打正稿。他說這論文應寫“獻給百日咳”。我真不知道他如何能夠把博士論文這樣寫出來，因為我博士論文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寫，到一九五二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我寫的英文文件都要他

過目，才可見人。他的博士論文被 U.S.C. 的教育學院認為是傑作，由 U.S.C. 出版社出版，許多教育學院準博士，都要讀陳錫恩的論文以作參考。這是他在美國出版的第一本書。

錫恩在兩年內就能夠拿到博士學位，這也顯示了他有超人的才幹。讀博士不是容易的，除必修的學分外，還要讀幾十本書，以備四個半天的筆試。在我的經驗，那幾十本書，好幾年才讀完，做了筆記。近筆試前數月，我和三位同學每星期六都在一起討論那些書的精華。我知道錫恩也經過筆試，沒有看見他把書抱回家。大約他在圖書館裡過目成誦，不必像我那樣死唸。教育學院的博士，除四個半天的筆試外，還有二十四小時完成一篇論文的要求。一天錫恩早上去學校，主任教授給了論文題目，他就去圖書館看書，中午回來吃飯並休息。下午又去圖書館，六點鐘回家吃飯，後又去。我還怕他那夜要寫道宵了，誰知他九點多就回來，說都寫完了。又是在打字機上直接打出來的。普通人要用二十四小時，他卻可以在十二小時內交卷。他去參觀大學，缺課六個星期，學期結束大考時，我也不覺得他特別驚慌。

美國榮譽社團，如 PHI DELTA KAPPA 和 PHI BETA PHI，本科學生分數平均三·九以上的，可以被選為會員。錫恩在已 U.S.C. 兩年分數都是 4.0，即各科皆A，那榮譽學會破例讓一個 PHD 的學生選為會員。他當然也被選為教育榮譽學會及社會學榮譽學會會員。社會學是他副修科。那時期的男人不戴手錶，褲子的前面有個錶袋，把錶放袋裡，多數男人都有錶鍊繞在褲帶上，以防失錶，錫恩錶鍊上，掛了四把金鎖匙，演說時把錶從袋子裡取出，和那金鎖匙放在桌上，十分神氣，人們要他講多少時，都能準時結束。

畢業典禮那天，我帶兩個孩子去觀禮。孩子對父親得博士學位十分驕傲。當晚錫恩以前在協大時的老師，請我們吃飯以示慶祝，並請南加大經濟學教授 DR. LEONARD 夫婦開車來接。在車上我們談話都稱 DR. LEONARD，晶那時六歲，問：“DR. LEONARD，你是否一個博士？”他說是。晶說：“You copy cat?” 在孩子的心靈中，她父親是唯一的博士，別的都是模仿者，DR. LEONARD 說：“小姐，我比你父親早十年就得了博士學位。”

第十一章 一九三九 -- 一九四六教授生活

一九三八年夏，錫恩開始教暑校。一九三九年畢業後，教育學院聘他全時間工作。除此較教育外，還有教育史及教育哲學。那時中日戰爭危急，我們不能回國。受聘在 U.S.C. 工作，既合錫恩的專業，又解決了我們的生活問題，我們覺得十分理想。我們也認為 U.S.C. 校方，在眾學生中選上錫恩是挺光榮的一件事。

U.S.C. 以前沒有請過非白種人的教授。四十至五十年代，也沒有聘非白種人作教授。那時南加州各大學，都沒有華人教授，錫恩是第一個，繼之有錢學森在 Caltech。可以說錫恩是華人在南加插足美國大學工作的開路先鋒。五十年代華人在南加大學任教者，如鳳毛麟角，正像美國俗語說的，用一個手指頭可以數盡。

在 U.S.C. 不但教育學院院長器重錫恩，文理學院院長 Raubenheimer 和校長 Von Kleinsmid 也都器重他。一九四一年春，Von Kleinsmid 對錫恩說：“亞洲文化學系快倒了，你若有辦法振興它當然最好，不然就讓它死在你手裡。以後在教育學院少教書，用一部分時間整頓亞洲學系。”回家後錫恩與我商量，說：“我是個中國人，一般美國人都認為我應該是中國專家。我現到處演講，也講中國問題。美國教育史和教育哲學誰都會教，用不著一個中國人。”他決定接受 Raubenheimer 的挑戰，做亞洲學系系主任。當時亞洲學系只有一個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美國，遇到南加大校長 Von Kleinsmid，他祖先也是德國人。Von Kerber 戰前在德國好像讀過「字源」，認的漢字不多，也根本不會說中國話。亞洲學來只有他教中文及「字源」，學生有三、四個人。錫恩主持後，校方答應讓他聘一個中國人教中文，一個日本人教日文。他自己下決心研究中國歷史，中美邦交史和中國文化的書籍。到洛城後，我頭一次見他抱了很多的書回家埋頭苦讀。在這方面有了十分把握後，他就在 U.S.C. 教中國歷史和中美外交史。由一個教育家，變為中國問題專家。亞洲文化系在他的主持下蒸蒸日上。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人對中國產生了極大興趣，讀中文的學生激增。他們不愛念中國小學課本的「小貓叫，小狗跳」，所以我們二人便合編了一本中文初級課本按教育原理，每天學十幾個新字，以後把新字編成句子，不斷重複。開始時是油印發給學生，後來印成書出版。不但 U.S.C. 的學生使用，還賣給政府。美國陸海軍要在中國登陸，因此軍隊裡也興起學中文。錫恩認為在亞洲學系系主任這個位置上，有機會宣揚中國文化。

錫恩演講出了名，到處都請他。因此他得了博士後，便要學開車，以赴各地的邀請。有一位演講經紀人 Mrs. Gorhran 聽了錫恩的演講，相信他有光明的前途，可以做自己的搖錢樹，因此

來我們家要求錫恩讓她代為安排演講歷程，經紀人約抽百分之二十。錫恩於是變成職業演講家。邀約不但來自加州，還有很多外州的。錫恩因顧及到身體，在 U.S.C. 又有全時的工作，擔心過於勞累，所以接受時有所保留。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九日，他從金山大學出發，至哈佛大學結束，在美國各大學巡迴演講。這次演講是學術性的，注重比較教育，並有討論會。他所到之處，都是用 U.S.C. 教授之銜，等於間接為 U.S.C. 作宣傳，因此校方踴躍讓他告假，雇人代課。那時他行政工作繁重，每學期只教一門課。瑩去世、晶結婚後，我常陪他開車去演講。他演講的確精彩，英文好、措辭好、口才好。內容有價值，而且聲氣雄壯。回答聽眾提問時，他腦子快，答得簡明扼要。我有時也被請去演講。我們有約定我演講時，他不許來聽。他若在場，我必定太過緊張，說不出話來。在婦女團體演講，多是吃完飯後進行，他常說女主席多是緊張得吃不下東西。錫恩演講時毫不緊張，檔案櫃內有他蒐集的資料，什麼題目都有。去前他用一點鐘或半點鐘，坐在椅上或躺在床上靜思，在腦子裡組織好，有時寫個大綱。演講時他不用講稿，若是人家請他吃飯而後演講，他都能盡量吃個飽。錫恩演講不一定是單獨行動，有時三至五人在一起用座談會的方式，討論關於國際政治或教育問題。

華人社會看到有個炎黃子孫在南加大任教，認為是華人的榮耀，因此家庭或團體的宴會，常請我們參加。我們的生活與中國學生結下了不解之緣。那時中國來的學生約十人，與我們極接近，一九四二年八月錫恩榮任南加大正式教授銜，這十人同學設宴為我們慶祝。此外有全加州中國學生會，南加中國學生會，U.S.C. 中國學生會，是土生的中國人，他們都請錫恩為顧問。年會有時在北加，也請錫恩去演講。錫恩早期對土生的中國人演講時，勸他們讀中文，多了解中國文化。美國種族歧視觀念改善後，他又主張土生中國人應設法溶入美國社會，加入美國主流生活，也鼓勵參加政治競選。

戰前的華人社會多是廣東人，他們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做金礦工人，建鐵路工人。他們的職業限於開中國餐館、中國食品店、中國古董和藝術品店、洗衣店、水果蔬菜批發等等。那時在中國街有兩個女教師教小學。早期的華人，即使是美國公民，也難插足美國人的機構工作。戰前來美留學者，學成後幾乎全部回國，中國政府和社會上，對留學生也另眼看待，視他們為天之驕子，以高薪聘任。中日戰爭期間留學生暫時回不去。戰事一結束，大多都趕回去從事國家建設。

共產黨治華後，情形變了。留學生都不回去。中美建交，中國門戶開放後，由中國來的留學生也多不回去。臺灣地盤小，粥少僧多，臺灣來的留學生也不回臺。因此，現在有說國語的華人社會，盼望不久之後，中國政府能為留學生創造較好的工作條件，每個留學生都要回國，建設一個新中國。

今天在美國華人在大學任教授的多得很，也有做校長、副校長、院長的。高級人才能插足美國機構，還有几位得諾貝爾獎的人。中國人頭腦聰明，肯埋頭苦幹，個人成功者比比皆是。華人

今天在美國能享受到平等權利，應歸黑人民權運動成功，白種人承認種族平等。可惜中國人做種族鬥爭的不多。

八年抗戰，我們雖有穩定的生活，但心中都有臨時感。我繼續在 U. S. C. 讀書，博士學分讀完，四個半天的筆試也及格了。畢業論文暫定兒童福利，我花了不少時間，調查美國兒童福利工作，也去一些孤兒院住過。

戰後錫恩接協和大學校董會來信，聘他代理協大校長一年。錫恩立即答應了。林景潤先生自一九二七年收回教育權運動後，一直任協大校長。學校遷閩北邵武，大家生活艱苦，有人反對他，也有人想取而代之。林先生真是鞠躬盡瘁，身體、精神好像都要垮了，確實有必要休息一年。我們兩家在金山一起吃飯時，錫恩對林先生說：“我今天接受校長之職，明年此時奉還給你。”林先生笑逐顏開，十分快樂，知道錫恩無取代他的野心。

錫恩向 U. S. C. 請假一年，亞洲學系的工作由人代理。我們一家人就忙於準備。那時國內物資匱乏，因此要帶的東西很多。美國軍事結束，軍隊未用的東西、軍隊剩餘儲備物品多得很，我們在這樣的鋪子裡，買了幾個蚊帳、幾床褥子。知道孩子若去文山住宿，要穿藍色的掛子、黑色的裙子，所以也備好了布料。此外還帶了藥品和不少書籍。我們來時只帶一個大箱一個小箱，回去時卻帶了八個大箱、十二個小箱。如此做，也是因為想可能就不回美了，預備了幾年的用品。

四個人的船票，由紐約基督大學基金辦公處代購。不巧的是船票定好後，金山碼頭工人罷工，不能開航。我們在洛杉磯家中等了兩個星期，以為工潮快解決了，便動身去金山住在旅館裡等，不料又等了兩星期才啟錠。那次同行的協大教職員有十幾個人，有中國人也美國人。中國人多是以前協大學生或教員來美進修的，美國人則是回美度假的。

那時期坐的船都是戰時運軍隊的船，船名都是用 Marine 代替以前的總統號，大家都坐統艙，每艙約廿餘人，男女分開。我與兩女同艙，錫恩在男生艙。吃飯時多是錫恩來找我們，然後一起去餐廳，吃的是自助餐。船內有交際室，也可以在船頂散步。那時晶十三歲，瑩十二歲。

在船上錫恩與回國的留學生打矯牌，開了幾次協大的教職員會議。雙十國慶時，他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抗戰勝利，大家回去有建國之熱情。

錫恩做個激昂的演說，情緒很高。大家唱國歌，表演京劇、歌舞、雙簧，熱鬧非常。有些美國人也是去中國工作，愛中國，因此也踴躍參加。錫恩有領導的天才，他登高一呼，大家都樂於響應。我們在船頂集會，來的人不少。

第十二章 一九四六 -- 一九四七校長生活

一九四六年，大約雙十節後的一、二天，船到了上海。一別十年的國土，覺得十分可愛。幾隻小船駛靠大船，上來一些人大約是海關和移民局人員。我們在船頂等消息。太陽落山，天色轉暗後，有人報告說：中國人可以先下船。一些中國人發出歡呼之聲。大家提著行李魚貫而下。那時天已全黑，有人用手電筒往乘客臉上一照，便可離船。那天我們感到黃皮膚的光榮，也很驕傲自己是中國人。

在上海我們住在農民銀行樓上。行長朱潤生的夫人黃文玉是我在文山時老師，與錫恩也是在紐約時的好友。黃文玉大約五十多歲嫁給了朱潤生。我在燕京時，曾聽說黃文玉與錫恩有一次在劉公紀念堂做禮拜時，他倆坐在一起。一九三〇年福州所有的禮拜堂，還都是男女分坐的。據說初期的禮拜堂，在男女座位中掛著布簾子，彼此看不見，卻都能看到臺上的牧師。那時黃文玉在文山任校長，錫恩從協大回家看父母，路過文山時去看黃文玉。那天是禮拜天，二人便一起去做禮拜。兩人商量要不要坐在一起，文玉說不怕，錫恩說不怕，所以便在後排空位坐在了一起。這在當時是個新聞，因此傳至北京。我當然沒有顧慮，因為文玉比錫恩大十幾歲。

協大的教職員也在上海等船，然後同船回福州。因為金山碼頭工人罷工，福州的師生在學校等了我們好多天。我們到時，大家在學校碼頭歡迎我們。第二天錫恩召集教授會議。第三天學生就註冊上課。校內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我的博士學位只差論文，所以合格在大學教書。我開了三門課。那時教書不容易，一無課本，二是參考書不夠，大多只靠教員演講、學生筆記及討論。第一個學期「社會學概論」就有五十人，第二學期進教室看見一百多人，嚇了我一跳，不得已只好宣布說，上學期未註冊本課者，請註冊其他功課。協大有文理學院和農學院，抗戰和復員時期只能有什麼教員開什麼課。

因我們來晚了，決定寒假不休息。師生對抗戰期間大家為生存而奮鬥，談不上學術。錫恩做了兩次關於大學教育的學術演講，禮堂內都是座無虛席。我聽到一個圖書館員說，能夠聽到這樣的學術演講，可以說不負此生了。

學校的師生、工友都很窮，錫恩為他們去美援機構求乞，有時送來奶粉、麥片等。人窮了都很小氣，比如一大罐奶粉四家均分，大家要抓籤看罐子歸誰。學生們上學時交了一學期的膳費，但通貨膨脹，米價日升，廚子便不能繼續供給伙食了。錫恩為此要去省政府申請平價米。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倉前山午餐，飯後他去 UNRA（美援機構）看看有什麼好東西。主管的人指著一輛大卡車說，這是今天剛來的，你若要就得開走，不然別的機構要拿去了。錫恩雖開了幾年車，卻從未開

過卡車，他講 UNRA 的司機陪他開離鬧市，然後他一個人把卡車開回協大。學生、教員們一傳十、十傳百，說“校長開了一輛大卡車回來了”。圍觀的人多得很，大家都十二分快樂興奮。校長成了個大英雄。那卡車兩旁本有很高的欄杆，人們手巧，用油布加工製作了一個大車棚。兩邊還裝了長凳子，後面也裝了欄杆，中間有個小門，門放下來是個小梯子，收起來又是欄杆的一部分。卡車成為協大的校車，每天開到城裡一次，有兩三個車站，傍晚開回來。週末大約另有加班。

有一次學生演話劇，十分精彩。劇悲處我當然流淚。第二天校刊說”校長出巾為夫人拭淚。”大約錫恩把手巾借給了我。我們請全體演員和幕後人員來家中吃飯，他們簡直不相信有這樣的事，興奮又感激。那劇中的女主角張瑟音至今還是我們的好友。她常說：我從小學讀到大學，最快樂的一年，就是陳校長任協大的時期。

張瑟音夫婦現已是巨富。瑟音在臺灣是祐德中學和協和工商的校長，學生有七千人。她用錫恩寫的協大校歌的曲調，做她的學校的校歌。有一次錫恩赴臺，瑟音請他來校演講，校內掛了許多“歡迎陳錫恩校長”的橫幅。入禮堂時學生起立，樂隊奏錫恩寫的校歌，學生也唱校歌，錫恩很受感動。又有一次瑟音率領他們學校選出的學生文化訪問團來美國各地表演。到洛杉磯時，瑟音打電話說某日來看我們。沒想到那天一輛巴士停在街上，下來了幾十個學生。他們在我前院唱校歌，還表演了其他節目。瑟音夫婦在美國擁有很多地產，在 Palos Verdes 有所房子，經常來往於臺灣和美國兩地。每次來洛都請我們吃飯。

一九五四年以後，錫恩常去臺灣赴會，協大校友都熱烈歡迎。張瑟音夫婦更是特別招待。最感動人的是，有一次錫恩從香港去臺灣，飛機至臺，一些校友在機場迎接，並請他去吃午飯。他說不餓，大家說等一時再去，陪他一起至旅館。他難卻眾人盛意，便同學生們一起走出來。大概在港時參加宴會太多，沒走幾步，不測的事發生了。學生們把他扶回房間，替他換衣服、洗澡。張瑟音親自把的髒褲子在旅館澡房沖淨，又帶回家去洗。午後病情仍未見好，大家便把他送去醫院。醫生認為失水太多，把滴露掛上。那晚張瑟音夫妻一夜不睡，坐在床前照料。U.S.C. 的一個美國女生 Mary，正同丈夫在臺，知道此事，便請美國軍醫去醫院看他。住院大約兩天，他囑咐人們不要讓我知道。結果我還是間接地聽說了，報信的人說，他姐姐來信說，錫恩昏倒了送進醫院了。我嚇了一跳，立刻往臺灣打電話，他說沒事，明天按原定時間回來。

魏非比教授也很想念在協大的生活。去年來洛，她和我客廳開談時還說，錫恩做校長時，是她最快樂的一年。說錫恩體貼和欣賞教授的貢獻，也愛學生。這些一在小事上都可以看出來。有一次開會，歌團獻歌，結束後學生們把禮服都放在房間裡，她指揮大家來整理衣服，忙得滿身是汗。正埋怨時，錫恩頭伸進來說：“非比，你做完了沒有？我送你回去。”非比一下子氣都消了，快樂地與錫恩一起回去了。又有一次她在指揮學生練唱，下午要進城表演。錫恩對她說：“學生唱完，你帶她們去冰淇淋鋪子，喝一杯冰淇淋解渴。”那次他們大約是坐校車去的，教授學生都非常

快樂。共產黨治華後，非比去香港教音樂。我們每次去香港，她都熱情招待。錫恩的母親生病時，寄錢回福州，及以後做壽衣等，都是由她代辦的。

還有一位學生丁祝三對我們也特別好感。協大是基督教大學，一九二七年反基運動後，宗教自由，所以教授自動簽名要領導團契，學生自動在某教授名下簽名參加某團契。我做了教授也領導了一個團契。丁祝三是我家中團契學生主領者。大約事前都唸些印刷品，每月一次晚飯後來我家討論些宗教、哲學和人生的問題，然後吃茶點，我們回美後，丁祝三跟我們通信。他長於音樂，錫恩為他安排來 U.S.C. 讀音樂碩士。丁家現在移民澳洲，每年陰曆新年元旦，都給我們打電話賀年。一九九一年元旦前幾天，他寄來一張紅色的祝壽卡片，外面有「90」。我拿給錫恩看，元旦的早上我又把那卡片給他看，吻他，祝九十大壽快樂。他也很快樂。一會，祝三的電話來了，我謝謝他，並告訴他我今天又給錫恩看那卡片。然後我讓祝三直接對錫恩祝壽並賀年。今年祝三元旦又來電話向我賀年，我記起去年的一切，未免傷心。

晶、瑩一九四六年秋去文山住宿，晶十三歲，瑩十二歲。在校時和別的孩子一樣，穿中國式的藍布褂子、黑裙子。她們住在初中宿舍，數學跟初中，漢文跟小學四年級。每星期禮拜六早上回家，禮拜天下午回校。她們生長在半熱帶地區的洛杉磯，那裡的孩子發育快，她們已像成人一樣高，兩個孩子都是 5.45 呎高。從文山回協大時，她們多穿美國衣服。在校船或校車上，協大的學生跟她們練英文，至今協大學生跟我通信還提及與晶、瑩談話的經過。因為是校長的孩子，特別引人注目。校長住宅是協大山上最高的房子，孩子們從山下走回家，要經過男生宿舍，很多學生都往窗外看。

晶、瑩六歲時，我每星期兩次教她們請中文，用的是中國街買的小學課本。她們六歲後也開始學鋼琴。U.S.C. 音樂系有教小孩子彈琴的制度。大約彈了五年，錫恩去請教音樂系的教授，孩子有無音樂天才。錫恩盼望自己愛好音樂的天才傳給孩子。音樂系教授說，她們彈得很好，很聰明。於是錫恩知道孩子們對音樂沒有特別的天才。每天叫孩子練琴很不容易，家中的一架鋼琴，多數時間都空著，要練時兩人搶著坐到琴椅上；不要練時，一、兩天都沒聽見琴聲。錫恩與音樂系教授談話後，對孩子們說：“今後你們若喜歡繼續彈琴，可以繼續，每天要好好練琴。若不喜歡，就不必去從師了。”孩子們如蒙大赦，就沒有再彈琴。我們也輕鬆了，不必督她們練琴。

抗戰期間文山也遷去邵武，大約沒有訓練彈鋼琴的人才，所以晶、瑩是文山獨有的司琴者。雖然已一年沒練，還彈得來。有一次文山有個慶祝大會，請錫恩演講，司琴者是陳晶，我記得她彈的是紅豆歌。錫恩演講內容我已不記得，但開頭語還記得清清楚楚。他說：“我和文山的關係很深，因為我母親是文山中學畢業、我妹妹也是文山畢業。妹妹在文山時我常來帶她回家，那時覺得文山是可敬的；我內人也是文山畢業，在文山教書，那時我又常來文山，我覺得文山是可愛的，現在我兩個女兒都在文山請書，我覺得文山是可靠的。”

那天我是來賓之一，坐在後排。聽前排兩個女人談話。一個說：“你看見彈琴的那孩子嗎？她是協大校長的女兒，人家說她只十二、三歲，十二歲的孩子怎能那樣高大，真是不可相信。”另一個說：“我姑母和她母親是同學，有一天姑母特意來文山看那兩個孩子，說那孩子就是十二、三歲，因為姑母知道他母親是哪一年結婚的。”我沒有做聲，心想我們的孩子變成世界七奇觀之一了。其實我們的孩子是頂正常的。抗戰期間中國孩子們也許缺乏營養特別矮小。

那時期有些年輕的男教授與女生交朋友，沒有合適的約會地方。在學生方面，男女交際，可以在女生宿舍內的會客廳相會，可以在閩江邊散步，可以往樹林裡選一塊石頭坐談，然而教授們覺得這辦法不太方便。我們告訴他們，你們若有女友，可以來我們家中晤談。

我們回協大那天，陳家弟妹都來協大，與協大一些人同去馬尾接我們，母親沒有去。到家後弟妹要回去城裡，錫恩對弟妹說：“我和你們同去看母親就回來。”那時去福州，要坐校船，平均一點鐘，因為看是順水或逆水。然後換坐洋車，大約也需要一個鐘頭。我對錫恩說：“你今天已經很累了，不能去了。明天清早就要開會，以後你要管的事還多得很。等事情安定後，我和你一起去。母親會感激我細心照顧你，她會理解的。”弟妹回家報告了情況，母親第二天就來了，很高興的說：“他不能來看我，我來看他好了。”那年陳母常來，婆媳間頗有感情。錫恩去上海或南京時，老人家還特意來與我做伴。

有一天晚上，我和陳母在書房內看書，鈴響了，一個教授帶了個女生來，我請他們去客廳。過了一忽又有一對來，我請他們去飯廳。不久又來了一對，我說：“媽，我們要上樓了，因為他們要用書房。”對於男女的關係，陳母大約比我的父親還開明些，我告訴她我們要幫忙年輕的教授，她還理解，笑著說：“你們的生活很有趣。”

林景潤校長來美不久病倒了，醫生診斷是肝癌，那時期肝癌的病人活不過一個月。紐約基督教大學基金會寫信給錫恩，消息傳來，有人喜，有人悲。我們是屬於悲的一派。林那時在紐約的一所醫院裡，我們也知道林景潤離校時有些傷心。那時有兩個學生自治會的常務委員在我班內，課後我跟他們談話。我告訴他們林校長危在旦夕，我要求他們用協大學生的名義打個慰問的電報給林校長，他們答應了。後來基金委員會的負責人，寫信告訴錫恩說，把電報送給林校長時，他喜極而泣，斷氣時還把那電報緊緊地抓在手上。以後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學生，並讓他們了解，給臨死的人的一刻快樂，是一件好事。在錫恩的主持下，協大為林校長開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大家又興奮起來，認為錫恩是永久的校長了，校董會寫信給錫恩把“代理”兩字取消了。然而我們心中反生猶豫及顧慮。

第一學期很平靜地過去了，第二學期卻不同了。北京傳來“沈崇”事件。沈是北大學生，一天晚上去看電影，回校晚，被一個美國兵強姦了。消息傳出三、四天後，學生大騷動，反美的情緒也高了。我們得知學生要開全體大會，罷課三天，還要去城裡作反美示威遊行。學生開會的早

上，我們教員先開會，教務長兼訓導長鄭作新說：“我要去參加學生大會，誰肯陪我去？”我說：“我陪你去。”那時禮堂已坐滿，大家情緒激昂，主席就是我班內的一個學生。上臺時大家鼓掌表示擁護。他述說“沈崇”事件，然後提出議案。發言的學生讚成罷課及遊行的都大受歡迎，大家就鼓掌。有反對意見的就立刻被壓下。開會的結果，當然是決定罷課及遊行。議案後會長叫鄭作新說話。鄭站在家長的立場，勸學生們行動小心，要用和平的手段，不可暴動，以防被鎮壓。他說話沒人鼓掌。我沒想到主席也請我發言，我不得已也上台。我說中國傳統的觀念是重貞操的，尤其是女子的貞操。現在一個女子被強姦，她又是一個大學生，所以我們為她抱不平。對強姦她的人憤怒、生氣，乃理所當然。不過犯罪者是個人。那美兵當然是罪人。中國及美國的法律，大約都有懲罰這罪人的辦法，我們應要求中國及美國政府重罰這個罪人，我們不可因一個美國人犯罪，而歸咎全美國人。我在美國時也聽說過，或在報上讀過中國人在美國犯罪的事，我絕對不要因那中國人犯了罪，美國社會來攻擊我，更不要全美國人，起來攻擊我們中國政府，這是我此刻的感想，供大家參考。說完也沒人鼓掌。事後好些學生告訴我說，我說得十分有理，他們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以後我們才知道主張開大會、罷課、遊行都是共產黨的花招，他們早就計劃好，把共產黨員或傾向共產黨的學生，安排在禮堂的各角落、鼓掌。多數人沉默，沒有發言的機會。

大會後，學生們即在積極地預備遊行示威，當然聯合福州一些學校共同行動。那時我們家中有客，就是紐約基金委員會的書記 Dr. Fenn。學生遊行的那天，我們教員又開會，大家決定要錫恩下山與學生談話。我送 Dr. Fenn 去坐校車，司機說今天校車不去福州，因為沒有鑰匙，鑰匙被學生拿去了。我看見我那寶貝的學生——學生會長，他的手上有一串鑰匙。我告訴他，Dr. Fenn 要去福州，坐船回美。學生會會長那天的臉色與平常不同，鐵板著面孔說：“學生必須用這校車。Dr. Fenn 只好坐船去福州。

錫恩走至碼頭，看見學生已租好一隻大船，許多學生都已上船，船上掛滿標語，有些學生在船上領導嚷口號，“打倒美帝！”“為沈學報仇！”情緒十分激昂，沒有他說話的機會。就是說話，他們也聽不見。這經驗在錫恩是第一次，覺得無辦法，無能為力，只好喪氣地回校長室。在遊行時，學生須用那校車，車上可以掛標語，指揮者都可以在車上嚷口號。那天遊行示威，學生平安返校，沒有暴動，沒有流血，我們也鬆了一口氣。回家後我們二人交換意見，回憶我們年輕時參加過的“五四運動”，對學生發生同情。第二天兩個學生主領者來到我們家中，道歉說他們的行為是不得已的，是大家的意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學生又有反饑餓遊行示威。因為通貨膨脹食物昂貴，學生說我們有平價米吃，可是許多貧民部沒有平價米。通貨膨脹是一個很壞的現象，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我們在協大的一年是賠錢的。有一天吃早飯時我告訴錫恩，你今天的薪水今早都吃到你肚子裡了。那時期他主張早上吃三種水果。在美國看報時我們注意營養欄，那時有些人就這樣主張。Hitler,

Massolili 都這樣吃。錫恩因為身體的緣故，對營養是不省儉的，我當然也完全同意。

還有一次我進城想買做蚊帳的料子，那時福州話叫“六角紗”。因為我覺得錫恩必須用最好的蚊帳，美國軍用的蚊帳不夠好。到一個鋪子，我覺得價錢太貴，又到一個鋪子更貴，越走越貴。我回到第一家，價錢也提高了。那就是說一個鐘頭內，已覺通貨膨脹之壓力。

既管不住學潮，又感通貨膨脹之苦，我們趨向回美了。協大師生及福州社會覺得協大非有錫恩不可，他的朋友勸他做下去，我的朋友也向我施壓力，叫我勸錫恩。學生會也決定罷課三天挽留校長。大會時他們派代表請校長發表意見。錫恩去了告訴學生說：“你們用罷課來解決問題，用罷課來挽留，可把我嚇走了。我感激你們的誠意，但你們還是好好地去看課，我這方面也慎重考慮。”學生竟然上課了。我們也慎重考慮，做下去是抱著犧牲的精神。我對錫恩說：“人的生命也就是幾十年。以犧牲的精神把生命貢獻給最必需你的地方，更有意義。協大比 U.S.C. 更需要你。”我們也跟孩子商量，她們當然比較喜歡美國的生活。不過我們若是要為協大犧牲，他們也肯犧牲。我禱告，求神為我指導應走之路。

大約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們正吃晚飯，教育廳長光臨了。我們請他便飯，他說他的車在山下，省主席劉建緒要請錫恩吃飯。錫恩沒吃完飯就跟他同去，那是晚上六點多鐘。至十點多鐘錫恩還沒回家，我有點掛慮。那時我們家中有個電話，要撥至協大電話室，由他們轉去其他地方。我撥了電話，不通。我走去山下找電話員，那地方沒有人。我又去找校車司機，叫他開去省政府看看，司機也不在。校內好像什麼人都沒有了。好不容易碰見一個職員，我知道他是國民黨黨員。我告訴他錫恩去了好幾個鐘頭還沒回來，我也告訴他找不到電話生和司機。他叫我不必掛慮，絕對沒事。我請他幫忙，他又無法幫忙，他也不肯幫忙。孩子們都住校，我一個人守著那樣大的房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去，又睡不著。夜晚了，一個人也不敢再去山下。好不容易等至凌晨兩點多鐘，他回來，只說：“今晚有大事發生，我不能說，也沒有力量說，因為我太累了。”我幫他換睡衣，他躺下就睡了。我還是睡不著。四點多鐘，山下有喊叫聲，聲停了，我們樓下有人打門，我下樓，女生宿舍的工人說，女生主任要校長去，因為軍人來要帶走一個女生。我不得已叫醒錫恩。出來大門兩旁都是軍人，那時有一些教授也醒了，從窗戶往外看。我們走至女生宿舍。一個女生說：“校長，他們要逮捕我。”錫恩問軍人說有無文件，軍人把文件給錫恩看，那女生的名字在那文件上。錫恩告訴那女生說，你跟他們去，明早我去見劉省長。

離開女生宿舍，錫恩去鄭作新家，述說夜間校內發生的事件，並說：“晨八點鐘左右我和你一起去省政府。”

我們一到家，許多男生也都來了。大家都很氣憤，男生被捕者約有二十多人。錫恩說：“此刻我不能做什麼，八點鐘我和鄭作新去省政府，看能不能把他們保出來。”

晨八點他們二人坐校車去省政府。政府方面說被捕的學生都是共產黨員，要把他們送去延安，被捕者中有一個學生，名字不在名單上，你們可以把他帶回去。

午時錫恩回家，帶回了那個男生。他上身穿著背心，下身穿著短褲。我立刻叫工人預備熱水給洗澡。那時期協大的設備與戰前不同。抽水馬桶、浴盆都沒有了，電燈就是一個燈泡從屋頂掛著。我們恢復一百年前的辦法。工人要用柴火在鼎內燒熱水，澡盆是木頭做的，一個圓形大盆子。工人燒好用桶盛了熱水然後倒在圓盆內。學生洗了澡，換了衣服，與我們共午餐。飯後錫恩說要去休息，我在等學生回宿舍，他又不走，一下子來了不少的男生，都在客廳裡搶著說話，不便趕他們走，所以去找了鄭作新來。他說：“校長和太太都累了，你們去宿舍或教室談吧。”

錫恩後來述說三十一日晚上的經過。那天晚上他到省政府，和教育廳長及劉主席一起吃飯。飯後劉主席說：“我們接到消息，六月一日福州全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協大的學生是三罷的領導者。”錫恩實在不知道有這樣的事要發生。劉主席給了他一個名單，要他請學生到家聚談，軍隊去逮捕，然後送他們去延安。錫恩說：“我回母校來是為了辦教育。我不問政治。你若問我哪個學生功課好，我可以叫教務長把名單給你。但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黨員，誰是國民黨黨員。這名單我也不必看。協大是中國領土，你們有行動權。但是對不起，這事我不能幫忙。”大家很不自然地寒暄了一會，教育廳長先走，接著劉主席也走了。一個祕書陪他。一忽那祕書說汽車來了，請校長上車。錫恩以為送他回家，原來是去警備司令部。有個祕書很客氣地說：“請校長到這裡來。”把他領到一個房間裡，除了桌椅，其他什麼也沒有。坐了一忽，錫恩出去找人，問：“我是否被捕了？或被拘留了？”那人說：“沒有，我們不敢。”實在無奈，錫恩又去找人，問同樣的話。結果他也氣了，說：“你們要我在這裡做什麼？”那人不得已，說：“你知道機密，所以要等事情過去後才能放你回去。”錫恩說：“你用車送我回去，派個人跟我。我應許不跟任何人講話。我家中只有個妻子，我也不告訴她。我現在必須是躺下床睡覺！”但他們還是不放他。到一點多鐘他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出去到停車處，看見有個轎車，車內有司機。錫恩告訴那司機：“我六點鐘被請去省長處吃飯，現在已一點多鐘，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我要你立刻送我回協大，不然我要倒下來了。”他命令那司機走，立刻走。也許那司機就是預備送他回去的，所以發動了汽車，開向協大。離校門還有一段路，司機就停了，說：“我不能送你到校門，因為怕人看見。”所以錫恩拖著沈重的腳步，慢慢步行回家來。到校門後，他還要走一段路和幾十級台階。到家時我真是驚喜交集，扶他上樓，幫他換睡衣上床。錫恩那晚步行到家是個奇蹟，半夜的校園是漆黑的，公路上也沒有路燈。

事後校內師生都在談論三十一晚發生的事。學生說那晚有軍隊坐汽車來。也有兩艘軍艦停在閩江，兩架大機關槍向著協大。據學生說那晚被捕的有四十人。第二天那軍艦又來協大前駛來駛去。一個男生跑來我家，要我保護他。我讓他在我的地下室躲了一天，還送東西給他吃。

第二天被捕學生的家長也來了，他們不要把他們的孩子送去延安，然而協大也無能為力。

女生宿舍學生，也來告訴我們有關情形。那被捕的女生，三十一日整天在房內收拾東西。有些東西燒掉，有些東西及紙，用大量的水吞下去。錫恩也記起來，每次他演講，那女生都是坐在前排寫第記。錫恩還以為她欣賞他的演講。現在想來她大約是負責做報告者。

學校經此大風波後，教職員會議決定停課提前放暑假。那年的畢業生，事後得了證書，證明一九四七年畢業於協大。

協大的師生也不敢再勸錫恩為母校犧牲了。錫恩說：“回閩一年，談不上辦教育。做的是替教員和學生去 UNRA 求乞、去省政府求乞。現在置身於國、共的鬥爭中，若做下去，必定被他們的戰火打得焦頭爛額，只有回美國去。”

三十一日晚上，我曾去山下找電話生和司機，但誰也沒找到。原來那天晚上工人也在開會，預備三罷。那晚福州其他學校，雖然都沒有學生被逮捕，但中國別的地方卻同樣都有三罷和逮捕的事發生。

要離開協大了，卻又依依不捨。教員和學生對我們是那樣好感，校園又是如此秀美可愛。協大的校長室蓋在山頂上，三面都可以看見閩江風光，俯瞰校內的樓閣。文理學院兩樓的外觀是中國古典式建築，真是美不勝收。在美期間，我們常聽說，也讀過歐洲的萊茵河之美。一九七〇年夏，錫恩在德國教書，慕名特意去德國境內萊茵河畔觀光，但那絕對比不上協大校前的閩江。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戰爭，在東北已經開始，中國前途難以預料。共產黨在學校內滲透的政策我們已嚐過。所以只有走的抉擇。但萬沒想到那次的離開，竟是與協大的永別。

帶回去的箱子，有些還沒有啟開過。許多日用品如蚊帳、褥子、被子等，我們都送了人。教育及社會學的書籍，都送給了協大。

臨行那天，沒想到協大師生租了一只大船來送行。大船上站滿了人。陳母及弟妹也同坐大船去馬尾。船上掛著橫幅：“歡送陳錫恩校長赴美！”“福建協和大學”等。聲勢雄壯。船開駛時，大家情緒都挺好，唱著校歌，好像不是送別，而是一起去旅遊。船靠大船時，我們二人跟所有的人握手道別，並向他們致謝。陳母眼中含淚，我也流淚了。錫恩對母親說，我要把弟妹們都接來美國留學，你也可以來美國玩。並且我們還要回來的。我們一家四人終於上了大船。協大的船駛離時，我們站在船舷邊向眾人揮手作別，那時我哭得像個淚人一樣。聽見旁邊有一個船婦說：“校長要去美國，太太又捨不得離開協大。”

去上海的船定在第二天清早啟錠。那晚一夜裝貨。那時已是機械裝卸貨物的年代了，所以聲音很大。我們訂的是洋艙。頭一次來美時乘福州到上海的船還能訂到兩個房間。但此次船太滿，虧得魏非比託了她的哥哥，才訂得這房間。艙內有上下鋪及一個沙發椅。晶、瑩睡上鋪，錫恩睡

下鋪，我睡沙發椅。數十年來我都是把最好的設備讓給錫恩，因為他的身體不好。

與協大諸人告別後，我們四人很開心，到處觀看。船未啟碇時，船內不供給食物，大船旁有許多賣吃的東西的小船。但我們寧可吃自己帶來的。吃完後天還亮，我提議再出去玩，錫恩卻要睡了。那時大約是午後七點多。數月來錫恩每晚都感覺疲憊，躺下去就睡，但一覺醒來，卻再也睡不著了。那天晚上他真是”無官一身輕”，一躺下去，一直睡了十二個鐘頭。外面那噪雜的裝貨的聲音，以及我們三人出去回來，孩子們爬上床的聲音，他說他都沒聽見，也一點都不知道。

第二天清早開航時，天氣溫和，陽光普照。我們四人依著欄杆看景緻。由閩江出海那一段的風景最美。兩邊有山，山旁的崖石千姿萬態，千變萬化。有的像只靴子，有的又像隻老虎。走遍滿天下，也難找像福州那樣美的風光。

到上海時，我們又是住在朱家。那時他們住在法租界的一個三層的洋房裡。黃文玉夫婦住第二層，我們一家住第三層，第一層是客廳、飯廳和廚房。圍牆內還有美麗的小花園。

回美的證照是不成問題的。因為那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是燕京大學前校長司徒雷登。錫恩手上有南加大的聘函。以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行政人員，每年在上海有一、二次會議，所以錫恩與司徒雷登認識。按當時的規則，移民來美者，要照胸部的X光，我們當然照。

抗戰後很多中國留學生都回國參加建設。我們的好友陳則揣博士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作生物研究。他回國時曾帶回一個冰箱。一九四七年要回美，就把那冰箱賣了。得價六、七百美幣，買主給他國幣，在通貨膨脹的中國，大約有一百多萬。這麼多的國幣，不知如何處理，則揣向錫恩告急。農民銀行行長派一輛汽車，我們隨車至則揣處，司機及銀行人員把國幣裝在兩個口袋裡，載它去農民銀行，第二天農民銀行給我們一張支票，我們趕快拿著那張支票去買中國地氈。在通貨膨脹的國家，這是一件很有趣的經驗。回美國乘的又是戰時運軍隊改造的船，好像叫 Marwine Ada，也是男女分艙。經過了數月緊張的生活，這次真是我們的休假。船到金山前一夜，我一夜未睡，掛慮移民局人員看了X光後，若因為錫恩只有一個肺，而不許他入境，那我們四人都只好回中國了。船下碇後，大家都排隊見移民局人員。輪到錫恩時，我從旁看見錫恩與移民局人員談得津津有味。兩人說說笑笑好像相當投合。原來那人知道錫恩是 U. S. C. 教授，他們二人大談 U. S. C. 足球。那時 U. S. C. 足球乃是全國冠軍，錫恩及兩女都是 U. S. C. 球迷，那人也是 U. S. C. 捧場者，故二人情投意合。看了錫恩的X光，那人說：”你太太及你的兩個女兒的肺都正常，當然你的病已過了傳染的時期。”與錫恩握手道別，並祝他前途光明。這樣子過了一個大關。那晚我們四人在金山旅館過夜，那夜輪到我一覺睡到天明。我們回福州時，把樓上房子轉租給人，決定回美後寫信給租戶，碰巧樓下房子空出來，所以租戶還住樓下，我們又住原來的房子。

第十三章 一九四七 -- 重返南加州

我們一九三七年來美升學，然後做教授，心中一直有暫時感。現在總算正式移民來美，有了永久居留權，所以作長久的計劃。一九四八年我們買了自己的大房子，樓上三臥室，我們用一間，晶、瑩各用一間。美國長大的孩子，到了十幾歲時覺得自己有個臥室是天經地義的，不然就是不正常的生活。樓上還有個項大的天台，樓下的客廳太大了，我們帶回的兩個中國地氈，都鋪在地上。兩張沙發和幾把椅子，只能佔客廳的一半，因此買了一個大鋼琴，放罩在客廳之另一半。此外還有飯廳、書房和一個小客廳，書房內有兩張書桌。地下室也大得很，有暖氣的爐子，熱水箱、洗衣機等。最要緊的，是我們帶回的這許多大小箱子，都有了地方放。地下室有門通至後院。錫恩每天要回家午膳和午睡，所以我們的住處離 U. S. C. 不超過五里。

在這大房子裡我們招待過不少人，除親友和貴賓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學生。那時期在 U. S. C. 請書的中國學生有卅多人，每年聖誕節、除夕晚上，都是在我們家中過節。我是唯一的廚子，錫恩和孩子是幫手。飯後大家圍著鋼琴唱聖誕歌，都由錫恩司琴。他不必用琴譜，凡他會唱的調子都能彈出來。我對於他這種天才很欣賞，也很高興看他能夠這樣彈琴。

有一次南加州各大學中國來的學生在我們家中開舞會。客廳內兩個地氈都捲起來做舞場，不跳舞的人，可以坐在客廳椅子上，還有飯廳、書房及小客廳廚房有些零食和飲料，所以在廚房裡的人也不少。那晚有一百多人參加，熱鬧非常，我們不跳舞，但很高興與年輕人同樂。美國很多團體都靠舞會賺錢，門票頗不便宜。那天我們家中的舞會，好像沒有收錢。

回南加大後，錫恩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中國問題，尤其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宣揚中國文化和美中文化交流。以下是他在校外主持或參與的一些社團的情況：

(1) 南加州中國社團

這是那時洛杉磯地區唯一宣揚中國文化的社團。創辦人 Dr. Willian Hummel 曾請錫恩去演講，錫恩對它發生了興趣。一九四二年 -- 一九四四年錫恩任會長時，把 China Society 辦得空前興旺。他曾請洛城名人如市長 John Anson Ford 和 David Ferry 任理事。Ferry 是位名律師，生於中國，其父乃袁世凱的醫生。兩年的國慶，錫恩都請到一流的名演說家。第一年是 John B. Hugh，他是無線電時代一流的新聞報導者。那時電視尚未問世，會場設在 Ebell 俱樂部，John B. Hugh 做現場播音，參加者數百人。碰巧那天美國對中國的移民率放寬，大家精神特別好。第二年請的是 Pearl Buck，那時她的傑作 “Good Earth” 已拍成電影，名噪一時，後來又得了諾貝爾獎。會場也在 Ebell，參加者亦數百人。China Society 現在的負責人也說，錫恩為他們演講

好幾次。五十周年紀念會時，又請錫恩為他主持，他組織了一個下午的座談會。晚宴還是錫恩演講，參加者比平時多過不止兩倍。

(2) 亞洲文化學會

這是美國最大的亞洲學會，包括所有東亞國家及印度、菲律賓等，中國當然是亞洲項要緊的國家。每年開一次年會，錫恩是會員，每次年會都參加，並曾主持討論組。我記得有一次在華府開會時，錫恩請所有中國人專家，去一家中國館子吃飯。他在註冊處貼了個通知，有個人在桌子上，請參加的人簽名。這要費很多的心力，去館子商量，定菜，計算每人要收多少錢。他喜歡在任何場合做些特別的事。

(3) 亞洲文化學會西岸年會

亞洲文化學會是在美國東岸產生的，主要角色都是佔優先的美東學者。早期開會都在美國東岸舉行。後來大家主張在美各大城市，包括西岸開會。有一次在金山開會，錫恩便召集西岸各大學的代表一起聚會，結果產生了西岸年會，西岸的學者多有機會發表論文和主辦學術座談組。西岸年會至今仍很活躍。

(4) 中國文化學會

這個會也產生於美國東岸，發起人是程其葆、薛光前等。該會成立時便請錫恩參加。最初只是某禮拜六在 Maryland 大學討論中國問題一天，然後中國大使館請大家晚宴。由於這是專門討論中國問題的會，錫恩自始便很感興趣，不久被舉為會長。在他的主持下，會期變為三天，即禮拜五晚開始，禮拜天中午結束，與其他學術團體的辦法一樣，注重發表論文和分組討論。初期多在華府和紐約舉行，現在在美國各地舉行。錫恩每年都參加，並任重要職務，直至三年前，他不能做長途旅行。1990年的年會，在加州桔縣舉行，我們去參加了晚宴，負責人還贈給錫恩一個獎牌。

(5) 美國的中國人教授學會

這個會是錫恩創辦的，他也是首任會長。每年晚宴一次，請中國名人演講。會員是南加大學的教授。一九九一年年會請我去參加，第二任會長 CalTech 的陳教授述說錫恩生平，算是追思會。以後另有名人演講。

(6) 中華益社會

這是為說國語的老人而設的。中日戰爭、共產黨治華後，中國和台灣來的留學生都不回去了，在此成家立業。有些人還將父母接了來。美國政府對老人的福利很優厚，六十二歲以上，可以領老人救濟 (S. S. I.)，每人每月六百多美元，醫藥免費，老人公寓每月租金只百餘元，水電煤汽也包括在內。因此接父母來美後，就可以不必養了，如果老人生病，子女也不必趕回去台灣或中國。胡適之曾說，美國是兒童的樂園，年輕人的戰場，老人的墳墓。數十年前這話是對的，但在今天的

美國，老人可以過快樂的生活，與孩子同住，也可享受所有的福利。老人公寓裡的中國老人，彼此串門子、打麻將。有些老人寧可住老人公寓，也不要與子女同住。

以前只有講廣東話的老人會。現在不但有不少說廣東話的老人會，就是說國語的老人會也不只一個了。但當年益社會還是第一個說國語的老人會。錫恩乃第一任會長。每任兩年，他做過四年的會長。

(7) 協大校友會洛城分會

協大校友會洛城分會於數年前成立，每年開會一次，就是為錫恩祝壽。他們也跟大陸和台灣的校友聯絡。協和沒有了，錫恩是協大的象徵。一九九一年為錫恩祝冥壽。

(8) 東海校友會洛城分會

東海校友會洛城分會人數很多，他們每年一次的宴會都請我們參加。錫恩追思會時，東海校友會送了一個大花圈。

(9) 仁社洛城分社

一九四四年成立。這是個兄弟會，母會有六十多年的歷史，發源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那時留學生居美有寂寞感。白種人在美國各大學都有兄弟會組織，所以中國留學生也組織起來，雖以友誼為目的，因當時都有學成回國的計劃，故社歌中有福國利民的目標。錫恩在紐約時即被選入會，回福州後才正式參加。當時福州仁社也只有十幾個人，都是福州社會最上等人，任要職。一九三〇年代福州的官商界男士出門應酬，不一定都攜眷同去，福州仁社卻比較西忙，都是家庭聚會。錫恩對紐約和福州的仁社十分滿意，所以在一九四四年創辦洛城分社。最初會員只十餘人，每次月會全體參加，先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到我們家中開談，商討會務、吃冰淇淋。金山的分社成立後，由錫恩創辦西岸年會。仁社在東岸各城都有分社，每年有一次全國性的年會。洛城一九四四——一九八七有六十三位新會員。入會儀式都是錫恩主持。一九八七年後錫恩身體變弱，偶爾還參加月會。

第十四章 南加州大學校內生活

錫恩於1947年回校繼任亞洲文化系主任，頭幾年繼續教比較教育，他也頂喜歡教中美邦交史，這課列於國際關係系，在此課程內，他影響很多美國學生對中國發生興趣、讀中文，有些以亞洲文化為主修。後來他的興趣轉移到研究共黨中國，就不教比較教育了，然而教育學院卻一直將他的名字，列為該院教授之一。

中國共產政府成立不久，他就託一個朋友李銘新（過去是協大畢業生，由錫恩幫忙在南加大修得博士學位，戰後回國，在北京當教授。）為我們訂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一些雜誌，這是錫恩研究中共問題之開端。數月後，南加大錫恩的一個美國學生從北京回來，到我們家中聊天。他說：“共產黨軍隊入北京城時，他在街上和北京市民一起歡迎。共產黨軍隊聲威雄壯，秩序井然，幾乎像美國海軍陸戰隊那樣好。”他在 U. S. C. 讀中文，後來參加了美國海軍。他說頭一天「人民日報」出版，他就買，數月來一張不差，此外還買了一些小報和雜誌。他送給錫恩一份寶貴的禮物：兩大盒中國報紙和雜誌。他送的「人民日報」加上錫恩自己訂的，現在 U. S. C. 陳錫恩存書室可以說有齊全的「人民日報」。南加大校長對國際問題十分有興趣，中共立國不久，他撥給錫恩幾千元的研究費，於是錫恩開始托香港友人代購研究資料。

這時美國政府也開始研究中共問題。1950年有一天錫恩接到美國政府某機構的信，要錫恩研究中共問題，給的研究費大約有數十萬元。錫恩把信給文理學院院長看，他不相信，懷疑數目寫錯了。錫恩寫信詢問，數目沒錯。在美國大學，一個教授能領到研究費，在校內地位也提高了，因為校方能從研究費中抽一部分。校方要提供地點、設備、水電、圖書館等開銷。出錢的機構也願意將研究費給學校，因為校方可以監督，錢由校方管，薪水由校方發。錫恩能夠得到這筆研究費，是因為他的一個學生，在那個機構工作，將錫恩做為理想的人選推介的結果。

錫恩開始給美國各大學寫信，招聘有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應聘者很多，翁紹耳剛得到農村經濟博士，被錫恩聘任，此外還有心理學，史學、政治學、宗教和哲學、新聞方面的人才，我是社會學。十幾個中國人一起讀中國報紙，念中國書，大家非常投合。我們過著”翰林”生活，都很自得。那位替我們購買資料的香港友人，也拿月薪。戴蘭孫在 U. S. C. 讀碩士時，上過錫恩的中美外交史課。錫恩認為他以純學術的觀點研究中國問題，作品沒有政治傾向。

我們諸”翰林”都忙於研究和寫作時，錫恩已計劃好寫一本書，並與一家出版社系好。他的效率比我們高好幾倍，我們的小冊子還未寫完，他的書已經結稿，交給了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卻將書稿退回，說這是第一個用中國資料研究中共問題的書，一切都好。但對中共說得太好，要求修改

。書不能出版，錫恩很失望，他把書稿及評辭給我們看，大家說，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美國。那時美國民眾是反共的，書刊發行人當然要考慮到銷路。錫恩不肯改變立場，書也就沒有出版。這件事只有我們幾位研究員知道。中共初期的政策有許多好處，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所以方勵之、劉賓雁都參加了共產黨。我認為錫恩對學術的態度很客觀，共產黨的好處、壞處他都說。

我們這些研究員各寫了兩三本小冊子，版權屬於美國政府。我曾寫了一本關於中共制度下的家庭的小冊子。直至兩年前，Texas 一位女士，寄給我一大包印刷品，說是她丈夫任教的一所 Texas 的小型大學的校長，曾在他的碩士論文中，大量抄襲了我的資料，而沒有註明。那個學校的教員們，正在打倒校長，說我應該去告他。那時錫恩身體很弱，我沒有精神去告狀。我回信說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〇年，而告狀是有時間性的。何況這本書的版權不屬於我。我對錫恩說：“你寫了許多東西，卻沒有人偷。我寫的東西有人偷，可見寫得比你好。”

政府的研究費，兩年多或三年就用完了，我們大家也分散了。多數的研究員還是我們的好友。

南加大的亞洲文化系逐年在進步：為中文和日文學生設四年的課程，從 U.S.C. 準博士的中國學生中選教授人才。系內也設中國和日本文化課。在錫恩研究中共問題期間，各研究員組織一個課目叫共產中國，大家輪流對學生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這個研究結束後，錫恩繼續主持這門課，我也教一門課，叫中國家庭和社會，從古代講到現代，主修學生可選中美外交史，或選其他系的亞洲科目。

一九四五年，由錫恩友人向中國國民黨政府申請，給亞洲文化系五名學生獎學金，每名五千元。錫恩向外省招學生，亞洲文化系給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他也申請給博士學位，未准。學生少的時候經常請主修學生在我們家中吃飯。學生多了，由各教授帶菜在學校聚餐。

錫恩一直主張南加大各院系都要有個遠東專家，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他曾組織一個委員會，期望可以達到此一目的。不久歷史系和宗教系先聘了亞洲專家。事有湊巧，美國政府給合格的大學資助，以振興亞洲課程。錫恩代 U.S.C. 申請，得到助學金，各院系都可以去請教授，薪水由政府供給。亞洲文化學系教授也因此增至十餘人，以前都是黃種人，現在聘兩位白人中日專家。於是東亞研究中心產生。這助學金也給學生，所以亞洲文化系的學生也激增。這筆助學金是需要每年向政府申請的，本年度的錢如果用不完，還要還給政府，因此每到年度結束前，就拚命花錢。

一九六〇年 — 一九七〇年，錫恩也是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錫恩很鼓勵教員參加各地學術會議。文化中心產生後，在錫恩主持下，教員、學生及家屬每年都在感恩節的週末，上 Idyllwild 作退修會談。這是屬 U.S.C. 的一個會所。這樣子各院來的教授及眷屬能彼此多認識，也與學生多了解。錫恩也安排學術研究及其他娛樂。學生費用之一部分由亞洲研究中心津貼。錫恩那

時常去華府開會，也常去遠東。

大約也是一九六〇年，錫恩得了 Carnegie Foundation Grant，大約也有幾十萬，我記得學校對錫恩十分感激，因為 U.S.C. 那一年有 Ford Foundation Matching Grant。這樣子 Carnegie 給 U.S.C. 多少錢，Ford Grant 也給同樣的數目。他之所以能得這許多資助金，是因為他常去紐約見一些會給錢的機構。

過去美國中學生都要讀一種外語。有的讀拉丁語、希臘文，有的講德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從來沒有人讀中文或日文。錫恩提倡任何中學，祇要肯把中文或日文列入課程表上，其中文或日文教員的薪水由 Carnegie Grant 供給。錫恩因此要去教育部及一些學校，鼓勵及提倡讀中文或日文。頭幾年，各校的中文及日文的學生合起來，在 U.S.C. 有演講及表演出賽，盛極一時。

在錫恩的追悼會上，文理學院的主任說，在文理學院的教授中，沒有人像錫恩這樣得到如此多的外面的資助。有一天 U.C.L.A. 的亞洲文化學系主任來找錫恩說：“院長叫我問你，你如何能夠得到這樣多外面的資助來辦學？”

一九六七年，他六十五歲時，由亞洲文化學系退休，不過學校請他繼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三年。一九六七年畢業典禮時，董事會贈他 LLD 榮譽學位。一九七〇年，由東亞研究中心退休，教育學院請他回教育學院，給他一個很好的辦公室，門外有塊鋼板，感激他對此較教育的貢獻。此外在教育學院圖書館樓上撥出一個房間，用為陳錫恩存書室。錫恩把餘下的 Carnegie Grant 從亞洲文化學系遷至教育學院，雇了一位全時間的書記幫他寫作。一九七三年，Carnegie Grant 錢用完，他不計劃再申請，繼續寫書。退休後寫了兩本關與中共教育的書，都順利出版。在南加大工作卅五年，總算十分順利及成功，也可以說轟轟烈烈的幹了一陣。高麗戰爭結束時，出乎意料，幾千中國軍隊的軍人投降聯軍。美國軍隊中缺乏會說中國話的，一個南加大的學生自告奮勇，出來作翻譯。當然有美國記者來訪問這位阿兵哥，他說是在 U.S.C. 學的中文。又說是受錫恩的影響，對中文發生興趣。越戰結束後，放回的戰俘中，有一個是 U.S.C. 學生。回校的那天，U.S.C. 給他熱烈的歡迎。U.S.C. 日報和他接談時，他也說他對亞洲等發生興趣，是受了錫恩的影響。校方請他午膳時，也請了我們。一個讀教育的人，因為中日戰爭不能回國，自動地變成遼東專家，才能夠多替國家宣揚文化，抗日援華，更多的為祖國服務，我認為錫恩是個有眼光並愛國的人。前幾天我參加洛城的燕京同學會，自我介紹時，我說我是鍾文惠，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燕京，不過在洛城的人都認我為 Mrs. Theodore Chen。那天演講的人是某大學的亞洲文化系主任，他開始演講時說，今天好高興遇見 Mrs. Theodore Chen，會完我跟他打招呼。他說讀過錫恩的文章和書，祇是未見過面。好久以前 Occidental College 有個盛會，我們被請參加，那天演員是 Edgar Snow，我們到的時候，校長介紹說這是 Theodore Chen。沒想到 Snow 演講時兩次說：“我若是說錯了請 Dr. Chen 更正。”當然，Edgar Snow 也是讀過錫恩的作品，可見在亞洲文化專家圈子裡，有很多人

知道他。

錫恩退休後，每週兩次去 U.S.C. 辦公室，也參加一些 U.S.C. 的餐會及活動，亞洲文化的教授們與錫恩見面時常說，我們現在所作的都是建立在你的基礎上的。今天加州的學術界、政界、商界，都在高呼”太平洋周邊”的口號，而錫恩是提倡太平洋周邊文化交流的先鋒。

第十五章 國外辦學

(1) 一九五四創辦東海大學 -- 紐約的基督教基金委員會，在大陸曾創辦十三所大學。共產治華後，校產都被沒收，燕京變成北大，協和大學變成了製藥廠。所以基金委員會，擬在臺灣設一所基督教大學，即東海大學。一九五四年二月，錫恩向 U. S. C. 告假一學期，由美赴臺。

這是我們第一次到臺灣。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樓上樓下各有一臥室，有客廳、飯廳，廚房，也有工人房。屋內有個抽水馬桶。澡房是日本式，從外面燒熱水，大家用個杓子在浴缸內取水倒木盆內，初洗後，再往浴缸內浸。

二月的台灣天氣相當冷，錫恩穿著大衣吃早點，覺得還有風，要把門關緊些。沒想到一扇門壞在他手上，日本式門窗都是木框及紙糊的，可以推來推去。我們住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二條通，錫恩每天走去中山北路辦公，辦公處有吳德耀博士，還有英漢書記。籌備初期，紐約基金委員會派 Thomas Graham 任代表，葛氏數月後因故回美，基金委員會派錫恩繼續籌備。那時負責的董事人選十五人已選定，地點也已定在台中，然而因一部份土地屬於私有，需多方交涉。錫恩離台時尚未完全收回。錫恩到台後，向他求職者頗不乏人。他不計劃任校長，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東海。台灣社會希望東海即日開學，所以錫恩認為東海必須有一個教務長。他介紹唐守謙，一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教育碩士，在福州及台灣都曾在教育部工作。因要在大學工作，由錫恩安排在美國一個小的大學拿了榮譽博士。唐守謙先生從籌備期間，就參加了東海的工作，直至退休。

紐約基金委員會總幹事乃是錫恩好友，他請錫恩去的時候，錫恩曾問他：“會不會把校長之職放到我肩上？”他說派吳德耀同去，就是預備他做校長。吳德耀南京金大畢業，乃 Dr. Fenn 之高徒。Dr. Fenn 在金大是教英文的。吳又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教育背景當然合格。人家反對他，因為他太年輕，是新加坡華僑背景，在美時是在聯合國工作，而非辦教育。錫恩到台後，一直表示他不要做校長。在台灣，東海校長是個好職務，要做的人還不少，人家不相信錫恩是真的不做。董事中一人極表示要做校長，據我們看他是個能幹的人，錫恩也支持他。很多人來告訴錫恩，說他家庭私德有問題。錫恩那時剛五十二歲，教育學博士，做過大學校長，是基督徒，私德沒問題。董事會想來想去，就是他合格，三次選他做校長，他都堅辭。（東海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 P. 50）那時期欲做東海校長的人卻編造了個罪狀，加到錫恩頭上，說他“反共不徹底”，拿出錫恩寫的文章為證，從教育部向校董會施加壓力。在台工作的人，也許必須徹底反共，但錫恩是以學術的眼光研究中共，說它好也說它壞，與反共或親共無干。反對錫恩的人當時是如何加罪於錫恩的，我現在已不記得，但記得有一天錫恩從辦公室回來，告訴我說，今天好辛苦，好不容易把

Paul Wiant 勸住，現在他不辭職了。Wiant 是東海的建築師，藍圖由他擬好。他聽說有些人攻擊錫恩，十分不高興，為錫恩抱不平，所以要辭職。由是錫恩才告訴我，關於反共不徹底的風波。Wiant 以前在福州替教會作建築師，所以認識錫恩。有一些在福州的美國人對錫恩十分愛戴，認為他不會做錯事，且一個美國建築師，看反共不徹底，也不是大罪。

據我的記憶，反共不徹底的風波之後，校董會第三次舉錫恩做校長，錫恩又請辭。理由是，向 U.S.C. 請假只半年，有個人信用問題，必須回校。校董會要設法派代表與 U.S.C. 商量。

錫恩雖然不作校長，但東海承認他的貢獻很大，因為他為東海擬定了行政及教育方針，提倡設工讀制度，注重通才教育等。（東海校史 P38 - 40）

住台六個月的生活也夠忙的，協大、英華、文山的校友和福州同鄉會都招待我們。一些政府要人，也多是錫恩好友。我們到台後，參加不少歡迎宴會，後來我也抽些時間回請。一下子我們決定要走，大家又歡送一陣。住在台灣的人，人情味很濃。

錫恩走後，校董會舉曾約農為校長。曾是一位舊式學者，曾國藩的曾孫，年已六十二歲。他做了兩年就辭職了，結果是吳德耀做校長，他做了幾年也辭職。可見做東海校長，不是太容易的。

由台灣我們去香港登船回美。寫信給戴蘭孫，他在 U.S.C. 讀碩士時，曾選錫恩的課。他回信說：我母親要你們住我們家中。蘭孫的母親乃福州人。晶一九五四年大學畢業，來台兩個多月，與我們一起回美。我們計劃在香港買些古董及中國藝術品，還買了兩個古式的小桌子，各人又都置了新裝，所以必須坐船回美。那時總統號的船又開航，我們便乘總統號船回美。我們二人同艙，晶一人獨享一艙，大約那船乘客不太滿。在船上遇見一個 Smith 醫生，他在 29 Palms 行醫，距洛城約五十里。我們與 Smith 在船上打橋牌，亦成好友。

(2) 一九五九年 -- 海上學府：南加大暑期學校院長聘錫恩為 U.S.C. 暑校海上學府主任，全時間教員四人，包括錫恩在內。半時間一人，就是我。全時間教授教兩門功課，我只教一門。其他三位的太太也都跟去，兩人任圖書館員，一人任書記，這樣子太太們也都拿薪水。這是美國教師工會與 U.S.C. 暑校合作辦的，是全國性的，學生是中學及小學的教員。學生直接向 U.S.C. 註冊，所以我們早已知道班內有多少學生，必須用的課本在船上買，必須用的參考書由教員們交圖書館員集中保管。

Mariposa 是一艘豪華的遊艇。乘客有 300 多人，一半是 U.S.C. 的學生，一半是普通的乘客。我們二人住的房間很大，房的兩端各有一床，中間有梳妝檯。房內有浴室和壁櫃，我們住的是頭等艙。船行時上課，船停了就上岸觀光，晚上回船睡覺。船從洛城啟航，先停 Tahiti，然後去澳洲及新西蘭。回來時船停 Somoa Fiji 及夏威夷。U.S.C. 交給錫恩 \$600 以備不測之需。

有兩位教授天天在酒吧喝酒，錫恩根本就看不順眼。這兩位醉君子還要求錫恩把那 \$600 拿出來，大家痛快一陣，錫恩不給，把錢還給了U. S. C.。他們好不高興。

發出的通知說，船上晚餐時，女的要穿長衣。男的要穿禮服。錫恩有兩套黑色禮服，都是數年來有時演講要他穿的。未上船時，又買了一套白色禮服。他說頭一晚吃飯他不穿禮服，飯廳內若有一個男士不穿禮服，他就永遠不穿。結果那禮服還是新的，他去世後我給了 Good Will。

在船上我們喜歡在船頂散步。早餐前走，上午走，下午走，晚上又走。我們也喜歡打橋牌。第一天下午牌賽，我們因教員會議未去，那晚去找下午的一對冠軍打了一晚。這一對夫婦，至今還是我們的好友。在船上我們下午都參加橋牌比賽，我們多是冠軍。晚上和那一對夫婦打牌。六個星期暑校結束，我們還是全船的冠軍。

七月十四日船停悉尼。一位在洛城讀書的中國學生早先寫信請他的父母招待我們。劉先生夫婦到船上接我們，並到處觀光。晚飯去劉太太妹妹開的一個夜總會裡吃飯。我告訴劉先生，今天是錫恩壽辰，樂隊便奏「生日快樂」，大家一起唱歌。澳洲是講英文的世界，那晚夜總會至少有一百多人祝賀錫恩的生日。

(3) 一九六二年美國教授去台灣研讀中國文化 -- 這個暑校是由台北大使館文化參贊 Pardee Lowe 發動的。他請錫恩主持，也可以說是他們二人合作的成果。其他三位教授由美外交部選派，學生也是向外交部申請，他們挑了卅人。我們對東海有好感，所以錫恩選東海為校址。選學生的標準，是要看他們將來回校教書時，能否把中國文化滲入他們所教的功課內。學生們的路費自備，美國政府每星期給 \$75 做生活費。學生住宿舍，教授住客房，都不交房租。我們也在客房住了一夜，以後與校長吳德耀商量，借住一對美國夫婦的兩臥室的房子，他們去歐洲度假了。工人房有一對夫婦，還有個孩子。他們為我們理家，我們付他們工資。男的煮飯，女的收拾房子。那年我想享受點，把我們的飲食習慣略告訴廚子，然後全權由他去料理，每晚跟他算帳。這樣每次上桌才知道吃什麼。台中市政府為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的住宅、學生、教授的住宅，晚上都派了看守者。有一晚大雨，第二天廚子說那看守者要進來，他沒有讓他進來。我說我若知道必定讓他進來。

暑校大約是八個星期。學生早上上課，每星期上課四天。四個教授各教一天。下午請外賓演講或表演，如太極拳、中國音樂，我也被請講了一次中國家庭。外賓都是台灣的著名學者。被請的人都是早聯絡好的，有的未去台灣時已通了信。被請的人都有報酬。負責領導參觀的人是由台灣雇的，也是早安排好的。學生必須去參觀，教員則隨便。我常跟他們同去。那卅位教授回美後，對中國文化頗有貢獻，有的未去台灣時，已是中國問題專家，我們經常在亞洲學會時與他們見面。有一個人研究中國基督教大學，常與錫恩通信，徵求他的意見。還有一位組織了一個討論組，參加亞洲學會歷程，請錫恩任主席。另有一個人由錫恩介紹為中國文化學會的理事，每年見面，一直都是我們的好友。

一九六二年的教授們，有些人要學太極拳，每星期兩天晨六點拳師來教。一九六二年未去台灣時，我們先去吉隆坡，住姪女鍾敏璋家中。又逢我的生日，敏璋設筵三桌，參加者有吉隆坡要人，福州朋友及文山同學等。敏璋在文山讀小學及初中，去菲律賓讀高中，上海暨南大學畢業後。在吉隆坡師範教書。吉隆坡友人叫她鍾先生，我聽了很不慣，好像她偷了我的名字。1950年敏璋曾被美國外交部邀請，來 U. S. C. 聽課六個月。我們由吉隆坡去新加坡五天，兩天住哥哥與他續弦的嫂嫂家中，三天住五姐家中。卅餘年前與哥哥在上海分別，非比嫂嫂還是初次見面。哥那時在新加坡政府工作，生活很好。一九二八年與五姐在福州分別，那年我是重返燕京。以後五姐及姐夫一家返回新加坡，過很好的生活。姐夫辦華僑教育，住大房子，家中有傭人，有汽車和司機。我們在新加坡五天，真是忙不過來，協大校友，英華校友和許多朋友，全體請，個別又請。到新加坡兩天後，接到陳六使送來一張請帖。陳乃新加坡華人大學的董事長，他請林語堂做華人大學校長。我們未抵新加坡時已知林語堂與陳六使分裂，林語堂辭了校長職，改由協大校友姓莊的代理。不巧那一晚，本已定好五姐為我們設筵三桌。我們便與五姐夫婦及一些友人商量，住新加坡的人都認為陳六使是要人，卻之不恭。於是五姐的晚宴提前一點鐘我們與諸客見面。然後，陳六使派車來接。按我的記憶，那晚只有一桌。六使穿白掛子，黑褲子，足上踏一雙棕色的涼鞋，服裝頂隨便。新加坡的華人，多是說廈門話，六使及諸客人也都說廈門話，我們是福州人，所以跟他們說國語。林語堂是廈門人，跟他們語言是相通的。好在錫恩絕對不會在新加坡做校長，所以吃完飯即謝別。這次來新加坡，最要緊的是與兄及五姐見面。五姐比哥先逝，那唔面後，即成永別。由新加坡我們去越南，由劉永理夫婦招待。劉乃中國駐越之經濟參贊，他們夫婦由西南聯大畢業後，在 U. S. C. 讀碩士，與我們成為終生好友。

由越南去泰國。翁紹耳離開 U. S. C. 研究工作後，一直都在落後國家作農村經濟改良的工作。他是聯合國派去的。雖然住曼谷，但是常出差去亞洲其他的落後農村。碰巧在東海鼓起「反共不徹底」風波的那位先生也在泰國，該時任中國駐泰大使。聽翁紹耳說錫恩要來，他十二分誠意要招待錫恩。其實我們在泰國只逗留兩天，紹耳讓出一個晚上，給這位駐泰大使設宴招待錫恩，待若至親朋友，我相信他是真的誠意。因為事後他知道錫恩是真的不做東海校長，也知道東海董事會未舉他做校長，不是受錫恩的影響。

一九六八年 — 美國中學教員去台灣讀中國文化。這也是美國外交部發動的，委託 U. S. C. 教育學院辦理。這次美國政府很鼓勵亞洲國家美國中學的教員去申請，當然美國國內的中學教員也可以申請。通知教員們申請的函件由外交部發出，有興趣去台灣讀中國文化的學生直接寄履歷及申請書至 U. S. C.。我記得一切書信都是寄至亞洲文化學系，錫恩另請一位總書記，她是 U. S. C. 教育學系的準博士，專管申請書。被選的只 50 人。選擇的標準也是要他們在中學教書時，把中國文化滲入他們的功課內。那年從 U. S. C. 去的除錫恩外，還有教育學院的一位教授，及那位總書記，外

交部另派兩位教授同去。

為校址及住宿問題，錫恩兩次赴台。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選台北美國學校。美國學校乃為駐台美國人的孩子而設的，課程從小學至高中教員也都是由美國聘來。台北的美國學校設于士林，上課時有校車在台北各站接學生。夏天有三個月的假期，很多教員都回美度假，所以住宅空出來。一部分的房子在士林，另一部分在天母。住天母的人要坐公共汽車來上課。天母的房子比士林好些，教授自己付房租，貴廉視房子的好壞而定。學生的房租是怎麼付的我沒有去研究。

我們在士林住兩層樓的房子，樓下有個臥室乃工人用，樓上有三個臥室，我們各有一房。兩個門很接近，每晚睡覺時，門外放個轉動的電扇，我們二人都可以享點微風。士林的天氣和空氣都比台北好，天母比士林更好些。

學生每星期一至星期四早上上課，四位教授各教一門課，下午又是講台灣名人演講及表演。這次有些學生另外要讀中文，學校另聘一中文教員。下午課餘讀中文，但學生不多。

星期五至星期天又是參觀，另雇專員負責。暑校的學生多數是全美各地的教師，洛城中學去的只一人。還有一個是從日本去的，她是在美國生長的日裔人。還有一位從菲律賓去的美國人。學生每週由美國政府津貼 \$75。路費自理。美國中學教員暑假參加學術進修者多有添薪及升級的可能。

一九七〇年 — 德國教書。按美國制度，所有軍人服役二十年後可以退休，退休後終身可以領薪水 50%。那時德國 Wiesbaden 乃美國駐德空軍基地。白天他們都在軍隊工作，晚上可以自由上課。美國很多大學都在德國設分校，為退伍軍人預備第二職業。比如一個軍人廿歲從軍，服役廿年後只四十歲，所以他們要有第二職業。U.S.C. 教育學院在德亦設有分校，一年十二個月都設有課程。好久以前，教育學院院長曾請錫恩去德國教書，錫恩無意。一九七〇年是我勸他去的。錫恩為體力所限，並不喜歡旅行。他在外面能夠談笑風生，對人活潑友善。他也喜歡出去應酬，並在家中宴請賓朋。因公出差他也勝任。但他最喜歡的生活還是安安靜靜地在家中看書、寫作，有時打打橋牌。早起早睡，看書辛苦了，在屋外走走，呼吸呼吸新鮮空氣。我們選擇住宅的標準很簡單：離 U.S.C. 不可過五哩，便于走路以運動身體。

在他的一生中，雖然去過不少地方，但都是為成全一些任務。我知道我不能勸他去歐洲觀光，所以我勸他去德國教書。他在德國中教暑期學校。我們住在 Wiesbaden 美軍俱樂部五層樓的宿舍。住處有兩個臥室，中間有個澡房，大門進去有個凹進去的地方放著大冰箱。每個房間內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只櫃子、還有沙發椅。每月出些錢，有人代為收拾房子、換床單。錫恩教的是比較教育，每星期一及三在 Wiesbaden 教書，離美軍俱樂部很近，可以走去。星期二及四在萊茵 Main 教同樣的科目，而這個美軍基地離 Wiesbaden 廿多里。這裡有個飛機場，本來有個

U. S. C. 教育學院教授，以前也是錫恩的學生，星期二及四也在萊茵 Main 開課，不巧因選他課的學生不足法定人數而取消了。錫恩於是和一個 Utah 大學的女教授同去。這位女教授事前在德國買了一輛 Volvo 的跑車，後面位子低得很。在兩星期後，她丈夫從 Utah 來，每晚跟太太去上課。白種人比錫恩更高大，錫恩假若坐後面的位子，只好躺著去。幸而在 Wiesbaden 班內有一個學生，對錫恩十分好感，自願轉到萊茵 Main 去上課，以便接送錫恩。在學生方面是讀一樣的功課，得一樣的學分。這學生那年夏天是我們的好友。回美後來過我們家中兩次，他是空軍的軍官。

錫恩每晚 7:00 - 10:00 教書，中間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每週五至週一，三天都是空的。多數教授都去歐洲其他國家遊覽及購物，錫恩沒有這興趣。在德國一夏天，我們同友人開車去法國住了一個週末。在七月四日的一個長週末，我們去倫敦小居數日，住在錫恩的一個英華的學生王家松家中。他們夫婦都是我燕京的同學，馬仰曹乃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之女。那年夏天我們還在德國境內參觀名勝，如舉世聞名的萊茵河等。最要緊的還是東柏林之遊。同去的有數十人，我們坐美國軍用火車，晚間在很舒服的雙層床睡了一夜。那火車的設備就等於美國的頭等火車。我們也曾問導遊，何以築這堵高牆，導遊說因為西德薪水高，若無高牆，人們都去西德工作。我們也感到東柏林街上好像沒有人也沒有車，他解釋說，因為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回西柏林後我們照了不少照片，如美國的檢查站，柏林牆的觀望樓，現在都成了歷史古跡。

在 Wiesbaden，住美軍俱樂部，三餐都在飯廳吃，價錢公道。不過美國菜吃幾天，我的胃口就倒了。以前在 Mariposa 船上吃的西餐是最好的，而且可選擇的種類也多。但吃了四個星期後，我的胃口也就不行了，看見牛排和沙拉就嘔心。在這方面錫恩比我好，洋菜一點不會影響他的胃口，一日三餐吃牛排他都亦得到。在德國既不煮飯，又不收拾屋子，生活很無聊，所以我就計劃自己預備三餐。Wiesbaden 有個地方家用的東西應有盡有，都是舊貨，這當然是為美軍預備的。我們去借了兩只電爐，兩口鍋子，一些碗、碟、刀叉，我就開始在澡房內煮飯。每天買菜可以去美軍的 P. X. 及其他的鋪子，價廉物美，美國的和本地的東西都有。我們到德國後即領得一張卡，可以享受美國軍人的一些權利，如交通車等。我們二人早點後，走去德國人的菜市，下午走去美軍的鋪子，回來時還可以坐交通車，這樣子我的生活豐富得多了。錫恩要看書預備功課，我們也常去美軍的國書館，借閱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晚上吃完飯，錫恩去教書，我多在附近走走，回房收拾澡房內的廚具，客廳裡有電視，然而我不僅德文，也懶得去看。每早買一份美軍印發的報紙。每個鐘頭有十五分鐘美軍英語的新聞報導，我晚上無事每鐘頭用自己帶去的裝乾電池的無線電聽新聞。快到十點鐘時，我擠一杯新鮮的橘子汁，等錫恩回來喝。暑校結束，學生對他的教書十分滿意，駐德的主持人給教育學院寫信，請錫恩再去，錫恩當然沒有再去。

我每次跟錫恩去台灣，也不必煮飯或收拾房子，但都沒有寂寞無聊的感覺。因為語言相通，可以聽無線電和看電視，朋友多，也可以在電話上聊天，應酬也多。

現在美國人質被伊拉克拘留，或被回教國拘留，釋放後都是坐飛機去萊茵 Main，再去 Wiesbaden 醫院檢查身體。 那醫院我們也去過。

第十六章 登峰造極

從台灣辦東海大學回來，至退休，可以說是錫恩在美事業的全盛時期。在台時接到 U.S.C. 研究院來信請他為那年的講員。研究院一年一度在 U.S.C. 教授中選一人作學術演講，被選者認為是至大的榮譽。我記得那晚是個盛大的宴會，校長坐在我身旁。錫恩講完，校長說：講辭應立刻印成小冊子。

海上學府，兩次受美國政府之委託在台灣辦暑校，表示人們對他的器重。他能夠得到許多外資，在 U.S.C. 推廣亞洲文化，表示人們對他的信任。前幾天我因要了解美國軍人退休制度，打電話給一位 Commander Rolph，我告訴他我在替錫恩寫傳，他的太太在另一個電話插進來說 Dr. Chen 在教室內的風度、口才、學術及眼光，有極大的吸引力。Rolph 太太在 U.S.C. 亞洲文化學系得碩士學位。慕名而來上錫恩課的頗不乏人，此如 U.S.C. 的副校長 Carl Franklin，年輕時是個海軍軍官，駐 Long Beach，來 U.S.C. 就是讀錫恩的一門功課，至今他還記得錫恩在班上說的話。以後他去美東某大學得了法律博士後，才回 U.S.C. 工作。他認為他與 U.S.C. 的關係是從上錫恩的課開始的。陳氏獎金能夠在一九九一年實行，也是靠他的幫忙。

在這時期錫恩常被邀請去台灣開會。先有陽明山會議，以後又加上大陸問題研究會，都是每年開一次會。據錫恩說，有一次在台灣接到蔣總統召見的函，他當然去了。在談話中，他提及看見過台灣政府情報機構所蒐集的中共報刊等（這當然是很特殊的安排，才得到情報局的許可的）。錫恩認為反共必須多知道中共的各方面，所以台灣的知識份子和學術界也必須研究中共問題。蔣介石對秦孝儀說：“趕快記下”。錫恩認為那次談話後才有大陸問題研究會的產生。參加陽明山會議後，錫恩認為台灣政府內人才多得很，大家都有勵精圖治的願望，所以要請來國內外的學者專家，要聽新的意見。近數年改為國建會，也有同一作用。

駐洛城的總領事及新聞處與錫恩都很友善。有一次飯後茶餘，錫恩說：“現代歷史”叫我寫一篇文章，叫『蔣介石後之中國』，我要請教你們給我一些意見。”沒想到他們立刻電話台灣，政府就立刻請我們去台灣。坐的是頭等飛機，飛機下來，有看見許多台電視和報社的記者，照相機頭和燈光對著我們。第二天各報紙都有我們的相片，各電視台都報告陳錫恩抵台的消息。略嘗 VIP 的滋味。那時嚴家淦是總統，也請我們會談，各報紙又登我們的相片。碰巧台灣的幾位黨政要人，嚴家淦、李國鼎、蔣彥士及孫部長都是仁社社員。蔣彥士、孫部長還來我們住的地方看錫恩。蔣彥士任教育部長時，有一次請錫恩午膳，錫恩回來說，簡直是個內閣會議，都是德高望重的

大人物，大家都認真工作，盼望學者專家多提供意見，能夠把台灣變成一個人間天堂。錫恩很敬仰他們的熱誠和對國家的抱負。台灣政府一直器重知識份子，盼望國建會的專家，能夠給台灣政府及時的幫助。

錫恩說他一生沒有去找工作，都是工作來找他。大學畢業時，承高智校長的器重請他去英華中學教書，以後又幫他來美留學。學成後即回協大。在他未拿到博士時，U. S. C. 請他教暑校，以後就在U. S. C. 全時間工作。大家都知道他辭謝兩個校長之職，其實他曾辭掉過第三個校長職。錫恩在台灣時，陽明山文化學院校長張其昀兩次請他吃飯，要他退休後，在羅省橘縣任文化學院羅省分校校長，地址定在 Santa Ana，已買了大塊地，牌子也已掛上。錫恩對這校長的職務，卻絕對沒有考慮過。該校副校長及總務的人選都已指定，那些人也到錫恩的辦公處討論過。錫恩一直辭謝。張校長答應以 U. S. C. 的薪水聘錫恩，錫恩知道他們要靠他的聲望募捐和招生。募捐不是錫恩的專長，他不喜歡這樣的事。錫謀有一次來信說，見過那位副校長。他說：“你哥哥不肯做校長，所以我也沒有機會做副校長。”台灣政府也曾請錫恩做立法委員，他亦辭謝。在做東亞文化中心主任時，也常去華府，那時在教育部有個人叫 John Caldwell，他每次見錫恩都勸他來教育部工作，他說：“我們這裡必須你這樣的人才。”Caldwell 生長在福州。錫恩回來告訴我說：“外人不知我的困難，早上八點至辦公室，下午五點離辦公室，這樣的生活我辦不到。”所以教授是他唯一辦得到的職業。

有一天夏威夷大學來信，請他做亞洲文化系主任，我們兩個人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大。夏威夷的空氣比洛城好。我素來喜歡海景，若能在海邊買個房子，晚間籍波濤之聲催眠，太理想了。通信的結果，錫恩接到一正式的聘函。夏威夷生活程度高，所以薪水當然能比 U. S. C. 高，錫恩把信給文理學院的院長看，他立刻親切地挽留，說薪水要與夏威夷看齊。學校添薪本來是九月開學時開始，卻為錫恩破了例，二月先添薪一部份，九月再添。錫恩變成 U. S. C. 高薪教授之一。我雖然失望，不能住海邊的房子。然而我們那時住在自己設計的位於山上一個房子裡，有720度的觀景幅面，一個大書房，一邊有蓋好的書架及書櫃，客廳的一面牆是蓋成的古董櫃子，前面屏風有個木製的大「福」字，山上還蓋個亭子，有「瑩亭」的橫楣以紀念我們的愛女。我們也捨不得放棄這房子，所以只好放棄海景房子的夢。做妻子的，有時擔心害怕丈夫失業，我就不必有這樣的顧慮。

這時錫恩的聲望已傳至一般美國社會。我們的相片簿裡，有錫恩與 Helen Gihaigan Douglas 合影的相片。那年她競選國會議員，在家中舉行盛大的雞尾酒會，我們被請參加。我們的相冊中，也有我們與 Jane Wyman 合影的相片，那是電影公司要宣揚她演的電影。Jane Wyman 乃雷根總統第一任夫人。Steve Allen 請 Pearl Bick 吃飯時也請我們，在他們家中見了不少的電影明星，但我們對電影明星的名字不大熟識，因為我們不大看電影。

有一天錫恩坐在書房椅子上看書，我在書桌上寫字。他接了電話後大笑一陣，說：“我不是

演電影的人才。“對方告訴他公司計劃演“Ugly American”片子，要錫恩演那泰國大使的角色。錫恩說：“你們公司要拍片時，演員立刻就要到，我有全時間的工作，絕對辦不到。”錫恩的生活要自己安排，不能被人支配。

他曾與尼克森在同一個場合出現。洛城的一個機構，早就定好請錫恩演講。後來主席曾打電話說尼克森要光臨，程序表上有他們二人的名字。錫恩演講那天，尼克森大約是競選總統。他到演講台時，由主席介紹大家握手。人到齊後，尼克森為競選作了個簡短的演講後便離場了。

我們也曾被請參加一個盛大的會，雷根是主要的演講者，我們是貴賓坐在前排，與雷根面對面，看得很清楚。那時錫恩聲望高，政治界和電影圈體都請他參加活動，然而錫恩對這兩個團體毫無興趣。那時美國名人錄及美國教育名人錄都有錫恩的名子。中國開放後，有一個住在上海的朋友陳蜀生在美國名人錄內找著錫恩的住址，給我們通信。我們一九七三年才遷往這地址，可見一九七三年重版的美國名人錄，還有他的名字。

著作：錫恩寫了九本書。與其他作家合作時，他都寫一章關於中國教育一共十五章。五種百科全書上也有他的文章。此外還有一百廿二篇文章，發表於各種雜誌和報紙，『蔣介石後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至今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所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都是他寫的。這個百科全書的請者是初中及高中的學生，所以有孩子的家庭，都買這百科全書。我們在中國朋友家中吃飯，常有孩子們提到這本書。（一九九二年新版還保留錫恩的文章及履歷）其餘的百科全書都是請他寫某題目。比如大英百科全書叫他寫中國教育史，從古代至現代。所有百科全書大約十餘年後都修改並重版。大英百科全書大約在一九七〇年叫錫恩寫中國教育史。一九八八年叫他修改以備重版，一九八九年交卷，這是他最後對學術的貢獻。

一九四五年出版的中文課本是獻給晶、瑩的，盼望孩子們終身不忘中文。一九六〇年出版的一本書是獻給我的 - “To Wen Hui My Partner In Work and In Play。”一九七二年我們結婚四十周年紀念，晶一家回洛，設宴十桌，請客一百人。那晚他作一篇演講提及獻給我的那本書，並感激我和他四十年的“Partnership”，也算不負我未婚前八年等他的苦衷。我們的婚姻生活與一些人略有不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普通夫妻男治外、女治內，現代的夫妻白天兩人都去工作。我們二人白天多在一起，去 U. S. C. 也是早上一起去，中午一起回來，下午多數在家。我每學期在 U. S. C. 教一樣的功課 -- 「中國家庭及社會」。我喜歡我的學生，學生也喜歡我。這時期演講的報酬也特高，從數十元至兩三百元。去外地就要數百元。一九六一年作全國性的學術演講到底拿了多少錢，我也不知道。我沒有問他，我相信他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那時期我們應酬也相當多，人家都知道要請錫恩須在一個月前定好，人家也知道他很守時，所以客人們若聽說宴會有 Dr. Chen，大家都爭取準時。主人若能在定的時間的十五分鐘內開菜，

他就高興，否則他認為是浪費時間。

他離開療養院後一直過著很好很成功的生活。前十幾年一個中國教授升為 Cal State 的副校長，見面時，我向他道喜，他說我們年輕一代的人只盼望步 Dr. Chen 之後塵。可見一般人都承認他的成功。他對他生活的一切也相當滿意。雖受身體及環境的限制，他還是如此轟轟烈烈幹了一陣，足以慶幸。歷年來報紙、雜誌上有關錫恩的採訪演講報導，我都剪貼保存下來，至今已有一大冊之多。那時候，無論中國發生了什麼事，記者都要來找他或打電話請他發表意見。如成立人民公社，原子彈試爆成功，發生文化大革命等。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洛杉磯時報也訪問錫恩，「時代周刊」也曾採訪過他。有一次我們在朋友家吃飯，正好看到電視裡播放訪問錫恩的節目。還有一次他在紐約的「科學基金會」演講，題目是「中國的科學和科學家」，洛杉磯時報第二天就在頭版刊登了他的演講，可見他的演講有價值。那時的錫恩，簡直可以說是個新聞人物。

陳氏獎金 -- 以前說過，錫恩對幫助年輕人讀書上進特別有興趣，特別熱心。一九六九 -- 一九七三，我們每年都幫助一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來 U.S.C. 讀研究院。台灣方面由一位協大畢業生葉明勳主持。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多是協大校友，也請了美國大使館文化參事參加。葉明勳在台灣政界報界都有地位。以前他是新華社社長，以後做過新聞學院院長。每年一度在台灣各報說明申請獎金的辦法。申請書寄至台灣某報館。大約要在每年一月之前申請，申請者必須要大學畢業，通過了托福及 G.R.E. 考試，申請書齊全後，葉明勳和他的委員會詳細審察後挑三名寄給我們，我們在三名中再挑出一名，得獎者除免學費外，我們每年給 \$2000 以作生活費。那時生活程度低，女生可以住合作宿舍，每期食宿只 \$50。男生亦有同樣的辦法。數年中得獎者都拿了碩士，還有一人得了博士學位。這樣的辦法來往的書信很多，學生定了之後，錫恩要代那學生申請入 U.S.C. 的某院系。學生被錄收後，要代為申請宿舍。學生來時，我們要接飛機，以後要幫助的事多得很。一九七三年後錫恩退休，沒有私人書記，所以那獎學金暫告停頓。那幾年中得到獎學金的學生已全部定居美國成家立業。

錫恩遷回教育學院後對陳錫恩存書室大有興趣。那時教育學院院長擬重建教育學院的圖書館，藍圖畫就，陳錫恩存書室在主層。一大間的存書室還有一個閱覽室。所以錫恩立刻為存書室設立基金。將來還要請全時間的圖書館員管理並添置新書。他也計劃閱覽室要用中國式的椅桌。一九七三年我們從山上的房子遷至平地，古董沒地方放，把一部分捐給了教育學院。在陳錫恩的辦公室內有三個玻璃櫃子的古董，都是預備在閱覽室內擺設的。不巧 Dean Melbo 年老退休，新的院長不計劃重建圖書館。由錫恩與台灣接洽，台灣故宮博物館送 U.S.C. 的四千多本的四庫叢刊，也都在陳錫恩存書室。房子相當大，在大圖書館的樓下，門是鎖著的。看書的人要叫負責人開門。錫恩存書室內有關東西文化及教育的書很多。現在一教育學院院長要把英文的書拿出，另陳列于教育學院圖書館之一隅，掛個牌子以紀念陳錫恩。至於他的辦公處，除了三個櫃子的古董外，我把他歷

年得的獎狀也都掛在牆上，還有我們的相片等，也算是個陳錫恩紀念館。

存書室不成功後，錫恩又計劃設「陳氏獎金」。一九八八年冬，我們二人去見副校長 Franklin，交給他 \$40,000 以作陳氏獎金之基金，議定以後每年都捐\$40,000。錫恩死後我亦照辦，將來這基金的數目當在百萬以上。當然要等我們身後，財產歸 U.S.C.，就有充份的基金。一九八九年夏，錫恩身體轉弱，一九九〇年我打電話給副校長，問可否在一九九一年實現陳氏獎金，我要帶得到這獎金的學生來看錫恩，這樣可能會使他快樂。副院長及研究院院長十分合作，他們想辦法從其他基金及校款挪用。我每年除 \$40,000 以外還要多捐數千元。一九九一年得獎者福清人林向陽是個醫生，他現在在 U.S.C. 研究老人醫學，他來晚了，未能見到錫恩。一九九二年得獎者是女生，讀電腦，任朝暉的外祖父是協大校友，現在的得獎者，我們只供一年費用，我身後的得獎者將得到兩年的供給。

在錫恩傳結束前，我還想說橋牌是錫恩生活中很要緊的一部份。他打得好，打得精。聽大家的叫牌，牌打一二圈後，他便會知道大約誰家有什麼牌。若一時沒有機會打牌，他覺得手會癢癢。他在U.S.C.教授中曾組織了一個橋牌俱樂部，每月一次輪流在各家庭相聚，當初盛極一時，以後有些人老而退，也有人他遷，就分散了。錫恩也歡喜四個高手在家中打或被請去打。晶和她的孩子常參加了全國橋牌比賽，遺憾的是這事錫恩是辦不到的。

第十七章 最後一章

錫恩因肺病，多吃多休息，所以發胖。結婚前錫恩與洋人同住，吃西餐。結婚後吃中餐覺得好吃，更胖，體重增至一百七十八磅。為參加醫藥保險，檢查身體時，發現糖尿病，醫生叫他減少體重至一百五十磅。錫恩富有自制力，該吃的東西吃完，便離開飯桌，不要看我們吃東西。這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減肥成功後，他要知道應吃什麼食物，吃多少，食物要秤，要量，吃完了還要驗小便，至尿內無糖為標準。買了營養學的書，每種食物澱粉的成份都記得。他如早上吃水果，去皮去核後才秤，多一塊就塞在我嘴裡，少一塊就在我碟上取。由於管制食物和每天運動，糖尿總算被管制了數十年。每兩三個月都去驗血糖一次。剛發現糖尿病時，我去 U. S. C. 醫學院借了好幾本書，我們兩個人都唸。他每天堅持走路，風雨無阻。若是發現血糖略高，他便去鋸木頭，去山上拔草。他有時也嘆息說：“我為肺病而休息，為糖尿病而運動。”尚幸他手快、足快、腦筋快，所以還有驚人的成就。

體重減至一百五十磅後，去台灣幾個月又失了兩磅，回來後一時謝絕應酬及演講，過安逸的生活，體重也不再增加。總而言之，減胖後若是掉了體重就不能恢復。我們澡房內有個醫生用的磅稱，他每星期都稱兩次。體重一減少，他煩悶，我心痛。去外國多是瀉肚子，都會減輕體重。所以他也不大喜歡去。總而言之，因糖尿病而減胖，以後的數十年，都有體重太低的困擾。

一九四六年在金山，我發現他臉上長了一小粒，立刻去看醫生，醫生認為不要緊。我們由中國回來後，去看腫瘤專家，他讓錫恩每年去驗一次。那一粒是口涎線漲大，臉上開刀怕傷了神經，也許有礙肌肉活動和臉部表情。十年後專家說那一粒開始長大，要開刀了。開刀前一天，就住進了醫院，我陪他一天。晚上我不愛一個人住在那大房子裡，所以去翁麗華處住。因我是驚弓之鳥，一夜未睡。醫生說他晨六點鐘去開刀室，我清早雇了一輛計程車，五點鐘至他房間。人們來推他時，我一直送他至不許我再去的處方。手術畢回房，傷口沒有包起來，護士說要防止他用手碰傷口，所以我就在床邊看守。那是個天主教的醫院，住單人房。晚上我告訴修女，我必須在旁看護，她允許我住下。我把兩張很舒服的椅子並起來，從抽屜裡取出一條氈子，就在椅子上睡，睡得很好。第二天醫生檢查後，友人來接我們回家。回家兩三天後，臉部發腫，給醫生打電話，醫生說是血清，要經常來抽取。有一天在朋友家中吃飯，他的臉腫得很厲害，我都吃不下，他還很關心地拿東西來給我吃。我說：“你的臉腫成這樣，我吃不下。”他說：“這是小事，用一根小針，一撥，血清出來，一切正常，痛也不痛。我在療養院時肺部積水，醫生用粗針插進去，那才痛苦。比起來這算什麼。”他又說：“無論如何，我的命是檢來的，所以這樣的小事，不會叫我掛慮。”我一

直都很佩服他耐苦忍痛，每次至急救室，護士來抽了好幾筒血，把滴露的管子插過去，我汗毛都豎起來，他卻滿不在乎。那血清多少時才正常，我已不記得，他面部的神經沒有受傷，臉部的表情也正常，已是萬幸了。開刀後，那醫生還叫他每年去檢查一次。有一年打電話至診所，要再去檢查，護士告訴他，那醫生已不在人間，聽說因癌症而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膽囊開刀，也不簡單。住院兩星期，回家時傷口還是紅色。醫生叫他每天用肥皂水洗，他都照辦，我都不敢看。過了幾天，因發高燒，又住院一星期。普通人傷口恢復快，他因有糖尿病，恢復得慢。普通人縫傷口的線及時溶化，他傷口化濃就要去看醫生，醫生把線夾出來。一九七〇年夏天我們在德國時，他還去了美軍醫院兩次取線。那次開刀在聖誕節後，我發出聖誕節卡片時，曾提及錫恩十二月二十六日動手術的，因此來看他的人特別多，送的花也多。亞洲文化學系及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來的人也多。我早上還去學校，中午都有人送我去醫院，晚間有人送我回來。每晚回來我都要帶回兩三盆花，因為醫院放不下。那時我們住山上房子，大門進去有通道，書房前也有個通道。我把帶回的花，都放在通道上，錫恩回家時通道像個花園。錫恩那次住雙人房，同房的人是個鋪子的伙計，對錫恩的生活十分羨慕。他的太太也天天在醫院，一天晚上有人來接我回家，那女人一定要跟我同回，接我的人也肯送她回家。我們山上的房子前面全是厚玻璃窗，可以看全城的燈光，五光十色十分美麗。我把後面的大燈一開，可以看見後山的樹木、亭子、花草，通道上又有這麼多鮮花，那女人見了更羨慕。錫恩出院那天，亞洲文化學系全體教員和秘書都至醫院接他。

山上的房子雖然美，然而不適宜予老人。前門、後門及車房，進房都有二十二層的台階。山上很會長草，秋冬時滿山黃色。山上拔草、澆水，都是錫恩的工作。他摔過兩次。有一次午飯後，我在廚房洗碗，看見他坐在台階上，一層一層下來。我趕快把飯廳的落地窗開起來，扶他進屋，打電話叫人開車送他去醫院。他說：“不必，讓我睡一覺。”醒來後，他說：“我自己會開車。”我當然陪他。照X光後，醫生認為骨未折斷，傷處大約是肌肉或筋，用很寬的鬆緊繃帶包紮起來。第二天，他去美東演講。三天後回來時，還覺得很得意。在機場內坐輪椅，上了飛機，小姐們給他劃了三個位子，腳可以放在椅上。上台時主席稍扶他，聽眾一點也不覺得他有毛病。

一九七三年，我們把山上的房子賣了，遷往山下公寓式的房子，對於老人比較合適。樓上有兩臥室，樓下有書房，書房一旁有澡房。年老人不能上樓就可以住在書房內。這地方佔地六十八英畝，三分之一是空地，有草坪及樹木花草，像個公園，散步十分理想。錫恩剛搬來時，每天午睡起來，都是健步如飛地走一小時。

有一天早飯後去大便，他發覺大便太硬，越使勁越發硬，痛至不能坐，也不能開車。我去找一位鄰居，送他去醫院。他們用油打進去。打一瓶，要他休息一個鐘頭，打了三瓶還不通。我出去買了兩包三明治，一盒牛奶，讓他吃下去，吃完就通了。這事後醫生每年都驗他直腸一次。未

驗時當然要吃無渣的食物及洗腸。奇怪的是頭三年每年都割掉一粒息肉，以後又驗出大腸癌。驗直腸不用麻藥是很痛苦的，我曾驗過一次，以後就不再驗了。他卻好像滿不在乎。

一九七九年前列線開刀，本來是個小手術，從尿道切除前列腺。早上開刀，我叫他的一位書記在家裡陪我。醫生答應手術畢要給我電話，至午時還沒有電話，我叫書記去尿科診所詢問，人們說醫生還在手術室。一點鐘我叫書記去尿科找 Sam，叫他去看看。Sam 是醫生的助手。Sam 去看，說醫生還在手術室。到下午兩點鐘，我實在不能再等了，就親自去診所。醫生剛進他的辦公室。他看見我就說：“我剛要跟你通電話，他剛已脫險。”因糖尿病之故血流不止，身體又不接收輸血，所以醫生一直在旁搶救直至脫險。那次開刀是從質骨打麻藥的，錫恩處在半昏迷的狀態之中。他知道手術室裡有許多醫生和護士，手忙腳亂。原來他又是在生死邊緣上回過來。四點多鐘回到病房，面無血色。我守了他兩個鐘頭後，顏色才恢復過來。我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因為他兩天多沒吃了。他說可以。我叫護士送了些軟及流質的東西來。他吃不下。我想把它吃掉，也吃不下。八點多鐘他精神比較好點，吃了點流質的東西，我也回家休息。尚幸他妹妹錫瑛在我們家中，為我預備了晚飯。那時我的心情才略輕鬆些，還吃得下。奇怪的是第二天他完全像沒病的人一樣，三天後醫生就叫他回家了。

前列腺未開刀前，醫生認為小便不完全流通，膀胱內若積尿太多，會發生別的問題，所以決定開刀。開刀後數年，前列腺又脹大，有時小便出血，早先數小時後就停。當然又去看泌尿科醫生。有一次兩星期不停，醫生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再開刀。頭一次開刀時他身體還好，但在這樣體弱的時候怎敢再開刀。所以每次出血，我給他吃雲南白藥，以後好像一直都沒再出血。去世前一個月，小便又出血，我又給他吃雲南白藥，半天後血停了，我也就不給他藥吃了。現在我們家中雲南白藥還多得很。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金婚紀念日。錫恩八十歲。晶夫婦回洛，設宴十四桌。他那時體重約一百二十八磅，瘦些但身體精神還好，能開車、看書、演講、寫作，一切正常。一九八三年夏，發現大腸癌。金山社會有祭孔典禮，孔子第七十代孫孔德成主持，西岸選了十位得獎的教授，錫恩乃十人之一。我們早已答應去金山參加，醫生也認為無妨，可以等領獎回來動手術。我們只參加了領獎晚宴，沒有參加第二天的祭孔。我早告訴醫生，前次手術傷口許久才痊癒，還有線不溶化種種困難，醫生說這一次不會有這困難。

開刀的前一天晶回來，給了我精神上的支持。下午約五點多鐘，他從手術室回到了病房，掛上許多管子，輸氧、輸血、滴露。那時一些朋友和侄輩也來了，我不讓人進他的房間，怕人多有傳染病。我們都在門外。我決定要僱特別護士，與醫院商量，最早能來的護士是晚上十一點鐘。那時錫恩麻藥未醒。陳平、陳捷說他們每天都是十二點才睡，他們可以在醫院等護士。等到十一點鐘護士來了，陳平給我通過電話後，他們才回去。

每次錫恩住院，我都抄下門外護士值班室的電話和他房間的電話，晚上都要給醫院打兩三次電話。第二天清晨七點多鐘，晶和我就到醫院去了。錫恩已清醒過來，輸氧和輸血的管子也已經全拿掉了，情形好得多。他不高興我們為他僱特別護士，和我們爭論。我告訴晶說：“你父親已復原了，把今晚的特別護士取消了吧。”

醫生說大腸切除了十八吋，割得很乾淨。錫恩恢復得也很快，他脫險後，晶就回去工作了。晚間由亞平來陪我。她是台灣來的，我們獎學金資助的學生之一。這次住的是單人房，因為是大手術，朋友送花的也不少。多數的花我都放在地上落地窗前，高高低低的，很好看。我們參加 Kaiser 醫藥保險已三十多年，好處就是在某區內各種醫療，應有盡有，不必到處跑找專家。不好的是，住醫院沒有病房選擇自由。別的保險公司，可以多出錢就能住單人房。

動手術的病人，大約因為不大會轉動，住院時睡在特種的海棉褥墊上，以防生褥瘡。我早先不知道那墊子是頂熱的，錫恩回家時，我仍讓他用那海棉墊子。不巧回來那天天氣特別熱，氣溫達華氏一〇五度。住家兩三天又不行了，瀉肚子，不愛吃東西，連水都不肯喝。我只好打電話給醫生，又住院一星期，再回家時氣溫能較正常。出院時又帶回一個海棉墊子。他對那種墊子生反感，冷天也不肯用。這次開刀，傷口的癒合及線的溶化都沒有問題，大約是十餘年來醫藥進步了。經過大手術，他除了體重減輕外，精神和身體都恢復了，生活正常。我們出去應酬，參加學術年會都照舊。

一九八四年，有一天午飯後，我在廚房洗碗，他去樓上預備睡午覺。我上樓時看見他躺在床上，沒脫鞋。我問出了什麼事？他說：“我昏倒了，你去看看馬桶，大便全黑。”我說是內出血。他說：“我太累了，不能動，讓我睡一會。”我立刻電話鄰居告知情況，說等他醒了就去急診室，同時我去收拾他去醫院必須用的東西。

那次住院兩星期。頭六天輸血五次，吃無渣流質食物，洗腸。大腸、小腸、胃都驗過，找不著出血的地方。待紅血球及血壓正常後，就回家休息了。一九八五年又出血一次，住院一星期，輸血一次，又查不出出血的地方。腸子切去十八吋，再加上內出血，當然體重又下降。雖然衰弱，他還是堅持過正常生活。動作慢些，每天柱根拐杖從 Village Green 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後再回頭。因為走得慢，大約需要一個鐘頭。那時他說：“我就有這些力量，用完就沒有了。”有時沒有力氣走回家，還叫鄰居開車送他回來。十餘年來，他天天走，所以很多人都認得他。

一九八七年秋，是他是後一次去美東參加華學年會。在機場內人們要給他輪椅坐，他不要，堅持自己慢慢地走。一九八七年還去參加了仁社西岸年會。那年有新社員入會，他說他必須去主持入社儀式。晚宴時，主管人為他預備了一個大蛋糕，插了幾十根蠟燭，補祝他的生日。大家唱生日快樂後，他還上台講話，一切都還正常。然而沒設想到這竟是他最後一次參加西岸年會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張瑟音、陳宏毅夫婦在 Palos Verdes 買了一所大房子，請我們去慶祝聖誕。陳平、陳捷、張慧慧開我們的車同去。到那裡後，大家參觀那大房子，他也跟著走。走完，大家都去主人的臥室休息。那房子大，有海景。錫恩坐在一個最大最舒服的椅子上，大家圍著說話。我坐在床腳的一個雕刻的木箱上。我請主人給他一杯蘋果汁。他喝了幾口就不喝了，我替他喝了。不久他說要去洗手間，走至床腳，我還坐在箱子上，看見他好像支持不住，我兩手抱過去，他昏倒在我臂上。幾秒鐘後他醒來問：“我在什麼地方？”他還是要上馬桶，又是內出血。主人打電話給九一一，救護車來了。按美國規矩，救護車只送病人至最近的醫院。救護車至急救室時，我告訴護士是內出血。他立刻檢驗也認為是內出血，不過按規矩，他們還要檢查肺部和心臟。每次至急診室，好在我都跟著，因為肺部的X光透視檢查出來，醫生都表示莫名其妙，我都要告訴他們，病人只有一個肺。驗畢，醫院打電話給我們附近的 Kaiser 醫院，他們派救護車來接。九一一的救護車來時，我告訴侄輩，你們可以吃了飯再來。飯後侄輩們也都已趕到，並帶了些東西給我吃，我那裡吃得下。他們都去急救室，錫恩精神還好，能說能談。因為是聖誕節急診室內吃的東西多得很，都是餅類，我吃不下。叫護士給了我一杯橘子汁。救護車來，我隨救護車，年輕人自己開車去 Kaiser 醫院。我們下午六點鐘離開陳家，至西區醫院時已是半夜，我又在急診室把詳情告訴醫生，把從第一個醫院帶來的X光片及其他文件交給了 Kaiser 的醫生。本來我總是在急診室，等錫恩安頓在病房內才回家。那晚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所以一點鐘左右與侄輩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早上照胃鏡，發現是胃出血，立刻在滴露中加了胃藥，血立刻停止。我們早已被邀請在三十一日除夕，參加一個盛大的宴會，因為錢復大使從華府來洛。醫生准錫恩廿九日出院，所以我們還能參加除夕的宴會。事後他說過兩次：“那天是聖誕在張瑟音家中，若死在你臂上也很好。”數年來他兩眼都有白內障及青光眼，每天自己點藥，每三個月檢查一次。大約在一九八八年，有一天眼科醫生告訴他，青光眼的壓力太高了，所以右眼的白內障必須立刻切除。白內障開刀的人90%視力可增強，但錫恩開刀後視力退化。請教不少醫生，用激光治療，無濟于事。這對他的打擊很大。沒有開刀前，他視力差，然而還能看書報，白天在附近的地方還能開車，比如去U. S. C. 及 Kaiser 醫院，看牙醫。開刀後不能開車，看書要用放大鏡或放大燈。一九八八年他身體已很弱，我想可能是愛滋病，因為一九八八年前，他接受輸血好幾次，他有時還自豪地說，我的血液有國際化。我請求醫生給他做愛滋病檢查。在等待期間，他說：“我若是有愛滋病，你可送我去愛滋病人住的地方，在那裡等死。”我說：“你若有愛滋病，我要你住家中，必要時一天三班護士，輪流幫我照顧你，我也肯花錢，因為錢都是你賺的。”化驗結果，他沒有愛滋病，我們當然快樂。一九八八年冬，有一天下午，他又持著個拐杖出去走路了。一會見我知道他已回來，在後面小院子裡走來走去，也許在看花。忽而大叫他又摔倒了。這一階段他若摔跤，自己不能爬起來，我也無力扶他起來。門外若有人，我都是叫人來幫忙。那天門外無人，我拿一張比較結實的椅子，讓

他扶著椅子，我在後扶持，他才能站起來。喝了杯水後去樓上休息，我們認為無大礙。誰知半夜他不能起床，平常半夜他都起來一次，小便並吃流質補品。所以我給 Kaiser 打電話，請他們派救護車來。Kaiser 派車要等一個多小時，與九一一不同。然而這不是急症，不可以打九一一。在等救護車時，我拿瓶子給他小便，也代他預備吃的，用管子餵他。救護車來了，我又是坐救護車同去。照X光後認為骨未傷。醫生說他若必須用醫院式的床，明天可以打電話去要。那晚醫生又僱救護車送他回來。我接他在客廳椅子上睡，盼望他一兩天會好。一兩天還不好，我背痛了，所以打電話叫人送來醫院式床，暫放在飯廳內，盼望他一兩個星期會好。一兩個星期還不好，我就僱人把書房內的雙用沙發椅搬至飯廳，把檔案櫃子放在客廳主櫃內，書房變成他永久的臥室。一九八八年冬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他晚上一個人住在樓下，生活能自理。有時也去樓上，他喜歡樓上的淋浴，都是上樓洗澡。

在一九八八年，錫恩的精神還好，就是走路慢。他喜歡出去應酬，在館子裡車停門口，他可以走進去。去 Kaiser 看病就有困難。我有時去急診室拿一張輪椅推他；以節省時間和心力。有些應酬在旅館內，他就不能去。醫生說醫藥保險不能買輪椅，因為他還會走。我就給他的一個學生 Mel 打電話。Mel 從 U.S.C. 畢業後從軍，駐上海，錫恩曾替他介紹黃文玉夫婦，戰後我們在黃文玉家中還見過他。那天晶、瑩好開心，看見一個說美國話的人。我們回福州，聽說 Mel 退伍了，擬在上海做生意，不巧得了小兒麻痺症，在醫院與一個中國女友行婚禮，然後夫妻回美了。Mel 的母親頗富有，也樂得殘廢的兒子有人伺候。Mel 回美後，去職業學校讀書，以後也有工作，都是自己開特製的汽車和坐輪椅，已數十年。母死，Mel 繼承遺產，成巨富，近年開了個大的 Van，也是為殘疾人而蓋的，用電動輪椅。數十年來我們與他都有往來。我打電話給 Mel，問他有無多餘的輪椅。三天後他親自把輪椅送來了。他們的 Van 內有個鐵板，鋪在前門的台階上，那電動輪椅可以進我們的客廳。那天 Mel 夫婦還在我們家中吃了便飯並閒談。

錫恩喜歡出去參加宴會，有了輪椅更方便他參加了不少的宴會，在大旅館或在 U.S.C.，他在外面比在家中吃得少。他五月七日去世。我們早已答應五月九日，參加 U.S.C. 教育學院博士學位待位生的畢業早餐。五月六日我問他五月九日的早餐要去嗎？他說要去。實際上他五月起情形惡化，我認為他不應當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有一天他又是大便出血，我又電話鄰居送他去急診室，我在裡面陪著他，一直到有人來送他到他的房間，是單人房。我想胃病有藥可吃，大約很快可以回來。我未走時還看見值班的男護士，我拜託他好好地照顧。半夜我打電話到護士值班室，值班的護士說：“他不肯睡，我們剛給他藥吃，他大約睡了。”次日晨，我又打電話到醫院，要跟錫恩講話，護士說：“他不能接電話，因為昨晚他摔了一跤，今天神經紊亂。”我嚇了一跳，趕緊給張慧慧打電話，她立刻來，我們一起去醫院，看見他醒著，身上穿一件背心，背心有帶子，結在床的兩邊欄杆上，這樣他不

能起來。我問他：“你認得我嗎？”他大聲說：“No.”我問：“昨晚發生了什麼事？”他又不說。我相信他不是不認得我，他是生氣。那天早上他要驗腸胃，所以慧慧和我去銀行。離開了醫院後，我一路在哭。下午回醫院，我去找那男護士，他說昨晚“他跟我吵架。”自己要起來，所以把他綁起來。我很奇怪錫恩素來對護士客氣，何以會與護士吵架。

前一天剛進醫院時，護士為他驗血糖，血糖太低，趕快給他喝了一杯橘子汁。數月前他血糖太高，醫生叫他吃糖尿藥，每天一粒。我認為若是吃了藥，多消化澱粉，也許會增加體重。吃一時又驗血，血糖還是高，醫生叫他每天服用兩粒，沒想到進院時血糖又太低了。

醫生發現他又是胃出血，那次住院很不順利，頭兩天他不睡，護士給他吃藥，以後也打針，他就睡了。第三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睡，我都不敢做聲，怕吵醒他。原來這一睡，非同小可，在後來的兩年中，他都是這樣愛睡。

錫恩這次住院很不快樂，說：“他們待我如犯人。”他愛睡不愛吃，每天早上我都打電話護士，讓他們喂他吃早點。下午晚上都是我親自去，把他扶起來，坐椅上，然後喂他吃。他沒有胃口，吃得很少。

因為腦神經變化，所以講腦科專家來看。腦部的 Cat Scan 等都做了，沒有找出毛病。有一天內科醫生告添我，該做的事都做了，你過兩天可以接他回去了。也說了他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制。這我在醫院內也都看見過，所以我早已找了幫忙的人。頭一個來的是俞崇信醫生，我立刻就把他定下，請他在錫恩出院前一天的晚上來。第二天內同他一起去接錫恩。又怕錫恩不喜歡俞醫生，所以我打電話給教育學院的一位教授，請他與我們同去，讓錫恩坐他的車。我從醫院要了幾個褥墊子，還有綁他的背心，以為這都是必需品。那次他住院兩星期回家後，情形好轉。起初我把褥墊鋪在床上，睡時把欄杆拉上，沒想到他大小便都能自制。數星期後，我就不再給他鋪褥墊，床前的欄杆也不拉上了。吃的東西切小了放在大碗裡，他用匙子自己可以吃。我每天早上大約六點鐘把麵片煮好，加上絞碎的火雞肉，放在大碗內，他用匙子吃。俞醫生和我隨著音樂在前廊練太極氣功。廿分鐘後，他大約也吃完了。頭幾月項靠得住的，後來出過亂子，我們就不能練氣功了。吃完去休息，至十點起來，吃些水果或橘子汁，然後出去走路，回來又睡。十二點起來吃午飯，吃完再睡。下午三點起來，喝半杯的 Ensure or Isocal（罐頭的富於營養的補品），又出去走路，回來又睡。晚六點吃晚飯，聽新聞，看電視，至八點預備睡覺。他躺下去就睡，半夜有時他自己會在小瓶內小便，有時要幫他起來。

一個身體不好的人，愛睡比不睡好得多。他也安閒，照顧他的人也省事。有時他自己穿衣服、鞋子、襪子，去澡房，或走出來。

這次錫恩生病，幫忙的人比較容易找。因為從中國出來的人多，多數都沒有合意的工作，沒

有身份，英文也不太好，所以肯在家庭幫忙。大家都是知識份子，所以生活適應比較容易。俞醫生是外科醫生，行醫多年，太太也是醫生，還在中國。俞家熱心宗教，父親也是醫生，殉道而死。俞家兄弟都被毒打，至受重傷。俞醫生在可能時愛在地板上睡。我們客廳、飯廳沒有客時是不用的，所以地氈還頂乾淨。這樣子俞醫生晚上用錫恩醫院帶回來的海棉墊子鋪在地上睡，白天在飯桌上看書、寫字。

我經常訂閱宗教刊物 Daily Words，俞醫生來後我們三人未吃早點時都有靈修，我念 Daily Words，俞醫生念 Daily Words 所指定的聖經，有時也討論，然後各人都禱告。俞醫生的弟弟俞崇架來後，我們四人一起靈修。Daily Words 上若有錫恩喜歡的信息，他就把小冊子放在自己口袋裡。一九九一年一月我訂了大字的 Daily Words，每天都由他念，他對這職務也很喜歡。我對早上靈修頗感安慰。錫恩從小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他一直都承認自己是個基督徒。在他晚年時再有機會與神交通，我深感欣慰。

俞醫生把生活完全奉獻給神。星期天在三個會所聚會。他來美國讀神學，秋季開學後，禮拜一整天上課，禮拜二或禮拜四下午及晚上都上課，這樣子非但白天幾乎三天不在，在家的時候，還要預備功課，寫文章，我們二人有忙不過來之感。有一陣早上、下午讓錫恩自己在外邊走路。有一次他摔了，我們又帶他去醫院照X光。在左右為難之際，俞家的弟弟俞崇架從大陸來了。我們都喜歡他，兄弟二人感情也好。崇架也喜歡在地上睡，四人共處，相當和氣。崇信不在時，崇架都在，就是禮拜天兩人都去做禮拜。在他們的照顧下，錫恩更有進步。走的路線也增加了，走路也不用 Walker 了，而用杖子。崇架帶錫恩去外面走路，至飯廳落地窗前就吹哨子，俞醫生就把前廊的電燈，開關幾次，跟他打信號。俞醫生在飯廳工作時，喜歡把窗簾打開，看前院的樹木。錫恩走至客廳門外，又吹哨子，俞醫生就開大門和他打招呼。我若在家也要到大門打招呼，晶若在家，也要到。戴世常在樓上代我整理帳目沒下來，錫恩說還少一個人。下午走路也有同一的儀式，這對他的精神增添了愉快。他吹哨子十分起勁，像個小孩子。禮拜天家中沒有人，我帶他在外邊走，到飯廳及客廳前一樣吹哨子。我告訴他家中沒有人，少吹點，他也不肯。

一九九〇年秋，崇架由人介紹在離洛約一百里的市立大學任化學助教，俞醫生也要上課。我請老胡來幫忙，他是中醫。老胡每天帶錫恩走路時，他照舊吹哨子，我開大門和他打招呼。聖誕節，瑞柏來洛給錫恩兩個新的哨子，還有一條美麗的帶子，每次出去就把哨子掛在脖子上，一樣的用力吹。他走時，我把那兩個哨子和帶子都給他放在他的口袋內了。

錫恩是個能幹而好動的人。臥病時他有一、兩次感覺煩躁，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走投無路。急的時候也說：“我為什麼現在什麼也不能做了？”我只好安慰他說：“你以前做過許多事，現在正是你休息的時候。”煩悶時他也有時也遷怒于我。但多數的時候他都是很快樂，安祥地睡。

其實他是挺有福氣的。有一陣我們三個人一同伺候他。家中時刻都有人。我花了好幾百塊錢裝了六個煙火警報器。怕的是萬一有火患，他不能自己跑出去。為地震而預備的食物和水應有盡有。因為他不能一頓沒有東西吃。每次洗澡，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椅子放澡盆內，他手抓住握力器，人們用熱水往他身上澆。替他洗澡的人穿背心短褲，弄得一身汗，他可以不動一指。平常他床邊裝有電鈴，一按鈴立刻就有人來照顧他。

醫生還是每三個月給他檢驗一次眼睛。每天為青光眼要點眼藥。我們做了個表，點完做個記號，以免重複。有一天醫生說他的左眼的白內障熟了要開刀，那時他自己已沒有多大主見，我告訴他：“若是開了刀，視力會大有進步，也許你一下子腦子也清楚起來。”他也同意開刀。開刀以後視力好像有進步，然而對腦子卻無補益。

有一天吃晚飯時俞醫生說：“陳太太，你吋為什麼眼睛那樣紅？”我說不知道。一忽崇架說：“你為什麼耳朵這樣紅？”我有點怕，因為我一天都覺得頭暈。眼睛、耳朵都發紅，可能是中風的預兆。我就宣佈吃完飯，我要去 Kaiser 看醫生，麻煩俞醫生送我去。飯後俞醫生和我立即去醫院，我叫崇架陪錫恩看電視。慧慧來我們家，崇架告訴他我去 Kaiser 急診室了。慧慧立刻趕來醫院。這時，我和俞醫生還在外面等，慧慧坐一忽就走了。我叫俞醫生也回去，他一定要陪我。沒想到錫恩在家十分掛慮，穿好大衣，一定要去 Kaiser，怕不能與我相見，叫崇架給慧慧打電話來接他去。慧慧打電話到 Kaiser 叫我給錫恩打電話安慰他。我照辦了。臨時去 Kaiser 看病就是要等。從急診處去門診處，再去家庭醫藥處，做心電圖，回家時已十二點。錫恩穿著大衣，不肯去睡。見我回來他十分激動，抱著我，面有淚痕。我也抱著他安慰他說：“我沒事要長久活著，永遠照顧你。”他像個受驚的孩子，我替他脫去大衣，照顧他上床，祝他晚安。他平常很能睡，像那夜的情況，他卻可以好幾個鐘頭不睡。在外面應酬，他也可以好幾個鐘頭不睡。

兩年在家養病，大小便都管制得很好。只有兩三次去澡房趕不上，發生意外。大腸開刀後，每天大便有時多至三、四次，末兩年大便反見正常，一天一次。十餘年來他背痛，腰酸、腿痛，有時擦藥水，有時貼膏藥，臥床兩年身痛全消。數年來皮膚乾，一身發癢，洗完澡，總要花一個鐘頭抹藥。臥床期間，身上也不癢了。最後的一個月，有點滴尿，我帶他去看尿科醫生，驗後認為膀胱沒事。又叫他去急診室看內科醫生，醫生把脈，量血壓、照胸部X光後，也沒有特別指示。我們只好回家。我把剪好的毛巾，用別針別在他褲子上做尿布。

最後一個月食慾差，每餐都是我喂他。我勸他多吃，因我要他多活幾年，但無濟於事。他精神提不起來，一忽兒就睡著了。食物都是一碗、半碗地倒掉。末了一星期，小便完全不能自制。他自己也說：“我都不知道小便會這樣流出來。”這樣子就得用尿布了。

五月五日乃星期天。幫我忙的人星期天都不在，我一個人照顧他。生活如常，一天三餐加兩次小吃，兩次走路。末一個月因見他太累，走的路線已略縮短。五月六日早餐也照常。餐後他

去睡，我上街去買了四大包尿布。回家時老王說他今天不肯吃水果，也不要走路。我摸摸他的額頭好像有點熱，我說午飯送他去急診室。他不要起來吃午飯。老王和我略吃些東西，扶他起來，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給他流質的東西用管子吸，他喝得很少。老王去開車，我扶他出去，走至後院，他不肯走了，要坐下，老王把他抱到車上。車至 Kaiser 時，讓他坐輪椅，至急診室。護士檢查認為血糖太高，體溫正常，又叫我們去普通診所。普通診所的人又送我們至急診室，我生氣了說：“病人太累了，我要他立刻躺下。”上床後接上滴露，我及老王都在旁照顧。俞醫生早上打電話來說，下午要來看我們。臨去醫院時，我留了個條子在後門，說我們在急診室。晚上俞醫生來看他，我告訴他：“俞醫生來看你。”他還張開眼睛，立刻又閉上。他在休息時，我和老王回來吃晚飯，吃完又去醫院。不久他們預備送他去病房，我們也跟著去。那是個單人房，我們在四處觀望一陣，就計劃回家。他在熟睡中，我告訴他：“我們回去了，明早再來看你。”他沒有反應。我半夜打電話到醫院，護士說他在熟睡，一夜沒聲音。第二天清早我到醫院時，值班護士告訴我他進入昏迷狀態。Kaiser 的制度，各病人都有個固定的內科醫生。那天早上錫恩的內科醫生 Dr. Korb 已來看過，所以我叫護士撥電話至 Dr. Korb 的辦公處，他立刻接電話說，錫恩有兩種毛病，一、血糖高，現已得到控制，另一是感染，現在不知道是肺部或膀胱，感染而不發燒，表示體弱，失去抵抗力。藥物治療已十二小時，感染不能抗制，這情形不佳。血糖高也是感染所致。在身體這樣衰弱的時候，可能心臟會停止。我們不計劃用人工的辦法維持生命。就是用人工的辦法，也只能維持一、二天。以後醫生也來病房，把話重複一遍。在病房內我每隔幾分鐘就去叫他，盼望把他叫醒。同時我也給住在附近的友人通電話。那天清早，我已給晶通了電話。中午回家吃飯時，我也給他的妹妹通了話。午飯後我又回到醫院，那天有些朋友來看他。回來吃晚飯時晶打電話來，我說以後的情況難以預料，我會天天與她聯絡。晚上八點左右門鈴響，錫瑛夫婦和他們的兒子 Ken 及洪真夫婦來看我，他們剛從醫院來，我請他們去客廳坐。他們還沒有坐下，醫院的電話來說錫恩剛斷氣。我對大家說讓我上樓給晶通個電話。以後我們一起去醫院與他道別。這是我生活中第二次撫尸痛哭，與我心愛的人道別。由病房出來，我向值班護士詢問事情發生的經過。她說：“客人走後我去整理那些管子，看見他停止呼吸。我立刻給醫生打電話。”Ken 是個醫生，他至病房時，用手抓他的足底還有感覺。我們七人一同回家商量善後。會所是在我經常去的教堂。有一次長孫瑞柏來看我們，我叫他開車送我們二人去我的禮拜堂並吃午飯。那是個新蓋的會所，錫恩看後很喜歡。過幾個月說還要去看看，我叫慧慧開車送我們去。那晚我和會所負責人通電話，決定五月十一日晨十點鐘，借用那場所。瑩去世時紹耳代我們置墓地。一九五二年種族歧視的觀念還強，華人不能埋葬在華貴的墓園。現在一些好墓地，都是近來新開的。瑩去世數年後，我們決定在同一墓園買兩塊墓地。

一九八三年錫恩大腸癌開刀前，他曾用舊紙寫了幾個字，放在樓上檔案櫃現用夾子內，沒有

告訴我。他在醫院時怕我發現這張紙，就另寫個夾子曰”善後用”。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我請南加大前文理學院院長主持儀式，我才把錫恩那張遺囑拿出。錫恩主張追思會改為 Service of Thanksgiving for the life Theodore H.E.Chen。他還選了幾首名歌，指定儀式不可過半個鐘頭。也說棺材不必抬去禮拜堂。這件事我知道他的用意。在美國喪禮抬棺材是榮譽的，不過一些中國人都不喜歡抬棺材，所以他不要叫他的朋友替他抬棺材。我與殯儀館的人磋商時，問他們可否把棺材用車推去禮拜堂，然後再推出，不必叫人抬。那老太婆說：抬棺是必須的禮儀，若找不著人，她可以代雇六個人。我只好按錫恩的指示，棺材不抬去禮拜堂。錫恩很不喜歡無謂的禮儀。比如晶結婚時，他不要牧師問：“Who will give away the brides?”他認為女兒不是他的所有物，他無權把她送給人。按基督教的教規，孩子出生數月後，父母應把孩子獻給神，接受洗禮。我們的孩子未受洗禮。我們認為他們成人以後，自己決定要不要受洗禮。

我主張親友不必送花。把買花的錢捐給陳錫恩獎學基金，捐款直接寄給U.S.C. 副校長 Dr. Carl Franklin，所以五月十一日禮拜堂內，只有四個大花園、協大校友會、東海校友會、中華益壯會及仁社洛城支會。

錫恩頗有人緣，喜歡他及尊敬他的人還不少，Dr. Franklin 對我說過，也對別人說過，簡直不能相信，錢一直都是源源而來，而且是從世界各地寄至U.S.C.。這也可以說明錫恩是桃李滿天下，敬愛他的人很多。現在接到的捐款已超過了15,000美元。陳錫恩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七日下午八時逝世，享壽八十九歲。

書 目

Developing Patterns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 1940

Elementary Chinese Reader and Grammar

South Pasadena: P.D. and Ione Perkins, 1945

Chinese Communist and the Proletarian – Socialist Revolu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55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eacher Training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 U.S. Office of Education, 1960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 Documentary Study (Mimeographed)

Los Angeles: Asian – Slavic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5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London: Pal Mall

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書 中 章 節

“Education in China” and “Education in Japa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Moehlmand and Roucek, ed.)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52

“Education Under Communism – Remoulding 640,000,000 Chinese” in Education for World Leadership

Yearbook of 1960 Convention of 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Chinese Commun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J. S. Roucek, e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1

“Science, Scientists, and Politics” in 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S. H. Goul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61

“Mainland China: The Red Storm Over Asia” in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J. S. Roucek and K. V. Lottich, Ed.)

Idaho: The Caxton Printers, Ltd., 1964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and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in Government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ewart Fraser,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5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ims, Trends, and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uth Adams,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6

“The Thought Reform of Intellectuals” in Government of Communist China (George P. Jan, ed.)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 1966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China Giant: Perspective on Communist China

Scott, Foresman & Company, 1967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68” in China in Change (M. S. Bates, ed.)

Friendship Press, 1969

“Education in China, 1927 – 1937” in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al-Building Efforts. (Paul K. T. Sih,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

“Education” in China, a Handbook (Yuan-li Wu, ed.)

New York: Praeger, 1973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Republic of China: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 – 1980
(James C. Hsiung, ed.)

New York: Praeger, 1981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a: 70 Years After the 1911 Hsin-Hai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百科全書中的章節

Encyclopedia of Modern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Library)

Encyclopedia of Vocational Guidance (Philosophical Library)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22 Articles Appeared in Various National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陳錫恩巡迴演講(1961年2月-3月)

February 27,	8:30 PM	Address in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San Francisco
March 2,	9:00 AM	University of Oregon. Meet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March 2 - 3		University of Arizona
March 2,	9:30 AM	Panel discussion, meeting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School of Education
	12:00 Noon	Luncheon, School of Education faculty
	3:30 PM	Meeting of Students in Far Eastern Studies
	8:00 PM	Community lecture - Catalina High School
March 3,	10:00 AM	Informal conversation with faculty members of University of Arizona during coffee hour.
March 6 - 7		University of Texas
March 6,	12:00 PM	Luncheon with faculty of School of Education
	3:15 PM	Forum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School of Education
	7:30 PM	Open lecture meeting. Auditorium
March 7,	8:00 AM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Education
March 8,	10:00 AM	Kansas State Teachers College, Radio interview
	12:00 Noon	Lions Club
	4:00 PM	Faculty meeting
	8:00 PM	Open meeting for students, faculty, & community
March 9 - 10		University of Missouri
March 9,	8:00 PM	Faculty reception
March 10,	1:40 PM	Students in School of Education
	4:00 PM	Graduate seminar in Sociology & Political Science
March 12,		Regional conference of AASA, ST. Louis
March 15 - 16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rch 15,	1:30 PM	Television recording for "School & Society"
	8:00 PM	School of Education Panel
March 16,	9:30 PM	School of Education Panel
March 17,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0:00 AM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chool & Society"
	12:00 Noon	Luncheon with faculty

	1:00 PM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chool & Society"
	3:00 PM	Informal reception: Students & Faculty
	7:30 PM	Open meeting for campus & community
March 19 - 2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rch 20,	12:00 Noon	Faculty luncheon
	4:00 PM	School of Education forum
	7:30 PM	School of Education discussion group
March 21,	10:00 PM	Radio WOUM
March 22 - 23		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
March 22,	10:00 AM	Student Conversation
	4:00 PM	Seminar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7:00 PM	The International Club
March 23,	12:00 No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Club
March 26,	8:30 PM	Regional Conference of AASA, Philadelphia
March 28,		Glassboro State College
	9:00 AM	Student Assembly
	12:00 Noon	Faculty luncheon
	2:00 PM	Student Assembly
	4:00 PM	Informal tea
	5:00 PM	Radio interview
	7:00 PM	Dinner, Faculty & Students
March 29,		Harvard University
	8:00 PM	Forum,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陳錫恩 / 陳鍾文惠

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生或博士生獎學金

陳氏獎學金每年提供給一位獎學金獲得者 12,000 美元的生活費，24 個學分的學費以及其他必須繳納的收費，每位被批准的學生可享有多達兩年的獎學金。申請這份獎學金的學生必須已被南加州大學研究生院錄取去攻讀研究生或博士學位。

申請這份獎學金的人必須符合以下任何一個條件：

- 1) 必須從福州市或者臨近郊縣的高中畢業；
- 2) 福建協和大學校友的子女及後代，不管他們是否在福州生活或學習過；
- 3) 陳錫恩和陳鍾文惠的後代或親戚；
- 4) 如果沒有符合以上條件的申請者，那麼任何中國學生在攻讀研究生或博士生者也可申請，不論他們從哪裡來，剛入學或繼續深造的學生都可以。

申請獎學金的學生必須成績優秀，表現良好，身體健康。申請者必須辦妥南加州大學研究生院的入學手續，包括提供托福和 GRE 考試的成績單。

申請獎學金的學生必須已被南加州大學研究生院錄取，由研究生院提交給獎學金委員會研究批准，最後由研究生院的院主任把獎學金頒發給學生。

獎學金申請手續如下：

1. 一份完整的南加州大學研究院入學申請表；
2. 一份完整的獎學金申請表；
3. 南加州大學研究院的推荐信。

研究生申請書包括以下幾件；所有的文件都必須直接寄給學生所申請的科系：

1. 一份中國的大學成績單（中文）；
2. GRE 和托福成績影印件；
3. 三封大學教授或其它熟識學生學習情況的人寫的推薦信。

申請者可寫信向以下地址索取獎學金申請表：

The Graduate School Fellowship Divis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601 Watt Way GFS 315
Los Angeles, CA 90089-1695,
U. S. A.

申請者可寫信向以下地址索取南加州大學研究生入學申請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Park

Los Angeles, CA 90089-4015

U. S. A.

傳真： 1-213-746-5670

電話： 1-213-743-7736

聽到了老師大去的訊息，不禁使我的心砰然一驚，人整個給驚嚇住了！隨即也將我推落了悲慟的淵藪。自此，我再也聽不到老師關愛的讚語和那親切的叮嚀了！

多年來，由於我常往來於台灣、洛城道上，祇要我人在洛城，就必定會和外子趨前拜候，也常常約請老師、師母小聚。老人家每次見面，總是讚譽我承繼了他熱衷教育的心志，在台灣創辦了祐德高中和協和工商兩所學校的成就。尤其是祐德、協和兩校的校歌，沿襲了原協和大學校歌的曲譜，老人家更是欣慰有加。

近幾年，由於老師的年歲漸高，身體的健康狀況也漸不如前，可是老師對教育文化的執著，以及對人才的培育，卻不曾稍有疏緩。多次我勸慰老師，把這份長遠的使命，可交由學生們來接手，可是老師總認為，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同時，還可以藉此而淡化對自己病情的耽憂。就這樣，老師走到了獻身教育、關愛學生的盡頭，也為我留下了永恆的悼念。

今年四月末，我再次回到了台灣，行前特意去拜候師母，一坐下來，師母就將她親筆為老師撰寫的傳記文稿捧了出來，希望我能將文稿內容，仔細的校對後，以便付梓，用來分贈給老師的親友、伙伴、學生，以及懷念老師的人們，籍以寬慰大家對老師的悼念之情。我恭敬地將一疊厚重的文稿接了過來，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老師的音容。熱淚盈眶，咽喉梗塞，我連連點頭承命，心想這寧是我為老師做最後的服務了？

我慶幸自己是「陳錫恩傳」的第一位請者，心裡直感覺得比別人更接近老師。文中那質樸的辭句，那濃郁的真情，那綿邈的思懷，字字句句，都叩動了我的心絃。多少次停筆沉思，心中默默地對老師說：“有師母為老師寫的這本文情真摯的傳記，老師也應該笑慰於九泉了！”

最為感人的是傳記中，真實細膩的寫下了老師、師母的童年相識，以及成年後的相戀、相愛，婚後的相期、相勉、相助、相隨。尤其是在老年病中的相互扶持、相互關懷、相互體諒，一同歡樂，一同憂傷的情境，更是感人至深。這也正是老師終其生，得以專注於教育文化的研究、宣揚、與傳遞有力的基石。基此，我曾專電師母，建議將書名更為——「陳錫恩與鍾文惠」或是一「相依相持六十年」，「亞洲文化的傳播者——陳錫恩博士」、「教育文化的長明燈」。可是師母還是認為用原書名較比恰當。可是在我的心中，自我讀協和大學時，老師（時任校長）、師母，就是我最為敬愛的兩位長者，老師也永遠是教育文忱的長明燈！指引我追隨老師，為教育盡我的一分心力。以不負老師對我的愛護與讚譽。

受業生張瑟音寫於台北祐德高中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